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說學慌恐的派學典古

著彥吉口谷
譯常敦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社 會 科 學 小 叢 書

何 炳 松 劉 秉 麟 主 編

谷 日 吉 彥 著
陳 敦 常 譯

古 典 學 派 的 恐 慌 學 說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譯者序

愛因西 (Paul Finzig) 氏在他著的『世界經濟恐慌』(The World Economic Crises) 一書中，曾經說過這樣的幾句話：

「解釋恐慌的學說有種種，但把捉其中之一種，是不當的。各種的解釋，都各含有幾分的真理。我們只採用各種解釋有價值的地方，那些學說對於我們發見適當的恐慌解決策上，是有極大的貢獻。」

他所謂各種解釋恐慌的學說，是指現在的各種恐慌學說。我想，我們要發見適當的恐慌解決策，不僅是要採用現在各種解釋恐慌的有價值的地方，更要注意歷來各種恐慌學說有價值的地方。因為，一種理論雖不外乎是時代的產物；但理論的發展，卻是受先行理論的影響而影響於後續理論。我們要探討現在的理論，尤應該追究理論由理論的推進。這不只是可以了解一種理論的成

立及發展的過程，並可深切的明白一個問題是如何成立發展而來；對於一個問題既可確實的把握；而採用各種理論有價值的地方，也可知所採擇。譯者即在這種主旨之下，將這本『古典學派的恐慌學說』介紹於國人之前。關於古典學派學者所經驗的恐慌，是什麼性質的恐慌？他們的恐慌學說的內容又是怎樣？這些問題在本書中都有詳細的分析和批判，將與我們以深切的認識，在此無須贅述。不過，想略敘恐慌理論的發展，和恐慌學說派別的大要，以明瞭古典學派的恐慌學說在恐慌論史上的意義，並便我們研究各種恐慌學說知所取從。

古典學派的成立時期，正當恐慌由中世恐慌轉化為近世恐慌的時期，即是所謂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代的恐慌。如英國的馬爾薩斯 (T. R. Malthus)、里加圖 (D. Ricardo)、密爾 (J. Mill)、馬加洛克 (J. B. McCulloch)、法國的史伊 (J. B. Say)、西斯孟第 (S. d. Sismondi) 等經濟學者，一方面努力於古典學派體系的完成，他方面即因頻繁發生於當時經濟社會的恐慌，而彼此發生論爭。這即是古典學派恐慌論的成立。但他們的恐慌論的內容，並不是一致的主張，而是正相反對的兩種恐慌論的對立。在一方面，是史伊、密爾、里加圖一派。在他方面，是馬

爾薩斯、西斯孟第一派。史伊一派因立足於所謂以生產物購買生產物的根本原理，否定一般商品的生產過剩，故又否定一般的恐慌之成立。反之，馬爾薩斯一派則承認商品的一般過剩的事實，是認一般恐慌的可能，以消費和生產的不均衡，是恐慌的原因。兩派對於恐慌的見解既然不同，而恐慌對策也是正相反對的主張。史伊一派以獎勵生產是唯一的恐慌對策。馬爾薩斯一派則以限制生產和獎勵消費為唯一的恐慌對策。在他彼此論爭之間，恐慌已轉化為純粹的近世恐慌。自一八二五年的恐慌以來，恐慌的發生既然是週期的規則的反復。而一般的商品過剩，又是任何人不能置疑的事實。像這種現象，如用古典學派經濟學去說明，自然有感到不能滿足的地方。以至把恐慌作為一大經濟變動，即景氣變動（Business Cycles）的一階段，而加以說明和觀察。於是，遂由古典學派的恐慌論轉換為景氣論。初期的景氣論，已經散見於十九世紀的中葉以前，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有詹鳳士（W. S. Jevons）等的研究。至二十世紀忽然勃興，尤其是因大戰後情勢的轉變，更顯著的發展起來。在現在，這一派的理論是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屬於這個系統的恐慌論，可以包括作資本主義學派的恐慌論。此外，有可包括作社會主義學派的恐慌論一派。在古典學派成立的

時期，其暗潮已發生歐文（O. Owen）傅利葉（F. M. C. Fourier）等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主張的恐慌論。他們思想的一部，影響及於西斯孟第以至羅德貝爾圖斯（J. B. Rodbertus）他一部則為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所攝取，即是馬克思（K. Marx）的恐慌論。其傍系有杜根——巴拉洛斯基（Tugan-Baranowsky）的恐慌論以至釀成伯恩斯坦（E. Bernstein）和考茨基（K. J. Kautsky）的論爭。在正統派社會主義，有盧森堡（Rosa-Luxemburg）的蓄積論，以至布哈林（N. Bukharin）及最近的格羅斯曼（H. Grossmann）的蓄積論。

據上所述，我們可以明自古典學派的恐慌論在恐慌論史上有如何的意義，和現在的恐慌論是如何發展而來。本書著者在恐慌理論的發展一章中，分恐慌論的派別為三：

一、古典派恐慌論

二、社會主義恐慌論

三、資本主義恐慌論

如再比較詳細的觀察恐慌論的發展，更可區分為四個階段：

一、以史伊的市場理論為中心的古典派的生產消費均衡論，即一般恐慌否定論和馬爾薩斯、西斯孟第等的一般恐慌肯定論。

二、萌芽於一八五〇年前後，發展至於今日的景氣變動論。

三、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的恐慌論（即歐文、羅德貝爾圖斯等的恐慌論）。

四、馬克思恐慌論及其後的發展。

（1）馬克思、恩格斯的恐慌論。

（2）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和杜根巴拉洛斯基的景氣變動論的修正論及考茨基、盧森堡的反對論。

（4）因歐洲大戰後的恐慌，尤其是因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以後，所謂世界恐慌的深刻化而產生的蘇俄學者間的恐慌論。

不待言，這本書不過是恐慌論一部分的介紹，但這一部分是有介紹的必要的。或者我們在研究各種恐慌學說，採用各種恐慌學說有價值的地方，以求有所貢獻於恐慌的解決策，古典學派的

恐慌學說有先注意的必要也未可知。自然，據以上的分類，恐慌學說還有種種，其介紹和研究的工作，是更需要我們繼續的努力。

譯者 二三六十日在上海

目次

緒論 恐慌事實的發展與理論的發展

第一章 恐慌事實的發展……………一

一 恐慌的一般性……………一

二 恐慌的特殊性……………二

三 中世的恐慌及近世的恐慌……………四

四 過渡的恐慌……………五

第二章 恐慌理論的發展……………八

一 古典派恐慌論……………八

目次

九

551.9
924
2

二 社會主義恐慌論	一〇
三 資本主義恐慌論	一二

本論 古典派經濟學中的各種恐慌學說

第一章 過渡的恐慌之發展	一五
一 序言	一五
二 產業革命與生產力的發展	一六
三 一七九三年的恐慌	一八
四 一七九六年及一八一〇年的恐慌	二四
五 一八一五年及一八一九年的恐慌	二七
六 一八二五年的恐慌	三二
七 恐慌史家的各種見解	三五

第二章	古典派諸學者之歷史的社會的存在與恐慌事實……………	三九
一	戰前的發展期與諸學者的教養時代……………	三九
二	戰時的發展期與各學者的研究時代……………	四五
三	戰後的不況期與各學者的論爭時代……………	五四
第三章	史伊的銷路說……………	六一
一	銷路說的意義……………	六一
二	銷路說的內容……………	六四
三	銷路說的結果……………	六九
四	銷路說與恐慌論……………	七二
五	銷路說的獨創性……………	七八
六	銷路說的發展……………	八二
七	銷路說的修正……………	八九

八 銷路說的批判……………九七

第四章 詹姆士密爾的需給均衡說……………一〇二

一 需給均衡說的意義……………一〇二

二 『商業辯護論』中的均衡說……………一〇四

三 個人的需給均衡……………一一一

四 社會的需給均衡……………一一五

五 需給均衡說與恐慌論……………一二九

六 需給均衡說的批判……………一三二

第五章 李加圖的生產無限說……………一三〇

一 恐慌論在李加圖經濟學中的地位……………一三〇

二 資本的蓄積與生產的限制——生產無限說……………一三五

三 一般的恐慌之否定及部分的恐慌之肯定……………一四〇

四	部分的恐慌之原因及欲望無限說	一四四
五	總括及部分的恐慌說的批判	一五〇
六	欲望無限說物物交換說生產無限說的批判	一五四
第六章 馬爾薩斯之一般的過剩說		
一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經濟學的關係	一六三
二	恐慌論在馬爾薩斯經濟學中的地位	一七二
三	生產動態論（一般的恐慌之肯定）	一七八
四	分配動態論（一般的恐慌之否定）	一九六
五	一般恐慌論對於現實方面的適用	二〇六
六	恐慌的一般性及相對性	二一七
七	馬爾薩斯恐慌論的批判	二二〇
第七章 西斯孟第的所得不足說		
		二二九

一	西斯孟第的研究方法與恐慌論	一一二九
二	西斯孟第的研究目的與恐慌論	一一三三
三	西斯孟第的理論的研究與恐慌論	一一三七
四	所得不足說	一一四一
五	恐慌的諸原因	一一五〇
六	結論	一一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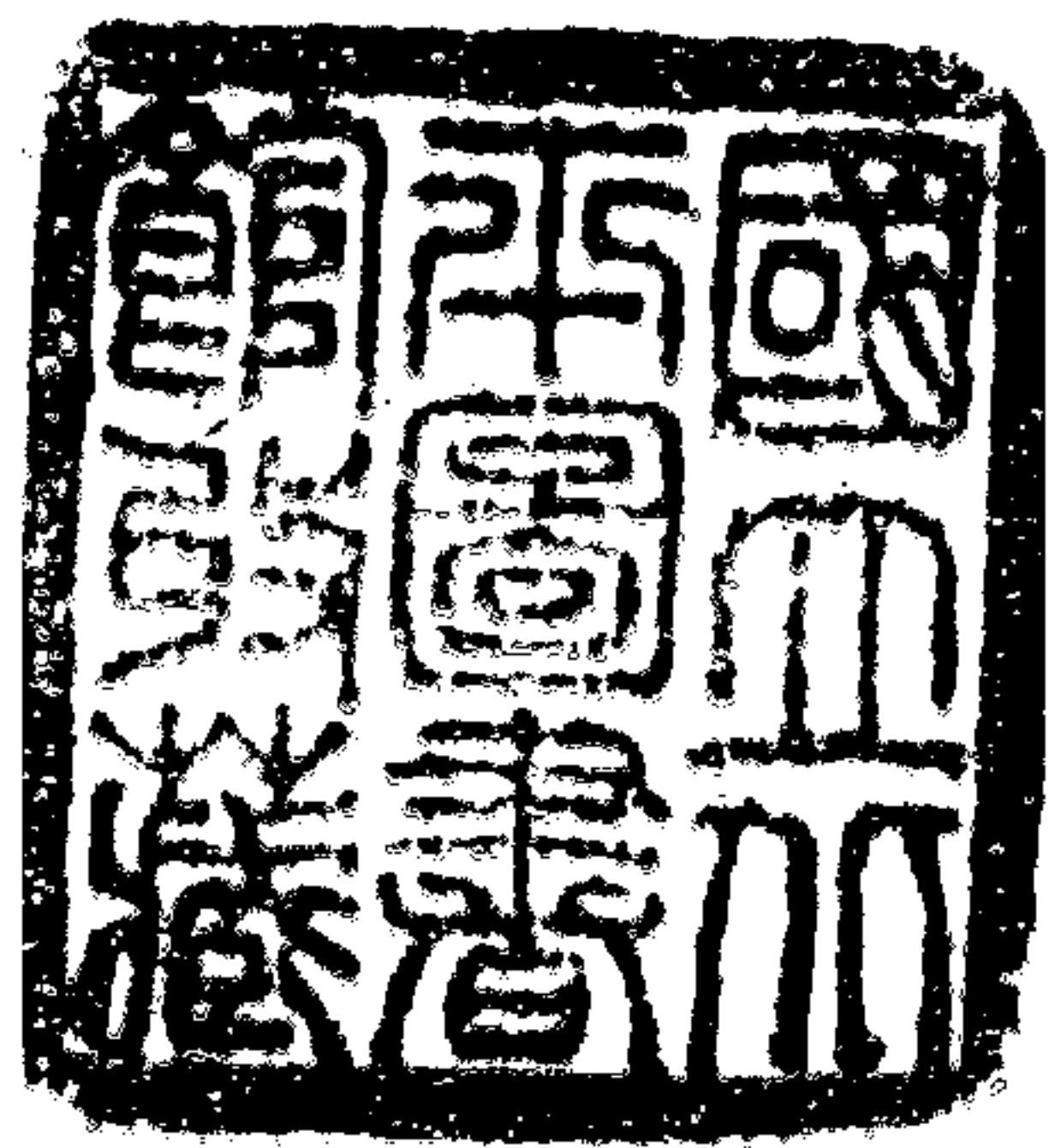
古典學派的恐慌學說

緒論 恐慌事實的發展與理論的發展

第一章 恐慌事實的發展

一 恐慌的一般性

所謂廣義的恐慌，是指我們一切經濟生活的擾亂。如財物的蒐集及生產，交換及買賣，使用及消費等等經濟生活的一部或者全部，因為何種原因，擾亂平時狀態的情形，我們可總稱之為恐慌。因之，這種意義的恐慌，決不是近世生活特別纒有的；就是在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太古封鎖的家內經濟或村落共產體，在希臘羅馬的奴隸經濟，在中世的封建經濟或理想的計劃經濟等等，凡在我



們經濟生活存在的所在，無論如何是不能避免的經濟災厄。

但是，像這種恐慌的一般規定，並不足明瞭恐慌的本質。恐慌理論的任務，不是在規定各時代恐慌之抽象的一般的性質，而是反對的在觀察這種一般的恐慌——經濟生活的擾亂——因着時代不同經濟組織有別，其表現出的特殊性是如何。一切科學，不是終止於具體事物的抽象。因為，只是由抽象規定的一般概念，並不能構成科學使命之現實社會的說明。

二 恐慌的特殊性

因着社會經濟組織的不同，經濟生活的擾亂——恐慌——第一顯現於生活部面的也就不同。在古代的自給經濟時，擾亂主要顯現為消費恐慌。因為交換及買賣不是支配的，流通停滯尙不足擾亂經濟生活。並且在這個時代的消費生活的擾亂，雖然是基因生產生活的擾亂，但只是生產擾亂，並不一定是限於擾亂這個時代的經濟生活。

而到了家內手工業的商業資本時代，經濟生活的擾亂，顯著的侵入於買賣生活所謂商業恐

慌，漸次惹起世人注意的，即是這個時代的經濟擾亂。最後，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擾亂，以生產恐慌爲主。本來，又包含有商業恐慌，並且伴着消費恐慌。但特徵是以商品生產的擾亂爲主。

像這樣的，恐慌是由家計的消費恐慌發展到商人的商業恐慌，最後更發展到企業家的生產恐慌。不待言，這種發展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包括的。

第二、恐慌因着時代不同，其發生原因也就不同。在古代的自給經濟時，消費恐慌的主要原因，是天地變異的自然原因。在自然科學的幼稚時代，因爲不能克服利用自然力，卻多被自然力所左右限制。洪水旱魃等等天災，立刻引起生產不足，發生飢饉。常常威脅素樸的古代民族的消費生活。

但科學進步，一方面可以避免生活受自然力的擾亂，同時又能積極的利用自然力。於是，自然事變的恐慌原因退後，而戰爭內亂等等政治原因卻加重起來。在各國歷史上可以看到羣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或諸侯蟠據的時代，由於政治變亂的國民經濟生活的擾亂，常是一再的發生。

近世資本主義的恐慌，不待言，主要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這是現在社會經濟組織上固有的，或是基於現在社會經濟組織上一部分的缺陷？又當別論。無疑的，是在自然的及政治的原因以外，其

中保有經濟的原因。而這些恐慌的各種原因，也並不是因着時代排他的發展。例如，認為主要是因經濟原因而發生的現代恐慌，在天災豐凶等等的自然原因和戰爭變亂等等的政治原因中，可以求出其勃發動因的事例，無寧是很多的。

詳細探求這些恐慌事實的歷史發展，這是屬於恐慌史的範圍，並不是我們現在的直接問題，但僅以這一點敘述，對於恐慌的性質因着歷史而發展，即恐慌事實的歷史性，已可得到大概的理

三 中世的恐慌及近世的恐慌

關於恐慌事實的歷史發展，特別是我們現在注意的中心部分，不待言，是近世的恐慌。近世的恐慌，和產業革命的成功及資本主義的成立，是同時發現的。現在普通說到恐慌時，多是指近世的恐慌。本來，資本主義也是在成立以後纔顯著的發展，尤其是一九〇〇年前後向獨占傾向的發展，可以區別資本主義為前後二期。因為質的顯著發展，同時其中發現的恐慌性質，也顯著的不同。因之，

在資本主義成立以後的恐慌事實之質的發展，也是有興味的一種問題。但此點姑置後論。在此首先要研究的，只是伴着資本主義成立而發生的近世的恐慌，和以前封建時代的中世的恐慌。

第一、中世的恐慌之發生，主要由於自然的政治的原因。反之，近世的恐慌則由於經濟的原因。第二、因之，前者又是偶然的不規則的發現，後者則是週期的規則的發生。第三、前者主要因生產不足而發生。反之，後者則由生產過剩而惹起。第四、前者的發生，是由於物資不足物價騰貴，後者則反對的是因物價暴落。第五、前者是基於生產擾亂的消費生活的擾亂。後者則是伴着販賣停滯而發生的生產活動的擾亂。最後，前者在地域和產業方面，都是部分的。後者在地域方面，是由國民經濟以及世界經濟；在產業方面，是由各生產部門以及流通部門，帶有濃厚的一般性質。

所以，我們可以說狹義的恐慌特徵——近世的恐慌的——是在約數年的間隔中，回歸的發生的販賣停滯及伴隨販賣停滯的生產擾亂。

四 過渡的恐慌

但恐慌也和一切事件的發展相同，決不是明確劃期的發展。所謂古代的、中世的、近世的恐慌，要不過是指出各個的典型性質。在現實的種種恐慌，不一定是限於這種典型的，而是由種種典型的複合而成。只不過由所含何種的要素為多，得區別之而已。

並且，在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代，可以指出過渡的存在的恐慌——過渡的恐慌——這當然是指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以產業革命急速進行的英國為中心而發生的恐慌。

過渡的恐慌，在許多點正混合有將要失去的中世要素和新增加的近世要素。在那時候的英國，一方面是產業革命急速進行的時期，他方面又是對外戰爭繼續的時代。因之，在當時頻發的恐慌，即因生產力顯著發展後的生產過剩，和所謂戰爭的政治原因的錯綜而惹起的。因之，又是由偶然的漸次至於規則的。因物價騰貴而發生供給過剩，以至惹起物價暴落、販賣停滯、生產擾亂。在產業方面，已經是相當程度的一般化；在地域方面，則漸由國民經濟推移至世界經濟了。

現在，如列舉由中世的恐慌經過過渡的恐慌，以至近世的恐慌的各次恐慌，有如左表：

中世的恐慌

1640
1667
1672
1708
1721
1745
1763
1772
1778
1783

過渡的恐慌

1793
1794
1810
1815
1819

近世的恐慌

1825
1836
1839
1847
1857
1866
1878
1890
1900
1914
1920

沒有恐慌事實的所在，沒有恐慌理論。因着恐慌事實是由古代的、中世的、近世的發展，欲說明恐慌事實的理論及防止恐慌的政策論，也漸漸的發展起來。但是，這不待言不一定是限於經濟理論的恐慌論。古代的消費恐慌，是一種家計問題。換言之，不過是財政的問題。中世諸侯的恐慌對策，以備荒貯蓄之形為主。因之，經濟理論的恐慌論，是在由於經濟原因的近世的恐慌之發現，正確說來，是在由於過渡的恐慌的發現。我們所謂恐慌理論，不待言，不外乎是這最後的。

第二章 恐慌理論的發展

一 古典派恐慌論

沒有事實的所在，沒有理論；沒有事實發展的所在，沒有理論的發展。事實發展的所在，常不一定有理論的發展，但理論發展的所在，常必定有事實的發展。

理論的發展，一方面又是受從前理論的影響而影響後來的理論。到現在許多理論史和學說史的研究，都不過是在探求這種意義的理論發展。但假如無事實則無理論，而理論的發展，不能不有事實的發展。那麼，理論史的研究，不僅是在追尋理論由理論的推進，必須究明事實發展對於理論發展的影響。所以，我們在觀察恐慌理論的發展之先，應略敘恐慌事實的發展。

如人人都知道的，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後，所謂古典派經濟學已漸趨成立。亞丹·斯密(Adam

Smith) 以下諸學者，雖受在法國成立的重農學派 (Physiocrat) 的影響，而能完全建樹新經濟學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在英國進行的產業革命的影響。

而產業革命，同時引起過渡的恐慌和近世的恐慌，當時英國許多建設古典學派的學者，也同時在過渡恐慌頻發的時代，進行關於恐慌的理論研究。如除開亞丹·斯密和約翰司徒亞特·密爾 (John Stuart Mill)，他們所經驗的恐慌事實，主要是過渡的恐慌。換言之，他們都生存於恐慌質的發展最急速展開的時代。

但恐慌事實的發展，常不一定是恐慌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如像過渡的恐慌，正混合有中世的要素和新的近世的要素，因主要注意於那方面的要素，事實之理論的把握，不得不有顯著的差別。這即是表明事實的發展，常不一定是理論的發展。

所以，古典派諸學者的恐慌論，其經驗的恐慌事實雖是相同，而理論的把握則各自不同。因之，他們關於恐慌的理論，就發生了學說史上不常見的熱烈論爭。我在本論要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屬於這一部分，但在此只論由恐慌論的一般發展史所見的，古典派恐慌論的意義和地位。

應着事實的近世恐慌已在這個時代成立，經濟理論的恐慌論也在這個時代成立，觀察新形式發現的恐慌，有的竭力想由從來的經濟理論去如何說明，有的則努力完全由新理論去如何說明，有的關於用如何方策去防止恐慌的勃發，和如何方策避免恐慌的災害等等，他們都不得不建樹各自的見解。亞丹·斯密姑作別論，在英國如李加圖 (David, Ricardo) 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詹姆士·密爾 (James, Mill) 馬加洛克 (John Ramsay, McCulloch) 等的恐慌論，在法國如史伊 (Jean Bopiste, Say) 西斯孟第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mondi) 的恐慌論，即是古典學派恐慌諸說的成立。

二 社會主義恐慌論

古典派經濟學急於其偉大建設的時候，其暗潮 (undercurrent) 已漸發生，所謂理想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而當時的過渡的恐慌，是新社會發現的附隨物，又是威脅勞動階級生存的問題，當然尖銳的射入這一派的眼中。如歐文 (Robert, Owen) 傅利葉 (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蒲魯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 等的恐慌論，因此即在素樸的形式而成立。

他們思想的一部分，影響於西斯孟第以至羅德貝爾 (Johann Karl, Rodbertus) 而一部分及其一般思想，同時為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所採取，因此而成立社會主義恐慌論。在馬克思 (Karl Marx)、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恐慌論是他們理論的重要部分，但在他們的筆下，並沒有留有完全的形式，而在他們的理論上，可以看出已經完全成立的理由。

自此以後，恐慌論和蓄積論發生關聯，成為社會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理論之一。在以後社會主義的文獻中，這一派的蓄積論及恐慌論，即成為最大的問題，恰當後期資本主義成立期的世紀轉換時代，杜根——巴拉洛斯基 (Tugan-Baranowsky) 的理論問世，自己標榜是古典派恐慌論和馬克思理論的折衷者。本來不能說是純粹的社會主義恐慌論，但和先前的羅德貝爾及以後的考茨基 (Karl Johann, Kauskey)、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等等的恐慌論，同時可以看為形成修正派社會主義的恐慌論。

另外在正統派社會主義，因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的蓄積論、恐慌論的議論更見活

激。戰後資本主義的動搖，俄國革命成功等事實，又發生蒲哈寧 (Nikolai Ivanovich Bucharin) 的蓄積論。最近更見到格洛斯曼 (Henryk Grossmann) 的蓄積論。這一派的恐慌論，有更趨深入之勢。研究理想派、修正派和正統派社會主義恐慌論的發展，是自成一題材，惜乎不能在這一個研究中論及。

三 資本主義恐慌論

事實的近世恐慌一成立，尤其是因着牠週期性的確立，纔明白恐慌在現實的存在，是稱爲景氣變動的一大經濟變動的一階段。最初注意到這種現象的，恐怕是英國的金融論者帕爾瑪 (Palmer)。他在一八三七年，已經注意現在意義的景氣變動的現象，區別之爲數個階段。蓋近世恐慌最明瞭的發生，是一八二五年的恐慌；景氣現象的成立，大概是在一八二三十年時。帕爾瑪的著作在這個時代發見，決非偶然。

關於景氣及恐慌的實證的研究，自此時以後，爲事實的發展所刺激，漸趨隆盛。積道生 (Dobson)

BOH. 一八四七)朗格登(Langston. 一八五七)密爾士(Mills. 一八六七)威爾生(Wilson. 一八四七)等等的研究,以至詹鳳士(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太陽黑點說,這一派的研究,纔告一段落。此外又有因着恐慌事的集積,同時從事其史的記述的。其代表者爲久格納(O. Juglar)、威爾特(M. Wirth)。這些歷史家也確認近世的恐慌的週期性,同時以之爲景氣變動的一階段。在一九〇〇年及一九〇七年的兩次恐慌,更刺激本世紀的恐慌論。尤其是前者刺激德國的理論的研究甚大,後者刺激美國的統計的研究甚強。這兩種傾向,各因大戰後的景氣研究而得繼續維持。

戰後,尤其是一九二〇年的恐慌,世界不景氣的繼續,助成自大戰前已在準備中的景氣研究。在德國的理論的研究,以景氣原因的研究爲中心而有景氣政策論,在美國的統計的研究,以景氣現象的研究爲中心而有景氣預測論。因此,景氣研究竟至稱爲是大戰後成立的一種新科學而發展起來。

在這些的景氣研究,自然以恐慌爲景氣變動的一階段,並想由一定的政策去避免和緩和。於

是，包括由百年前帕爾瑪以至發展到現在德美景氣研究的恐慌理論，可以稱之爲資本主義恐慌論，而和前述社會主義恐慌論對立。

以上概觀恐慌理論的發展，可以包括爲古典派恐慌論、社會主義恐慌論、資本主義恐慌論三者。古典派恐慌論，在歷史上是先於後二者，所以經驗的恐慌，可以說是特殊的過渡的恐慌。而後二者大體是同時的存在，他們經驗的恐慌，同是近世的恐慌，在最近又同樣經驗到戰後資本主義的恐慌。而兩派的恐慌理論，爲什麼這樣的相對立呢？所謂無事實則無理論，無事實的發展則無理論的發展。同時，事實的存在，不一定是表明理論的存在，事實的發展，不一定是理論的發展。一切的理論，是事實的反映；而相同的事實，常不一定反映相同的理論，卽是指此。

本論 古典派經濟學中的各種恐慌學說

第一章 過渡的恐慌之發展

一 序言

屬於古典派的經濟學者，如除了最初的亞丹·斯密和最後的約翰司徒亞特·密爾，大多生存於十八世紀的後半期至十九世紀的前四半期，爲時約半世紀，恰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成立，同時存在。在當時經過產業革命急趨成立的資本主義，恐慌尙未見有充分的形態。一八二五年以後的各次恐慌，許多學者纔一致認爲是有近世意義的經濟恐慌。但近世的恐慌也和一切事件的發展相同，決不是即在完成的形態中顯現出來，也不是突然的發生。我們在中世的恐慌和近世

的恐慌之間，可以認出一種有過渡性質的恐慌，即是在此要作為過渡的恐慌之發展而加以略述的。本來，如像詳細蒐集關於這些恐慌的史的資料，從事恐慌事實史的研究，是另一問題。在此只不過由明瞭經驗這個時代事實的古典派經濟學者，如何的認識這種過渡的恐慌，其恐慌理論是古在如何的事實背景，作為探究理論和事實的關係的一種手段，而敘述這些過渡的恐慌，明瞭其各自的特徵而已。

二 產業革命與生產力的發展

自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戰爭終了，到一七九三年拿破崙戰爭開始時止，約十年的期間，是英國產業革命最長的和平期間，在這期間，產業革命纔最初有大的進展。在從前十餘年中，先後發明的各種紡織機械，「使原來居於附屬地位的紡織業，到一七八二年以來，忽然強大發展，以至成為英帝國最重要產業之一」。(1) 棉花的輸入量，一七八二——九二年約發展七倍。棉製品的輸出價額，一七八〇——九二年約發展六倍。為前後所未見的發展。(2) 就是炭坑業製鐵業及其他的

工業，內外的交通機關，對內及對外的商業，在新資本主義的組織和規模之下，繼最初特別顯著發展的，也在這約十年的和平期間。在這期間的生產力的驚人發展，是最堪注意的事件之一。

在一七九三年二月，見到對拿破崙的宣戰布告，拿破崙戰爭到一八一五年止，綿亙有二十二年之久。但在斷續的戰爭期間，英國的產業革命，更有第二次的大發展；更引起英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一般的顯著發展起來。

因此，在這十年的和平期間和二十餘年的戰爭期間中，顯著進展的產業革命，和因產業革命而發展急速的生產力，動輒有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這種生產過剩的可能性，直接是因戰爭的勃發、斷絕、再發、弛緩、終結等等伴着戰爭的進展的政治動因，間接是受由於戰爭而發生經濟變化的刺激，於是生產過剩顯現於現實的，即是販賣停滯、恐慌。所以，這些恐慌和戰爭的政治原因有關聯，同時又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原因有關係。在這種意義上看來，已經沒有離脫中世的恐慌之域，並且不是充分的近世的恐慌。以下即詳細檢討各次恐慌的特質。

(1) M. Bonniat: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8) S. 152.

(2) E.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1825) p. 347. 349.

三 一七九三年的恐慌

最初的過渡的恐慌，和一七九三年拿破侖戰爭的勃發關聯着發生。因之，使人想到好像是由戰爭的偶發原因而惹起的。並且在實際上，「投機和物價騰貴的發端，一般的印象，都以為是在一七九三年戰爭開始時」。(1)

但是，如更仔細的觀察事實，也不盡然。這次恐慌已經發端於前年秋。可由「前例所無的破產者數，在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已經驚人的超過這年春夏所發生的破產者數」(2)的事實來證明。現在舉出可以窺見此次恐慌特質的資料，馬克非孫 (D. Mac Pherson) 「商業記錄」(3)中的有興味的事實：

「營業範圍最廣，信用最鞏固的許多商家都發生破綻。而他們的破綻，又影響到國內各處多數和他們有交易有關係的。就是擁有莫大資金，原來債務準備充分的殷實商家，也不得已而停止

支付，有些銀行也無法的停業。

「在一般的困難和恐怖時，人人都彼此猜疑戒備。就是一時用去相當金額脫去窮狀，也不能得到什麼方便。以機械擔保，以運河股券擔保，也不能得到好多金額。這種資產的價值，都因憂慮暗雲瑣閉的國家、商業、工業的沈滯狀態，而消失了牠的價值。有許多有貨幣的，都不知安置在何處纒安全，不利用牠而死藏在金庫裏面。

「在這種一般的困難之中，在國家必要以上增加的地方銀行，因為想流通銀行券，自己惹起災難，陷於最困難的境地。因之，他們傳播困難和破綻於關係者也最大，是使英格蘭銀行現金枯竭的主要原因。……這些地方銀行（有說是二五〇，有說是四〇〇以上）之中，有一〇〇以上發生破綻」。(4)

由這些記錄看來，這次的恐慌不只限於特殊的生產部門和商業部門，而是普及於各種部門，由商工業以至於金融業。可以明白是相當程度的「一般的」恐慌。並且由地域來看，是由英國全土以至歐羅巴及美國的主要都市。具有某種程度的國際性質。(5)

然而這次恐慌因何原因而惹起的呢？再看馬克菲孫的記錄：

「在有利於商業的九年和平期間所蓄積的財富之中，大部分是投資於國內航路（運河）。一般說來，時機一至，這是很富有生產性的。但需要多額的投資，而生產性又完全是依存於國內各種事業之一般的繁榮。」

「當這個時候，商人和工業家的事業，又是大規模的擴張，比從前任何時代為大，雖是繁榮的自然結果，有時又是繼續發生困難的原因。」（6）

布尼丁（M. Bouniatain）的研究，也達到大概相同的結論。他說：

「一七九二年，是英國產業膨脹的第一階段的絕頂點。先於一七九二年中頃的最後二年間，是英國最繁榮的期間。而一七九二年則是一種異常繁榮期的終結。到一七九二年之秋，發生強力的反動，致產業的進步一時逡巡不前。」（7）

「消費雖然增大，而更大的機械生產和大量輸出，同使國內外市場發生商品過剩，製造品銷路發見感覺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維持生產物的高價。於是，至一七九二年秋止，即顯著的下

落……

「商品市場的物價下落和市場的製品過剩，引起實業界的困難。即是支付不能者及破產者的增加。在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宣告破產者，達一零五的異常數。而在前數個月，只不過只有這時的半數……」。(8)

由此看來，這次恐慌的根本原因，不是由於所謂戰爭勃發的政治原因，而是由於過去十年和平期中的產業膨脹，發源於「對國外市場和對國內市場的一種生產過剩」。(9)關於此點，又可由事實來證明。在恐慌年內，棉花輸入量減四六%，綿製品輸出量減一五%。(10)外國品的再輸出，雖差不多沒有減少，但英國製品的輸出額，則減少二五%。(11)

而政治家流的近視觀察，卻在近處探求原因。如一代大宰相的彼德(William Pitt)他在以救濟恐慌爲目的的議會特別委員會報告說：「對於無充分資本而發行流通券的商店，因取用而發生破綻的，由各地方得着報告」。(12)蘇格蘭銀行經理因勒士說：「現在發生的困難，不是由於普通市場的貨物需要的減退。而是許多……支付製造家所用的長期票據的貼現，現在發生困難

的關係」。(13)於是，議會中的公開意見，把恐慌的責任歸於地方銀行發券過多。這有如布尼丁所批評的，是否是不當的非難呢？但發券過多的事實，無疑的是生產過剩的一種結果，並且同時是恐慌勃發的一種直接動機。

但此次恐慌，同時又並不是和戰爭其他偶發的原因全無關係。如脫克(H. Hoek)說得很當。他說：

「戰爭的勃發，即使明白的不是根本原因，但必然對於已經存在的混亂原因，應附加有什麼。這不僅是由於戰爭目的的國債惹起利息比率的騰貴，而是由於需要方面某種不可避免的擾亂」。(14)布尼丁說：「戰爭不過對於勃發的恐慌，有一種助長的情勢而已」。(15)

其次，在此次恐慌前的商品投機的一種主要動因，是因那時以英國為中介而供給大陸各國砂糖及咖啡的San Domingo，發生革命騷亂。為這種投機的反動所生的一七九二年物價低落的先驅，則是一七九一年的豐作。(16)

要之，一七九三年的恐慌，在經濟方面，是由生產過剩、商品投機和發券過多三種相關關係而

惹起的此點很具有近世的性質同時又明白的有戰爭其他偶發的非經濟的原因，確應承認是一種過渡的恐慌。

- (1) T.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 vol. I (1838) p. 178.
- (2) D. Mac Pherson: *Annals of Commerce*, vol. IV, (1805) p. 268.
- (3) D. Mac Pherson: *Ibid.*
- (4) D. Mac Pherson: *Ibid.*
- (5) T. Tooke: *Ibid.* p. 176-177.
- (6) D. Mac Pherson: *Ibid.* p. 265-266.
- (7) M. Bouniatin: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8) S. 160.
- (8) M. Bouniatin: *a. a. O.-S.* 162.
- (9) M. Bouniatin: *a. a. O. S.* 170.
- (10) E.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ory in Great Britain* (1835) p. 347. 349.
- (11) M. Bouniatin: *a. a. O. S.* 170.
- (12) D. Mac Pherson: *Ibid.* p. 267.
- (13) D. Mac Pherson: *Ibid.* p. 268.

(14) T. Tooke: *Ibid.* p. 177.

(15) M. Bonhiatain: *a. a. O. S.* 163.

(16) L. Levi: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1872)* p. 69.

四 一七九六年及一八一〇年的恐慌

經過一七九三年的恐慌以後，『商業和工業在恐慌後不久——一七九四年——又有新膨脹，在一七九六年，一時達於絕頂』。(1) 其後不久，至一七九七年，再發生第二次的恐慌。

這次恐慌的『原因，在同樣是基於國家急速度的經濟發展一點，和從前恐慌有共通點』。(2) 但生產過剩不像前次那樣顯著，應該說是貨幣——銀行——金融恐慌。即是由於資本蓄積結果而投資於商工業和運河。戰費的大量支出，連年凶作以致穀物輸入貨幣流出等原因，纔釀成流通手段的缺乏，利息比率的騰貴，金融市場的困迫，各銀行發生破綻，以至英格蘭銀行停止兌換。但為這年二月發生的銀行取兌風潮的導火線，則全因偶然的政治事變——法國陸戰隊千二百名在威爾士一部上陸事件——

由此看來，一七九七年的恐慌，也應由近世的生產過剩，或蓄積資本固著於固定資本等，去探求牠的原因。同時，他方面又應在戰爭、凶作、偶然事變等，去確定牠的原因。

一八〇二年的 *Amiens* 條約，維持了一年餘的和平狀態。但在一八〇三年，又再發生英法戰爭，尤其是一八〇三年拿破侖的柏林宣言（即大陸封鎖令），使英國商業大受影響。因和大陸貿易斷絕，招致一八〇七——八年間的大陸輸入品的缺乏，引起物價騰貴。同時和北美合衆國間的貿易障害，特別喚起原料品的缺乏和騰貴，對於這些輸入品的投機勃興，更刺激物價普遍的騰貴起來。在另一方面，英國由海軍把握着的制海權，努力回復她在大陸北美失去的銷路，獲得西印度及南美的市場，輸出因此急激增進，以至激成物價騰貴和投機勃興。⁽³⁾而結果不能避免這些現象的反動，即是一八一〇年的恐慌。

一八一〇年的恐慌，也是基於種種原因的錯綜。由於戰爭及其他政治事情，而惹起大陸北美市場的封鎖，南美市場的開拓，因此刺激投機的勃興等等，以致物價大為騰貴。其次，一八〇九年後發生的大陸商品及美洲原料品的輸入增加，喚起物價反動的下落，在一八〇九年最初三個月間，

平均低落爲三〇%。到了這年的下半期，竟陷於販賣停滯。尤其是對南美市場的輸出過剩和大陸美國原料品的輸入過剩，是這次恐慌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人稱「一八一〇年的恐慌，是固有意義的商業恐慌（商品商業恐慌）」（4）即因此故。

但是，在當時的資本主義，商業恐慌已不僅止於商業的範圍，其悲慘的狀態，並且顯現於製造工業。「這些的破產（商業上的破產），對於全國各處各種類的貨物的製造業者，都有極大的影響。因之，一般的信用缺乏，遂存於製造業者及輸出商人之間……在朗加夏的綿業者……極爲困難，事業完全中止。在孟德斯鳩以及其他地方，各家皆每日停業，不問棉花的價格如何，卻無人需要。製品的輸出，除了很少的精製品以外，別無其他的。」（5）

財政大臣在議會說明商業信用法案的演說，更可以來證實這件事。其演說云：「一切重要的製造業者，都縮小他們的事業，有些更有無法而完全中止的。如據委員會的報告，在全國的綿業者之中，沒有減少工廠中僱用工人的一半的，幾無一人。規模更小的製造業者，則全部解僱使用人。就是殘留在第一流製造業者之下的勞工，工資盡都減低。這種結果，有如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很明白：

最悲慘的困難，必然漫延至多數工業地方……」。(6)

由此可以明白，一八一〇年的恐慌，也是流通停滯而引起生產停滯，發生多數的工業失業者，已經包含有多量的近世的分子。但又不能看掉的，是基於大陸封鎖及北美紛爭等的政治原因。

(1) M. Bonniatain: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8) S. 147.

(2) M. Bonniatain: *s. a. O.* S. 178.

(3) F.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vol. I (1838) p. 272-279, 280.

(4) M. Bonniatain: *s. a. O.* S. 221.

(5) F. Tooke: *Ibid.* p. 305.

(6) F. Tooke: *Ibid.* p. 307.

五 一八一五年及一八一九年的恐慌

由一八一〇年恐慌所受的打擊，自一八一一年下半期起，漸漸恢復。在一八一二——一三年之間，已見物價騰貴的傾向。但一八一三——一四年間的大陸的政治變動（即拿破崙的戰敗），

有人預想和平恢復後的好況，對於輸向大陸的英國商品及殖民地商品，充溢着投機的野心，遂引起一八一四年以後的物價飛漲。同時，英國工業也因需要增大而顯示膨脹，向大陸和北美盡量輸出，發生輸出地方的商品過剩，因此招致輸出品物的下落和輸出商的破綻。在另一方面，物價騰貴和交通無阻，誘導顯著的輸入增加，因在外商品的下落，數年來向上的國內物價，自一八一五年初頭以來，急激低落，以至不免於恐慌。(1)

一八一五年的恐慌，和前次恐慌因戰爭大陸北美市場的封鎖相反，而是關聯於和平恢復後的兩種市場的開始。(2)(3)

原來，一八一三——一四年的物價騰貴，是基因於預想和平恢復後的大陸需要。但，第一、資力傾注於長期戰爭的大陸購買力，不能和平恢復同時復原。第二、和平恢復雖解除了大陸封鎖，但同時英國失去了由制海權所得的貿易獨占地位。第三、戰期中的彼德的商工業獎勵策，使英國產業異常發展。第四、因大陸封鎖，致大陸工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足以自給。第五、戰爭終熄，以至大量軍需品的需要斷絕等等原因，預想和平恢復後好況的英國商工業的發展，遂達於止境，不得不受

現實的清算。這種清算行爲，即是一八一五年的恐慌。

所以布尼丁說：「一八一五年的商業恐慌，是一八一〇年恐慌的一種對立物的。同樣是由於過渡投機的關係，市場關係急激變動而惹起的。在前的情形，引起過度投機和外國商品輸入的原因，主要是大陸市場及北美市場的封鎖。在現在的情形，則是相同市場的開始，招致過度投機和過度的輸入……」（4）關於此點，這根本是因戰爭或政治的原因，市場發生變化而惹起的。但在這種過程上，常伴着生產過剩和供給過剩。即是：第一、英國商品在輸出地的供給過剩。第二、英國國內輸入品的供給過剩。第三、英國商品在英國國內的生產過剩。

一八一五年的恐慌，同時又發生農業恐慌。在一八〇九、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年內的凶作，和因戰爭而穀物輸入困難，穀價遂異常騰貴。在一八一二年末，達到驚人的最高價格。同時地租也驚人的騰貴，以至見到農耕地的擴張。但因一八一二年以後的連年豐收，和平恢復後的穀物輸入容易。一八一三年以後，穀物價格低落。及到一八一四——一五年，更急激下落。於是農企業家不得不陷於恐慌。而擁護地主的穀物條令委會，即在一八一五年開會。關於穀價、地租、穀物、關稅等等農業間

題，遂成爲當時論壇的中心問題。(5)

因受一八一五年恐慌的激動，英國國內物價低落和歐洲大陸凶作的關係，到一八一六年，輸入著見減少，並且過剩商品消去。因之，在一八一七年，物價已經向上，信川狀態也漸次恢復。同時在金融市場，充溢着自恐慌以來所未見的有利投資資金。在一九一七年，更見到二十五年來所未見的好現象。

而這種金融市場的狀態，一方面助長投機，他方面刺激外國投資。不僅是大陸商品的輸入增加，對於原料商品的投機，更誘導過剩的原料輸入，以至釀成價格下落之勢。(6) 同時，輸出投機使輸出增加到一九一八年，自澳洲、遠東、印度、非洲以至南美等世界各處，都見到英國商品的過剩堆積。尤其是北美因這種過剩輸入，有惹起一八一八——一九年間的恐慌的現象。在英國則因一八一年以後的原料及殖民地商品的增加，一八年凶作時的穀物大量輸入，由資金蓄積而投資外國等關係，於是國際貸借顯著惡化、匯價低落、金流出等現象發生。一時誇稱豐富的金準備，自一八一年以來，急激減少。在這年下半年期，更感到金融市場的逼迫。年終又因法國國債下落，受大陸恐慌的刺

激。至一八一九年二月，遂再見恐慌的勃發。(7)

一八一九年的恐慌，其範圍和程度，雖不及一八一〇和一八一五年的恐慌。但這三次恐慌是互有關聯的。尤其是最後的恐慌，爲『英國經濟史上恐慌最富時期的終結』。(8)雖是基因於過剩資本的蓄積，而發生過剩生產及過剩輸出等的經濟原因，但同時也因凶作及其他偶然的事變。

(1) T.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 vol. II. p. 5-7.

(2) T. Tooke: Ibid. p. 10.

(3) M. Wirth: Geschichte de Handelskrisen (1874) S. 98-108.

(4) M. Bouniatian: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8) S. 284.

(5) 拙稿『馬爾薩斯之地租論』(經濟論叢第十七卷第五號)。

(6) T. Tooke: Ibid p. 77-79.

(7) M. Bouniatian: a. a. O. S. 235-243.

(8) M. Bouniatian: a. a. O. S. 243.

六 一八二五年的恐慌

拿破侖戰後的不況，開始於一八一五年的恐慌，繼續約十年間。其間又受一八一八年的輸出過剩及一八一九年恐慌的擾亂，故稱一九——二〇年是英國商工業經驗上最惡的一年。(1)而這個時代正當我們要研究的各種恐慌學說，互相對峙論爭最激烈的時代。

當時的英國，已大體完成產業革命。因機械化和工廠化的生產力的顯著增進，致工業品的生產費低下，售價減低，因此增進一般民衆的消費力也很大。到一八二四年止，景氣雖還沒有一般的離脫不況之域，但已可看出由漸進的而顯著的改善之跡了。脫克說：

「原料的低落和減低生產費的機械的改善，擴張了國內外大多數製造品的消費。因此，這一個國的商工業，是從所未見的規則的健實滿足狀態。」(2)布尼丁也說：「因物價下落消費增加的结果，產業狀態已改善到某種程度。但就全體說來，因物價繼續下落，商業和工業的活動，到一八二四年初，還相當閑散。一般……一八二〇——二四年的經濟狀態……商業和工業，雖不是商人和

工業家的直接損失，但不能不滿足於低利潤。這種低利潤有不能與新資本以投資事業的何種劇激的狀態」。(3) 這即是資本過剩和利息低下的現象。

在這種狀態之下，一八二四年以後的景氣，首先顯現於因消費增加而銷去了存貨的一部商品市場，商品投機則由一部分商品漸次擴大範圍，以至使一般物價向上。同時向中美和南美各國的新投資，因此發生銷路的開拓，刺激英國商工業甚大，並且刺激商品投機。投機買賣自一八二四年末起即呈異常的活況。

原來，助長景氣的中南美企業，是乘着英國永續的不況和低利公債借換，過剩資本的低利而發生，其大部分近於投機公司。但不問公司的基礎是如何，既然喚起了英國的企業投資，這種投資即為對於英國商品的需要，不得不是商工業一時的刺激。布尼丁說：『對各國的借款，在資本家是極有利的條件。並且在另一方面，造出對於英國商品之人為的需要。我所謂人為的需要者，因英國輸出主要是由英國借款所得的貨幣來支付，同時可以中止資源的涸竭』。(4)

但是，『南美借款幾乎失去了募集的全額。除了預先保留在分配名義之下所收回的少額以

外，完全沒有分配。墨西哥和南美的礦山募款，除了一二例外，又是損失了收入資本的全額。在其他計劃之中，殘存有二三基礎健實的，但大部分被放棄，雖不是存款和最初收入的全額，亦失去大部分。由此所受的損害，和產業無關係的個人財產，也受極慘酷的損害，同時又是繼續發生的銀行破綻和商業破產的重大原因。(5)

於是即發生一八二五年的恐慌，此次恐慌的進行，也是經過投機勃興、物價騰貴、通貨膨脹、生產過剩、金融逼迫、銀行取兌等過程。和前面所述的恐慌並無不同。但最值得注意的，即是此次恐慌和戰爭沒有何種關係。而和以後許多恐慌相同；豐凶戰爭等的自然原因和政治原因退後，無寧是經濟的原因超於前面。換言之，其經濟的運動是顯示不況、好況、恐慌等經過。此點如我們已經述過，是把此次恐慌以後的和過渡的恐慌分開，作為近世的恐慌。

(1) M. Bouniatian: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8) p. 245.

(2) T.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 New Edition (1928) vol. II, p. 142.

(3) M. Bouniatian: *ibid.* p. 247.

(4) M. Bouniatian: *ibid.* p. 267.

(5) F. Tooke: *Ibid.* p. 159.

七 恐慌史家的各種見解

以上，我們檢討過渡的恐慌，爲一七九三、一七九七、一八一〇、一八一九年的五次恐慌。最後在一八二五年，見到最初的近世的恐慌。但史家對於這些恐慌的見解，不一定是一致的，茲說其代表者二三一言：

第一、觀察近世的恐慌之發現見解最新穎最慎重的代表者則推杜根——巴拉洛斯基（Генрих Барановский）他說：『恐慌之週期的反覆發生，在英國是本世紀（十九世紀）二十年時纔漸開始。一八一一、一八一五、一八一八年的恐慌，其形態屬於前世紀的恐慌。——這些恐慌不是週期的，並且直接和英國拿破侖間所發生的大戰爭有關聯。』（1）因此把這些恐慌除開，而以一八二五的爲最初的近世的恐慌。此點他和我們的見解一致。只是，他在作爲『前世紀的恐慌』而除開之中，承認所謂過渡的恐慌與否，則不明白。

第二、和此說相反，認近世的恐慌之發現比較早的代表者，可以舉出波拉爾(G. H. Pownall)他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發生的最重要的恐慌，也同樣值得注意。比這時代還要早的，是有歷史上的興味。但在實行金融和商業上業務的方法上，表現和現在的差不多沒有共通點的特徵。』(2)因此把以前的除開，而敘述始於一七九二——三年的恐慌。這種見解，以我們在前區劃為過渡的恐慌之時期，劃為近世的恐慌。因之，在不區別關聯一八一〇年以前戰爭的恐慌和二〇年以後的恐慌一點，和我們的見解不同。

第三、為代表前二者中間一派的，可以舉出里士鳩(J. Leachure)他說：『到十八世紀止，生產主要是農業的，恐慌也同樣差不多是農業的。』(3)其恐慌史起筆於十九世紀最初的恐慌(一八一〇年)。這種見解，在任何一點，都和我們的見解不同。但探此說的多是法國的恐慌論者，或者適於法國的事實也未可知。在前述里士鳩之外，納康布(H. Lacombe)也說：『純粹是產業的最初重要的經濟恐慌，是一八一〇年的恐慌。』(4)亞爾華(S. Arvas)也主張：『十九世紀初葉以來發生的近世的恐慌，有極不相同的性質。』(5)

久格納 (O. Jubilar) 主張：「假如限定我們的研究範圍，那麼，應確認恐慌在法國和英國，自一八〇〇年以來，差不多是同時期勃發，同時期終熄；並且規則的併行的繼續進行」。(6) 以一八〇〇——一八〇五年為第一期。即他並不一定是由法國的事實來劃定這個時期。其次，德國的恐慌史家威爾特 (M. Wirth)，因以在一八一五年的恐慌中，有可以認出國際間「連帶的相互關係」的理由，而採取此次恐慌以後。(7) 以根據威爾特為主的英國亨德曼 (H. M. Hyndman)，其記述亦始於一八一五年的恐慌。(8)

最後，不承認到這個時代的近世恐慌還有過渡恐慌的代表者，可以舉出加塞爾 (G. Cassel) 教授。他主要根據德國的事實，如高唱一八七〇年以後的經濟變革，是恐慌之質的發展。(9)

恐慌史家的見解，是這樣的各不相同。但由我們看來，卻是有與味的事實。現在把以恐慌史實的劃期和世紀轉換一致的第三說除開。有的採取一七九三年的恐慌為近世的恐慌之發端的；有以一八二五年的恐慌為近世的恐慌之發端的，但都可以證實我們的見解。即是，我們把前者作為由中世的恐慌到過渡的恐慌之過渡，後者作為由過渡的恐慌到近世的恐慌之轉換。在世紀轉換

前後頻發的恐慌，雖各有各的固有特徵，但也有相互共通的特徵。一方面保有中世的要素，他方面加有近世的要素，一概作為過渡的恐慌，認為是有理由的。

- (1) Tugan-Baranowsky: *Studies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1) S. 66.
- (2) G. H. Pownall. Art: "Crises,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Palgrave's Dic.) vol. I, 1925, p. 435
- (3) J. Lescure: *Des Crises generales et periodiques de Surproduction* (1923) p. 1.
- (4) E. Lacombe: *La Prévision en Matière de Crises Économiques* (1926) p. 6.
- (5) S. Arwas: *Les Crises Économique de 1920 en France* (1923) p. 9.
- (6) C. Juglar: *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de leur retour Periodique* (1862) p. 13
- (7) M. Wirth: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1874) S. 98.
- (8) H. M. Hyndman: *Commercial Cris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92).
- (9) G. Cassel: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e* (1927) S. 474-476.

第二章 古典派諸學者之歷史的社會的存在與恐慌事實

一 戰前的發展期與諸學者的教養時代

我們已經在前一章中，略述十八世紀的轉換期中，過渡的恐慌事實之特徵和發展。現在在檢討生存於此時期的古典派諸學者的恐慌理論之先，應該在本章先略敘諸學者的歷史存在和社會環境，對於這些恐慌事實有如何關係。因着敘述的方便，分此時期為三期。即拿破侖戰爭前十年的和平期，戰爭繼續以後約二十年，沈淪於戰後不況的約十年三個時期，觀察諸學者在這時期之歷史的社會的存在。

自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戰爭終了起，至一七九三年拿破侖戰爭開始時止，約十年的期間中，是英國產業革命期最長的和平期間；英國的生產力，在這個期間，繼最初發生大進步。而和平的發

展期，又多屬於古典派各學者的教養時代，還沒有把他們的主張公之於世。

現在把古典派學者之中，除開亞丹·斯密(Adam, Smith)和約翰司徒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就我們主要要研究的史伊(Jean Baptiste, Say)詹姆士·密爾(James, Mill)李加圖(David, Ricardo)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西斯孟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五人來看。他們的出生時代，有如左表：都以一七七〇年為中心，密集於前後五年之內。其中最年長的馬爾薩斯和最年幼的西斯孟第比較，相差也不過七年餘。

史 伊 一七六七年五月 生於法國里昂市的商家

密 爾 一七七三年四月 生於英國阜法州的鞋店

李加圖 一七七二年四月 生於英國倫敦的股票店

馬爾薩斯 一七六六年二月 生於英國沙里州鄉土家中

西斯孟第 一七七三年五月 生於瑞士日內瓦亡命的貴族家中

一七七〇年的前後，是紡織機械的各種發明先後出現的時代。正當英國產業革命的黎明期。

恰巧各學者也在這期間中，先後呱呱墮地。當他們教養期中的二十年內，是產業革命最初的進展期。英國生產力發展了的繁榮，爲從所未有的現象，在這樣幸福的一般情形之下，他們的生活，各特殊的發展展開起來。

生於法國里昂市商家的史伊 (Jean Baptiste, Say)，最初受商人教育，因遭父親破產，合家移居於巴黎後，曾爲大銀行使用人數年。十九歲時，偕弟同赴英國，住倫敦郊外二年，專注力於商人的教養。最後在倫敦商館學習後，回到法國。自此時起，向學心已經萌芽的他，因家中境況，不得已而供職於一保險公司；從公司專務克拉弗的勸，得繙閱斯密斯『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 的機會，忽然傾注於經濟學。這是一七八九年二十二歲時事。不久離開實業界，而入新聞界。在此爲區劃史伊生涯的第二期。他最初研究經濟學的動機，是在教養期的最後時期又得到『國富論』，參照那時一般的情勢，增加了他的興味。

詹姆士·密爾 (James, Mill) 後於史伊六年，生於英國鄉間的鞋店。但因母親的賢明慈愛，得免污穢手工業的勞苦。受普通教育後，又入愛丁堡大學受高等教育。這是一七九〇年密爾十七

歲時事。在此終了普通學科後，曾爲說教師，但大學畢業後的幾年生活，遂拋棄他的素志。在一八〇二年，至倫敦從事著述。引起他研究經濟學的興味，恐怕是此後的事。並且密爾教養時代的生活和那時代經濟的發展，不能看出直接有密切的關係。但李加圖則和他大不相同。

李加圖 (David, Ricardo) 受了普通教育後，卽入他父親經營的股票公司，是他十四歲的時候，時爲一七八六年。此時恰當和平發展期的中心，爲英國資本主義最初的進展期。李加圖是在這盛極一時的繁榮期，而投身於經濟活動最尖銳化的股票界。

他反其父意和他的愛人結婚，同時在事業上家計上，組織和他父親完全獨立的股票公司，那時是他滿二十歲後不久的一七九三年。而一七九三年和李加圖個人的歷史相同，是歐洲政治史上的重大時期。不僅在這年二月見着至一八一五年止的，蘇互二二年久的拿破侖戰爭的宣告；在經濟史上也是極重要的一年，卽是最初過渡恐慌勃發的一年。因此，李加圖在獨立事業的最初一年，已經在股票界經驗到重要的恐慌。

反之，馬爾薩斯則生於在倫敦郊外的所有地擁有相當資產，度着悠然自適生活的自由主義

者的父親的家庭。在優裕的家庭，受自由的教育。在一七八四年，李加圖入公司的前二年，已經在劍橋大學受最高教育，在校四年之後，二十三歲時在大學畢業。也沒有爲生活而急於就職的必要。回到家，安靜的過着田園生活。時時到劍橋大學去繼續研究。一七九一年，得 M. A. 學位。當一七九三年的恐慌時，已爲母校的校友 (Fellow)。在一七九八年，入英國教會的會籍，在他住的地方爲牧師之職。

因此，如像一七八〇年英國產業的繁榮，和一七九三年——九七年的恐慌等，在他那種環境下的生活和意識上，曾與以何種影響，恐怕是疑問；他的社會經驗，無寧是當時受法國革命影響而產生的社會思想，曾與以很大的影響。在一七九三年，高德文 (Godwin) 的『政治的正義』出版，和此書先後出版的康多塞 (Condorcet) 的『人心進步的歷史階段說』相呼應，高唱社會改革的思想及其可能。當時英國的思想界，有爲這些理想的社會主義所風靡之概。馬爾薩斯對於這種情況，當然不能毫無關心。

馬爾薩斯最初的勞作，標題爲 The Origin。起稿於一七九六年。由這年到第二年，是第二次

過渡的恐慌襲來的一年。但是他的 *Crise*，並不是指經濟的「恐慌」，而是表明政治的社會的危機，主要是論政治問題，攻擊彼德的政策。由此可以證明那時馬爾薩斯的關心，還沒有向着經濟恐慌和經濟問題。

最後，西斯孟第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在和密爾同年的一七七三年五月，生於日內瓦。因宗教迫害而亡命的貴族家中。受普通上流教育，畢業於日內瓦大學後，因家境零落，遂至里昂商家學習商業數年，造成將來經濟學的考察的基礎。但因當時法國革命暴發，禍及商家，短期間回到日內瓦。時為一七九二年，而革命變亂波及到日內瓦他的家中，他和他的父親同時下獄。到放出後，他全家到英國求安居之所，於一七九三年二月——對法宣戰和恐慌勃發的一月——移住於英。住英十八月中，西斯孟第研究英國的一切文物制度，增長知見不少。但依他母親的希望，再回到日內瓦。而在那裏又受了革命的犧牲，不堪其苦。於是賣去家產，求久住之所。最後住於意大利塔斯加尼亞這個小地方，在此過着半隱遁的農業生活。因此，一方面從事農業經營，他方面努力於學問上的研究。研究經濟學恐怕是在此開始的，結果成『農業表』一卷（一八

○一年)。更於一八〇三年出版『商業之富』二卷，被人認爲是最優秀的經濟者了。

要之，這個時代是他們的準備時期。雖各獨立於各的特殊境遇之下，受着特殊的教育。但一般的是生活於產業革命急速進展，生產力顯著發展的時代，在各自的情形之下，從事經濟學的研究。並且因這方面的研究而引起興趣。

二 戰時的發展期與各學者的研究時代

自一七九三年對法宣戰起，至一八一五年和平恢復止，拿破侖戰爭綿亙二十二年之久。其間恐慌勃發四次，關於這些恐慌，已經在前章敘述過。在此要檢討的，是諸學者如何的經驗這些恐慌事實，和他們的研究是如何的發展。

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他們多數的教養準備時代完了，漸入於研究的時期。有些在這個時代，已經發表了研究的一部。由於他們的研究，使原來完全不生關係的他們，發生相互交通的機會，因相互的批判和影響，更造成他們研究更盛的氣運。但恐慌論在這個時期，尙是發展的初期。活潑的

研究，則在次於此時的戰後時期。

史伊在教養時代的最後，因讀『國富論』纔感到研究經濟學的興趣。離開實業界而投身新聞界，由於他的文筆，漸漸被人知道。在一八〇三年，遂為政府法制委員會的一員，為財政部委員而從事活動，同時繼續研究經濟學。一八〇三年，史伊年三十六歲時，其主要著作 *Traite* 第一版出書。他的『銷路說』，已經在這第一版中，有了粗樸的形態。但因為此書內容的自由主義，和拿破崙皇帝的政策不一致。並且史伊拒絕了皇帝要改變此書的希望，法制委員職遂被取消。而此書的第二版，也被壓迫不許出版。

在這種情形之下，史伊想轉換他的生活，欲為工業企業家。見到產業革命後新式紡織事業的有利，乃求共同出資者，在巴黎北方五十里組織紡織工業。這是第一版出版後二年，一八〇五年的事。事業進行最初極為順利，以為前途大有希望。但因受一八一二年政府棉花關稅的打擊，且和出資者的意見不和，於是絕念而回到巴黎。但這種經驗，使史伊對於經濟學實際上的知識和經驗豐富起來；而用這種經驗和知識為基礎，改寫了的 *Traite* 第二版，完全用新的形式在十四年出版。

了。他的銷路說成爲問題，竟至引起關於恐慌的激烈論爭的這第二版即是導火線。第二版出版後不久，史伊受新政府的委託，視察英國工業。再到別了約三十年的英國。在此最初和密爾會面，又由密爾的介紹，和李加圖會見。

密爾和史伊的學問關係，可以認出是在此時以前。密爾從前拋棄他在大學畢業後作說教師的素志，想爲著述家而來到倫敦，從事其主要勞作的印度史研究。而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即漸和經濟學發生關係。在一八〇四年發表的處女作，是關於穀物貿易的小冊子（Pamphlet）。但因一八〇六年的大陸封鎖令，英國商業陷於斷絕的危機，想救濟國難的一派，回到說商業不是增進國富的重農派的思想。在一八〇七年，遂有斯賓士（W. Spence）的『英國商業獨立論』。密爾把握這個機會，反駁他們的重農思想，就商業利益大加辯護。即是『商業辯護論』（Commerce Defended）。密爾在此書中，明白的指出史伊，是受史伊的影響。但二人私人的交涉，是始於此後何時，卻不明白。由一八一四年史伊渡英，首先訪問密爾的事實來看，可以想像二人私的關係，或者是始於這兩期間的中間。在另一方面，密爾因此書出版，纔和李加圖相識。據伯恩（A. Bain）說，是在一八一

年」又和本沙門 (J. Bentham) 等其他學者相識。一八一四——五年時，密爾李加圖馬爾薩斯等經濟學者的交游，漸漸親密。密爾在『商業辯護論』中展開的需給均衡說，在他們之間，有專以爲是『密爾的理論』，而膾炙於口之概。

在一七九三年，和父親分離獨立經營股票公司的李加圖，他的家聲早在股票界有名。而他自己的性格，不僅是被一般尊敬，他獨立的原因，也被人諒解同情。他以最有成功希望的期待，爲經紀人從事活動。經過一七九三年恐慌後的商工業，到一七九四年，已有新膨脹。至一七九六年，一時達於絕點。這種情勢有利於股票業，李加圖竭力利用這種良機，得到各種期待以上的利益，實不足怪。因此，在數年之中，他就確保了經濟上的獨立，恐怕是他還未到二十六歲以前的事。

李加圖因確保經濟獨立的基礎，心有餘裕。在此時前後，開始利用餘暇，研究自然科學。關於數學、化學、地質學、礦物學等，相當努力。但對於這些自然科學的研究，自他於一七九九年，在巴斯溫泉地方的巡回文庫中，發見了斯密的『國富論』以後，就完全放擲，他以後的注意力，專集中在經濟學方面。

李加圖自一七九九年發見『國富論』起，至一八〇九年的十年中是他一生的壯年時期。在這個時期，是他一方面以一有力的交易人，從事指導的工作；他方面則努力於經濟學的研究思索，和許多經濟學家思想家交游的時期。

而一七九七年的恐慌以來，停止兌換的英蘭銀行券，遇着受一八〇六年大陸封鎖令的刺激的物價騰貴，不得不增發減價。英蘭銀行的狀態和兌匯市價，至一八〇八年秋止，得維持健全的狀態。但到了這年的最後三個月，兌匯市價急激低落，地金準備也著見減少。同年末以來，發生金貨紙幣的差額，惹起地金問題的論爭。

經濟學者的李加圖，最初介紹於世的處女作，是『地金之高價』（一八一〇年）。不待言，此書是因這種時代背景而產生出來的。而此書出版的一八一〇年，又是過渡的恐慌勃發的一年。關於此次恐慌，已述於前章。

在此次恐慌前後，李加圖的興趣和研究，主要似限於通貨問題。一八一〇年的地金委員會所決定的報告，根本是根據李加圖的主張。但為反駁反對這個報告的波桑克（Bosant, Bosant）

Quat)，他在一八一一年，著『答波桑克氏關於地金委員會報告的實際觀察』。其次，在一八二六年，公開『經濟的健實通貨提案』，完全告成了這方面的研究。而一八一五年，又是李加圖經驗到第四次恐慌的一年。

一八一五年的恐慌，同時發生農業恐慌。在前，一八〇九、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年的凶作，又因戰爭穀物輸入困難，致穀物價格騰貴異常。一二年末，達到驚人的最高價格，因此，地租驚人的騰貴起來，以至見到農耕地的擴張。但因一八一三年以來的連年豐收，和和平恢復後的穀物輸入容易，到一三年下半年期以後，穀物價格漸有低落傾向，至一四——一五年，更加急激低落，農企業家因此陷於恐慌。於是，在一八一五年，擁護地主的穀物條令委員會開會，穀物價格、地租、穀物關稅等農業經濟問題，遂成爲當時議論的中心點。

李加圖的興趣和研究，由通貨問題轉到農業問題，以至發生所謂李加圖的地租理論，就由於這種歷史的背景。而在另一方面，爲李加圖經濟學理論根柢的價值論，也在此時前後經過發展的第二階段。在一八一六年二月七日給馬爾薩斯的信中，最後有：『我關於我們以前的問題，沒有十

分考慮。只是我以為困難的，就是當把這個問題表現於他人之前，引起他人恰和我一樣的思維過程一點。我對於相對價值或交換價值的本源的法則，如能够把得到明確理解的障礙克服，我就成功一半了……」（與馬爾薩斯書簡集一一二頁）。又在同年十月五日給馬爾薩斯的信中說：「我因價格和價值的問題，受妨礙很大。我從前關於這些的思想，是不當的；現在的見解，同樣的錯誤，也未可知。這個問題，引起我和原來的一切意見不能一致的結論……我在我未與已說以首尾一貫的形式以前，工作也就繼續下去」（同上一二〇頁）。

但具有「首尾一貫形式」而出現的『原論』，是到一八一七年春纔公刊的。時爲得斯密斯『國富論』以後，經過了十八年。因此書出版而惹起的價值論爭，又成爲他價值論發展的第三階段，在此姑置不論。我們要研究的恐慌論的主要部分，已經在『原論』第一版中存在。就是在一八一九年的第二版中和一八二一年的第三版中，也差不多沒有什麼重要的改變。

現在，我們來看在各種意義上和李加圖對立的馬爾薩斯。在前面已經說過，馬爾薩斯自得於優裕的研究生生活，關心風靡當時思想界的理想社會主義，因父親的忠告而中止出版 *The Origin*。

到兩年後的一七九八年，纔匿名出版所謂不朽名著的「人口論」第一版。此書反對高德文、康特塞的社會改革論。對於沸騰當時的理想社會主義，澆了一杓冷水，此點姑置不論。所謂「人口」法則是以生活資料爲中心，因此，問題不得和經濟學有關係。他在「人口論」第一版，當然特揭一章評論斯密的經濟學。

「人口論」出版以來，他對於經濟學的關心，似乎常以生活資料爲中心而發展。例如，在一八〇〇年的第二著述，爲「現在生活資料騰貴原因的研究」。其次，在一八〇三年的「人口論」第二版中，他的經濟論更見進展。其議論分爲四章，在此的經濟論，依照已經在第一版中暗示的方向，尊重土地生產物、農業、保護貿易等；更甚於尊重勞動生產物、商工業、自由貿易等。在許多點都不接近亞丹·斯密，而接近重農學派。這種重農的傾向，在以生活資料爲中心問題的馬爾薩斯，無寧是當然的結果。

現在無須詳述第二版以後各版人口論中的經濟論，在此僅注意第四版（一八〇七年）和第五版（一八一七年）間的約十年的發展即可。在這期間中，有一八一〇年及一八一五年的恐

慌。自第一版以來，他注意的中心的生活資料問題，爲此時社會環境所刺激，遂進展至穀物法、農業論、地租論等。在一八一四——一五年，公開關於這三者的研究。

在一八〇五年以來，馬爾薩斯曾任東印度學校教授，講授史學和經濟學。他的經濟論，到此時以後，纔構成而爲一種經濟學。一八一五年的『地租研究』，不過是把他議論的一部，因時勢的必
要上而特別急於發表的。當一八一七年人口論第五版時，他容納李加圖的忠告，詳細敘述他的經濟論，因此更追加一卷而成三卷。

他的經濟學像這樣的發展而來，至一八一七年末，纔大概完成有獨立形式。但到出版，爲時又約三年。由一八一九年十二月的序文看來，出版是在一八二〇年初。因此，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一九年的兩次恐慌，當於他構成經濟原論的準備時期。在馬爾薩斯的心中，常想到多數人類幸福和生活資料，當然深受這些恐慌的感動。

要之，這個時代，一方面雖是戰爭繼續的發生，但全體的生產力，則因着產業革命的進展，著見增大。由於戰爭勃發、進展、終熄等外部事情的擾亂，遂有生產過剩的現象，屢次發生恐慌。在這時期

的古典派經濟學者，即因這些經濟的時事問題發生興趣。應着各種特殊的情形，進行他們的研究；他們因研究纔彼此發生關係。在這個時代的後期，只除了西斯孟第。他們曾經相當的密切接觸，互相切磋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事。

三 戰後的不況期與各學者的論爭時期

一八一五年的和平恢復，同時發生一種恐慌，已經述於前章。自一八一五年的恐慌起，至一八二四——五年約十年的期間，是所謂戰後不況期的困難時代。自然，在這期間也有多少的緩急弛張，尤其是在一八一九年的前後，因過渡的緩和而不免於恐慌，但全體可以說是永久繼續的不況。遭遇這種困難時期，原來各在建樹自己經濟學的各學者，就各自根據各的理論，說明這種現象，講究對策。恐慌論就成爲這時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各學者占在各自的立場主張已說，惹起了學問史上少見的論爭。就各學者的主張，加以詳細的介紹和論評，作爲次章以下的問題，在此僅就這些論爭的經過一言。

前面已經述過，史伊因一八一四年渡英，和密爾李加圖會見。但此次會見，直接對學問上有何影響，則爲疑問。只是，因此李加圖特別引起注意史伊 *Traite* 第二版中的銷路說。在原來由於馬爾薩斯的私信而惹起的論爭中，本來是採用「密爾理論」爲己說根據，現在則專稱道史伊的銷路說。

但是，關於恐慌的公然活潑的論爭的開始，則是一八一九年以後的事。一八一九年，是在戰後的繼續不況之中，更有恐慌襲來的一年。換言之，不僅是沈淪於二重不況，達於困難絕頂的一年；又是值得紀念的三種經濟原論同時出版的一年。一是李加圖「經濟原論」第二版，二是西斯孟第「經濟學新原理」第一版，三是史伊「經濟學綱要」第四版。關於李加圖的「原論」和史伊的「綱要」，已就其成立經過敘述過，現在僅就西斯孟第的「新原理」一言。

西斯孟第在塔斯加尼亞的田園生活期間，公表「農業表」（一八〇一年）和「商業之富」（一八〇三年），因此學識被人認識。威爾拉大學聘之爲經濟學教授，但因他母親希望他在自由的地位去研究，沒有答應。其後主要努力於歷史的研究，一方面又赴各處旅行，結果成功了他浩翰

的歷史著述。他被一般人知道，即是歷史家，而不是經濟學家。他的歷史家的研究態度，同時使他關於經濟學的主張，尤其是恐慌論的主張，具有特徵。

當他出版『商業之富』的時候，專奉斯密的自由主義，以忠實的斯密信奉者自任。但一八一八年旅行英國，目擊英國實狀，纔懷疑自由主義的將來，認出放任經濟的弊病。因此與他以自我清算的動機，而完成他自己標榜『新原理』的經濟學，至一八一九年出版的，即是『經濟學新原理』。

西斯孟第於『新原理』出版後，即到英國，初次和李加圖會見。李加圖在一八一九年四月七日給馬加洛克(John Romsey McCulloch)的信中，關於此時會見的情形，曾這樣說：

「我前天在上院，由詹姆士·馬金特西卿的介紹，會見西斯孟第氏，他現在以短時間的旅行來到我國。現在正是他出版經濟學書籍不久。在他的書中，他竭力要明白我所說的錯誤。他向我說，他和史伊的意見也不同。由他向我們所說的二三句話中，他似乎對於我國的任何著名學者，都不贊成。我以大好奇心看他的著作」(與馬加洛克書簡集二五頁)。

李加圖信奉者的馬加洛克，因他老師的信，對於西斯孟第的『新原理』的好奇心，當不下於李加圖，這是容易想像而知的。結果他在這年十月，在常時英國極有名的評論雜誌『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上，匿名載一文，駁論歐文(R. Owen)的恐慌論。便中並駁擊西斯孟第的『新原理』。他說駁論歐文完了，纔移到西斯孟第。他說：

『像這樣的，是主張(歐文的)我們根本錯誤的主旨，更由有名的西斯孟第氏，在他的『經濟學新原理』中竭力支持……我們要指出他的錯誤，論證消費力必然是和一切生產力的增加，同時而增加的』(愛丁堡評論——一八一九年第三二卷四七〇頁)。

於是，論戰首先就由馬加洛克開其端了。同年史伊『經濟學綱要』第四版出版，雖說西斯孟第沒有充分理解他的銷路說，但受西斯孟第的影響，不得不承認輸出過剩的事實。

及到一八二〇年，馬爾薩斯的『經濟原論』第一版出版，論爭更增加起來。馬爾薩斯反對史伊、李加圖而和西斯孟第接近。反對他的，首先有李加圖的私信，其次有史伊給馬爾薩斯的公開狀，而西斯孟第因馬爾薩斯出現，得到幫助。更在洛西的『法學年報』執筆，駁擊馬加洛克從前在『愛

丁堡評論」中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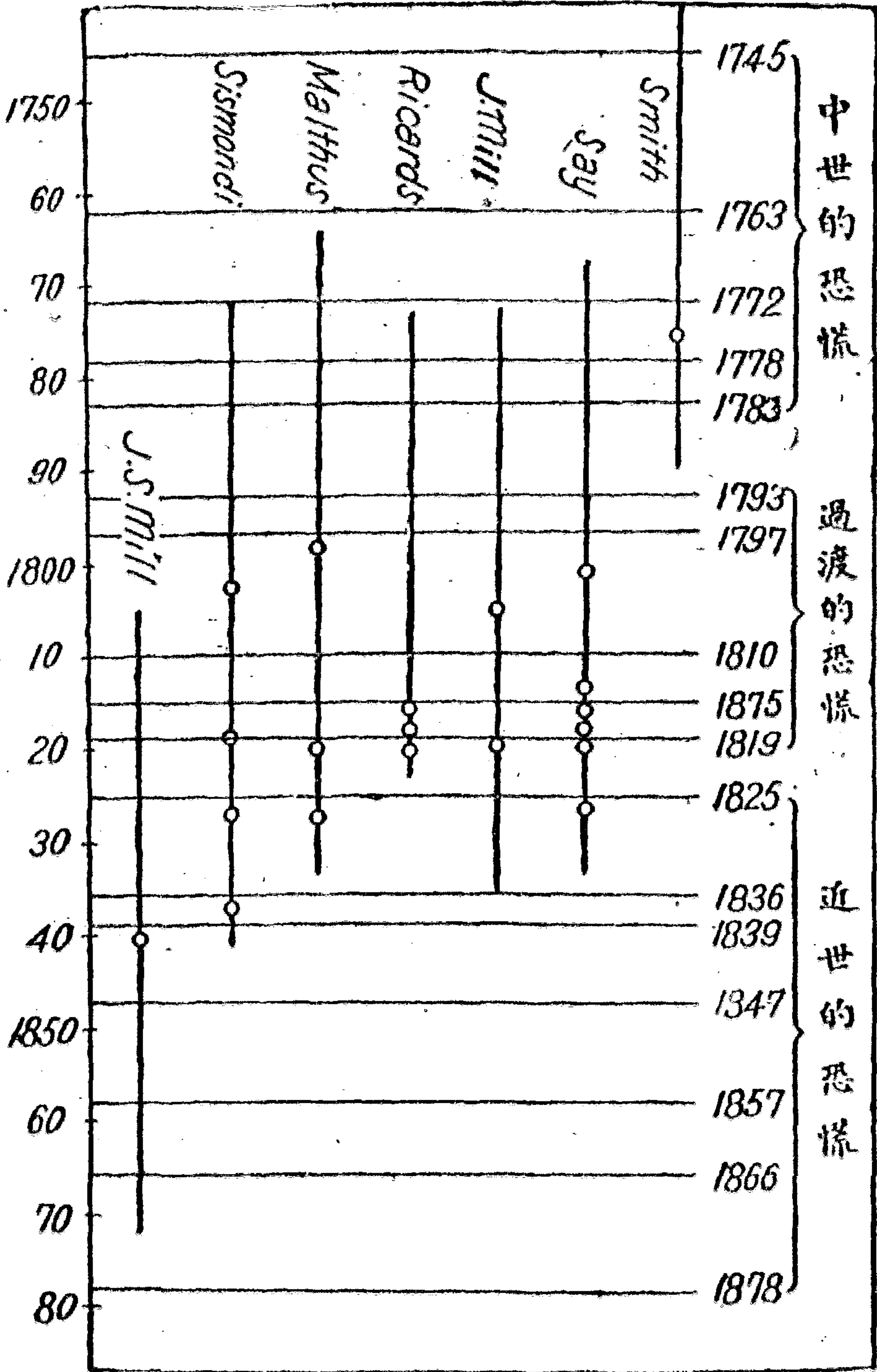
一八二二年，詹姆士·密爾的「經濟學綱要」出版，贊成史伊、李加圖而駁擊馬爾薩斯。同時李加圖仍堅持他在「經濟原論」中的主張。

一八二二年，李加圖旅行大陸，同年末至日內瓦，和西斯孟第再會見。李加圖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給脫洛瓦 (Trower) 的信中，說此時的情形云：

「在日內瓦附近科伯特和布洛加里公爵會見。我在他招宴的一天，西斯孟第氏——他出版關於經濟學的著作，見解和我完全反對——訪問公爵。

「西斯孟第氏述他獨特的見解，我和公爵加以反駁。公爵擔任論爭的困難部分，極善於辯護我們共通的原理，致西斯孟第氏有不能爭勝的樣子。西氏一再的說，不能答復對於他的反對，但並不是完全不能答復」（與脫洛瓦書簡集一九四——一九五頁）。

結果西斯孟第氏的答辯，在一八二四年五月的「百科評論」上，揭載「關於生產和消費均衡的說明」一文，即是二年前在公爵邸的爭辯，再加以思索而駁擊史伊。但那時李加圖已經逝世，史



伊則在同年寄稿同雜誌，爲李加圖及自己的主張，大加辯論。西斯孟第對此，又曾略加辯駁。

西斯孟第在一八二四年二六年，重到英國。在這期間中的一九二五年，所謂最初的近世的恐慌勃發。西斯孟第觀察英國的實狀，適中先前自己的主張。不禁爲己說喜，爲社會悲。馬爾薩斯又在
一八二七年，出版『經濟學之諸定義』。其中依然固執自己的主張。而反對論者，如李加圖已早歿，
史伊也漸次修正他的主張。以下就各學者的主張加以論究。

以上，在本章所述各學者之歷史的社會的存在，和當時恐慌事實的關係，爲更明瞭起見，特揭
上表。表中各學者生涯中的小圓圈，是表示各學者重要著述出版的時期。

第三章 史伊的銷路說

一 銷路說的意義

企業家在不景氣時代中的關心，都集中在如何的去銷售商品和在何處去求商品的銷路。開拓商品的銷路的是什麼和什麼又是商品購買力的源泉的問題，是現在最緊要問題之一，但這已經經是資本主義成立當初的問題。所謂「困難不在生產而在銷售，如能容易的發見銷路，我們常可生產多量的商品」(1)一語，已是史伊在距今百十餘年前道破。他的銷路說，即是在近世恐慌的趨勢漸盛的十九世紀初頭，爲着要解答這個問題而產生的。

人稱史伊是大陸的斯密祖述者。但他不單是祖述，他對於亞丹·斯密的經濟學，不僅是使牠「更有了論理的學問的順序」，(2)更「由二三獨創的正確深遠的議論貢獻於斯學」，(3)這

已經早是當時學者李加圖承認的所在而在稱爲屬於他的獨創的主張之中，一般認爲是唯一的
主張的，即是在此要研究的銷路說（*Theorie des Débouches: Loi des Debouches*）。

史伊自己似乎也狠得意銷路說，他在他的主要著作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第五版的緒論上說：『全自然在人類支配下所引導出的理論，是熱的理論、槓杆的理論和斜面的理論。不久可以變更世界政策的，是交換的理論和市場的理論』。（4）

在和史伊同時代的學者之中，承認銷路說的獨創性的，有李加圖。他在經濟原論第一版（一八一七年）的序文中，指出爲史伊獨創見解的一個例子。他說：銷路說『包含由這位卓越的學者（史伊），最初解說了的我所相信的極重要的各種原理』。（5）

而同時代的學者，如馬爾薩斯也不一定承認史伊的獨創性。他指出類似的主張，已經由密爾敘述過。（6）

以後的學者，是最尊銷路說的一人，可以舉出布蘭克（*Banquet*）。他說：『保證這位法國學者的不朽聲名的，是他的銷路說。此說使排他主義終止，促進殖民制度的沒落』。（7）

反之，在現在的學者之中，懷疑此說的獨創性的，亦復不少。例如，里士特（O. Gide et O. Rist）教授說：『此說只不過是說出亞丹·斯密和重農學派的陳腐思想』。（8）

我們當以後觀察這種理論的歷史發展時，也要論及此說的獨創性的問題。但是，理論史的興味，不是在這種獨創性的如何，而是經過產業革命的史伊理論，是如何的不能避免時代的影響呢？並且史伊自己因着時代的變遷和一再的論爭，又是如何的發展修正呢？我們以下首先明瞭銷路說的內容後，再探究這種理論在史伊以前及史伊時的發展。最後由於從事此說的批判，從現在的理論上詳細考察此說有如何的意義。而我們在處理這些問題，相信常有從作為他的恐慌論的視角去觀察的理由。

(1) J.-B. Say: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6e édit. (1841) p. 188.

(2) 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Gonner's ed.) p. 2

(3) D. Ricardo: *Ibid.* p. 1. 2-8.

(4) J.-B. Say: *Ibid.* 5e édit. (1828),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 OIIL

(5) D. Ricardo: *Ibid.* p. 3.

(6) T. R. Mal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354.

(7) Blanqui: Histoire de l'Economie Politique (1882), p. 401.

(8) C. Gide et C. Rist: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1926), p. 133.

二 銷路說的內容

對生產物開拓銷路的是什麼呢？什麼是對商品提供購買力的呢？這就是史伊的問題。他對於此點的根本命題，是說「購買生產物的是生產物」，(1)「生產物是相互的一種購買他種」，(2)本來，他也不能不承認直接購買生產物的是貨幣。只是，他更進而着想，這種貨幣又是從何處得來的呢？如依他的意見，這只是由賣其他生產物而得。因此，購買生產物的，直接是貨幣；但究極的是其他的生產物。這種直截簡明的命題，即是他的銷路說的根本原理。

他主張這種原理，是規正世俗關於不景氣原因的謬見的。如據世俗的見解，說「他們的生產物的賣去，是緩慢困難，在利益少的時候，他們的貨幣即不足」，(3)但是，「如說「因貨幣不足而不能販賣」，這是錯誤的把手段當作原因。在這種情形所犯的錯誤，由於把不過是媒介物的東西

看成一切交易的目的。不能販賣，不是因貨幣少，而是因其他的生產物少……」。(4) 因爲，不過是媒介手段的貨幣，應着所媒介的商量的分量而調節。如在不足的時候，立刻有補充手段的信用手段出現，以補其不足。(5) 因此，如像不景氣對策之一，由現在一部分學者所倡導的信用統制策，史伊明白的排斥這是基於理論謬誤的主張。

對於這個根本原理的第一疑問，恐怕是關於軍人、官吏等等所謂不生產消費者的購買力。因爲，他們的購買力，明白的不是賣其他生產物而得的。但據史伊的見解，這些階級都是寄生於生產階級的，他們的購買力資源，首先是由收稅吏從生產者取得，其次分配於他們之間的。因之，他們的購買力，不外是生產者賣去生產物所得的購買力的一部。因此，他主張購買生產物的是其他生產物的原理。在這種情形也很適當。(6)

對於這個原理的第二疑問，更爲重要。假使購買力資源是由賣生產物而得，那麼，無生產物賣的階級——在他是地主階級與勞動階級——的購買力，又是從何處得來呢？對於這個事實，史伊的論敵馬爾薩斯主張，商品的大部分，不是和商品交換，而是被勞動交換。史伊也不能否認這個事

實，率直的承認這個事實，同時努力想維持銷路說的原理，以至變更擴張了這個名辭的內容。即是他擴張「生產物」一名辭的內容，以勞動者提供的勞務，也是一種生產物。由於以「勞動者提供的勞務，也是一種非物質的生產物」，(7)所謂以生產物購買生產物和以勞動購買生產物，在他是同一意義。他明瞭的說出此點，是在他對於馬爾薩斯抗辯的結語。他說：「你（馬爾薩斯）說商品不只是和商品交換，並且也和勞動交換。現在，假如勞動是一種生產物，此賣彼買，如買者是在消費牠，那麼，我稱勞動為一種商品，並不為過。因為勞動也是一種生產物，把牠和其他各種商品同樣看待，在你也不是大困難。因之，假如可以把這兩者包括在生產物這個共通名辭之下，您恐怕也要承認人只是以生產物購買生產物」。(8)

史伊以為不僅是勞動是生產物，就是資本提供的勞務（生產力）和土地提供的勞務（地力），都同樣的是生產物（非物質的）。主張「擴張勞動這句話，也可用於資本和土地提供的勞務，商品是為一切勞動所購買」。(9)

而這些的工資、利潤、地租等，史伊和亞丹·斯密一樣的作為價格的構成部分。因之，又形成三

階級的收入。即是，「由於生產物的價值分配於生產者之間，形成他們的收入」。(10) 因此，所謂購買力的資源，是生產物，是各人的收入，在史伊是同一意義。關於此點，他說：

「貨幣，不過是由他的土地、資本、勤勞的手段，他自己做出來的生產物的價格。……他們首先以生產物和貨幣交換，其次以這種貨幣和消費物交換。於是，實際上他們是以他們的生產物去交換，因之，他們由他們自己或由他們的資本及土地的手段所生產出的大價值，是甚麼也不能購買的」。(11) 「不論在什麼時候，我們都是以生產的勞務（土地、資本、勞動的）去購買商品。因之，我們向外部提供的生產的勞務愈多，就愈能購買多量的商品」。(12)

史伊因以收入或所得為購買力資源，更進一步以生產為購買力資源。因為各人能得到收入或所得，不外是購入土地、資本、勞動提供的勞務，以從事統一的生產工作的企業家的生產。(13) ……可以期待物品的價值被尊重被支出的，只限於某人具有取得這種物品的手段的時候。這種手段（購買力）是由什麼而成呢？即是其他的價值、其他的生產物、他人的勤勞、資本、土地等等的產物。由此看來，似乎矛盾，但結論可以說：對生產物開拓銷路的，是生產物」。(14)

要之，他以為對生產物開拓銷路的，第一是由賣生產物所得貨幣的生產物。第二是地主、資本家、勞動者、企業家等提供的生產的勞務。第三是這些各階級所得的收入。第四是企業家的生產行為。而這四種命題，如已經述過，他以為是渾然同一意義的。現在，這種議論的當否，姑作別論。由此我們可以證明他的銷路說，在一方面，是立腳於重農學派以下的物物交換說。同時，在另一方面，是立腳於亞丹·斯密以下的價格構成說及和價格構成說有連絡的分配論。

- (1) J.-B. Say: Cours Complet d'Economie Politique, 3e edit. (1852), Tome I, p. 339, 340.
- (2) J.-B. Say: Sur la Balance des Consommation avec les Production (Oeuvres Diverses 1848, p. 250).
- (3) J.-B. Say: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6e edit. (1841) p. 138.
- (4) Traité, 6e edit. p. 139-140.
- (5) Ibid. p. 140.
- (6) Ibid. p. 140-141.
- (7) J.-B. Say: Première Lettre à M. Malthus (1820) (Oeuvres Diverses, 1848, p. 452).
- (8) Première Lettre (Ibid. p. 456-457).
- (9) Première Lettre (Ibid. p. 451).

(10) Ibid. p. 449.

(11) Ibid. p. 440.

(12) Ibid. p. 451.

(13) Ibid. p. 443-450.

(14) Traité, 6e Edit. p. 188.

三 銷路說的結果

史伊更論由銷路說的根本原理演繹出的若干結果。

第一的結果。說「生產者如是多數，銷路就愈漸容易，愈成多種，愈趨廣泛」。(1) 因為，「一種生產物從完了生產的瞬間，僅價值的總額對其他的生產物提供銷路」。(2) 如增加這種生產物，則增加其他的生產物的銷路，這差不多是可以自然明白的。

第二的結果。說「各人由人人的一切繁榮而有益，一種的產業在一切產業的繁榮是有利」。(3) 這即是一種社會連帶說。在個人與個人，產業與產業間的這種關係，同時又可同樣的承

認是地方與地方、都市與鄉村、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都市人受鄉村人的利益，都市人又是鄉村人的利益根源。在被富裕的鄉村包圍了的都市，那裏可以發見多數的富裕購買者；在殷盛都市附近的鄉村的生產物，有更高的價值』(4)云云，即是指此。

同樣的，又由『一國民因他國民的繁榮而有利益，因他國民的富裕而得保證利益』(5)說『一國在其他各國之間，在緩慢的情形之下，遵着自由主義而行動，爲人道計，實可寶貴』(6)他的自由主義即由此出發，又說『祖國領土的擴張，因危害國家的幸福，故不希求。但本國的繁榮因有利於其他各國，故希望本國愈趨富裕』(7)他的『世界主義』即由此發生。

第三的結果。是說『外國生產物的輸入，有利於國內生產物的銷售』(8)『因爲，我們可以購買外國商品的，只不過是用我們的勤勞、土地、資本的生產物。其結果這種貿易即可保證我們的生產物的銷路』(9)如法國是本國內不產金的國家，在用金貨購買外國商品的時候，首先就不得賣生產物去購入金貨。無論如何，『在外國購入，不問是用商品或貨幣去支付，而銷路即可保證國民的產業』(10)如在因外債而入超繼續的國民，不待言，是不能適用這種理論的。

第四的結果。是說「純粹單純的消費——即引起新生產以外別無目的的消费，並沒有貢獻什麼於一國的財富」。(11)刺激生產和增進財富的購買力，是生產物。而不生產的消耗這種生產物，即不外乎是消耗了其他生產物的購買力。不待言，對於一國的財富，是沒有貢獻的。

因之，史伊從銷路說的根本命題——開拓生產物的銷路的是生產物——引導出的結果，在理論方面，是一種社會連帶說。至少是產業連帶說。在政策方面，是抑制國內的消費，是生產的獎勵策。對外的，是自由主義。因之，又是輸入獎勵策。所以史伊自豪的說：「不久可以變更世政策的，是交換的理論和市場的理論」。誠然，他的自由主義是受亞丹·斯密的影響。但最低限度，他的理論體系的直接根據，是可以在他的銷路說中求得的。

(1)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6e édit. (1841) p. 141.

(2) *Ibid.* p. 141.

(3) *Ibid.* p. 144.

(4) *Ibid.* p. 144.

(5) *Ibid.* p. 145.

(6) Ibid. p. 145.

(7) Ibid. p. 145.

(8) Ibid. p. 145-146.

(9) Ibid. p. 146.

(10) Ibid. p. 146.

(11) Ibid. p. 146.

四 銷路說與恐慌論

史伊確立了購買生產物的是生產或是生產物的主張，占在這種原理之上，容易的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的存在。因為，假如「購買生產物的是生產物」，(1)那麼，「人人生產愈多，購入也就愈多」。(2)「生產物愈增加，銷路就愈漸容易」。(3)如像不能販賣的商品堆積，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一般的。

但是，史伊也不能完全否定當時已經頻發的販賣停滯、不況、恐慌的事實。並且，這種事實是當

時經濟界及經濟學界的中心問題，他對此也不能毫無關心。他曾經在以這個問題為中心給馬爾薩斯的公開狀中說：「首先惹起我的注意的問題，是在世界各處市場的一般的停滯，是如何發生的呢？……當發見有利工作時所感普遍的困難，又是從何而來的呢？……」。(4)

本來，「在一定的時期，不能發見購買者而阻害流通的大量商品，是從何而來的？為什麼這些商品不能相互購買」(5)的問題，似乎沒有從他的銷路說得到解決，但他又是如何說明這個問題的呢？

「我答，不能販賣的商品或受損失販賣的商品，是因人人生產這種商品的分量過多，或因他種生產不振，超過人人對於這種商量所有的欲望，一定的生產物發生過剩，由於他種生產物不足」。(6)

「假如，那裏有種種商品的過剩或沈滯，即因其他各種商品沒有生產足和前者交換的分量，假如，後者的生產者，能够生產其他商品更多，那麼，前者即可發見他們所感不足的銷路。簡言之，一定種類的生產物過多，不過是因其他種類的生產物不充分」。(7)

由此看來，史伊是以一切的商品，沒有同時發生過剩。生產過剩常只是一定的商品發生。主張：「假如，一定的商品不能賣去，那是因他種商品沒有生產」。(8)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李加圖的物物交換說，引導出部分的生產過剩之肯定和一般的生產過剩之否定。現在也可看出史伊的銷路說，又當然是達到完全相同的結果。

只是，在此應該注意的，是史伊比李加圖更進一步，已經承認「世界各處市場的一般的沈滯」和「當得到工作所感普遍的困難」，(9)都明白的是事實。但史伊以這種一般的沈滯，決不是由一般的過剩而來。沈滯是一般的，過剩則是部分的。換言之，以一定商品的過剩和他種物品的不足，即生產部門間的比例均衡的破壞，更使販賣停滯一般化。自然，史伊關於此點的議論，不一定是明確的，並且有如後述，史伊的思想，也因着時代的經過而發展。只是，我們由史伊的論著全體上看來，相信他所以這樣的解釋，是忠實於他的主張。

然而史伊以部分的恐慌歸於何種原因呢？一定商品過剩，他種商品不足，為什麼惹起一般的流通停滯呢？

「使工業閉鎖，使商業中絕，使勞動者失業的停滯……假使這種停滯發生了，那就是企業家誤算的結果……假如農業、工業、商業等企業的指導者，能夠製造出可以適合消費者的生產物；假如他們能夠產出可以促進消費的低廉價格；假如消費者有從他們這方面有足夠提供交換物的勤勉，那麼，這種停滯就會沒有，反變成繁榮的手段。」（10）

由此可以明白，部分的過剩，第一，歸於所謂「企業家誤算」之個人的主觀的原因。因之，那又是偶然的。他說：「停滯不外乎是偶然的，因為，這是企業家的行爲。在一切種類的產業，決定應該生產的生產物，決定生產的適當的分量的，是企業家而非勞動者。」（11）

第二，資本蓄積和生產過剩的關係，史伊是如何的着想呢？他首先以「蓄積的大部分，必然是緩慢的。」（12）因為，「人人不問他的收入是什麼，在貯蓄以前首先是生活。而在此所謂生活，一般應着人人財富的程度，愈漸需要很多的費用……因此，資本是不能以擾亂生產界的速度而增殖的。」（13）因之，又沒有由資本蓄積而發生生產過剩的事。即是「不怕由性質上極緩慢的資本增殖而發生生產物的莫大過剩。」（14）是可以樂觀的原因。

第三、以國家的干涉或保護貿易主義，是一般的沈滯的消極原因。如依他的見解，販賣停滯是由於生產均衡的破壞，而回復破壞了的均衡，則是自然調節的結果。但國家的干涉或保護貿易主義，即是對於這種自然調節的最大障害。他說：

「一定貨物的銷售不良時，正是他種商品價格極端騰貴的時期。而這種騰貴了的價格，為有利於生產的動機，因之，如由於自然的或政治的——政府的貪慾無能——災厄等不可抗的原因，或是不當的手段去統制，一方面使這種不足永久繼續，他方面就不得不發生過剩。

「現在，假如可以除去這種政治的疾患的原因，生產手段就向着生產的優良方面進行，因此即可助長其他各方面的生產。假如，一切生產常是完全自由放任的。那麼，就會沒有只是一種生產先於他種前進的事。因之，如像只是一種生產物下落的事，幾乎是沒有的……」。(15)

同時，以在外國市場堆積過剩的原因之一，可以歸於保護貿易主義。「假想英國的各種法律，不由無稽的貿易差額說來制定，使可以支付英國生產物的意大利的一切生產物，在寬大的條件之下輸入國內。如然，則在意大利各港堆積的商品，或者更多的他種商品，即可容易的發見他的銷

路……」。(16)

要之，史伊繼承亞丹·斯密絕對信任放任經濟的自然調節。以恐慌由於自然調節的不完全而發生。因之，排斥各種的保護干涉，使完全的自由放任經濟成立，即是恐慌對策的第一要件。我們想到以後的學者，以自由放任經濟為恐慌的根本原因，(17)對於他們這種極端的對立，不得不感到特殊的興味。

- (1) Cours Complet d'Economie Politique, 3e édit (1852), Tome I. p. 339, 340.
- (2) Première Lettre (Ibid, p. 441).
- (3) Traité d'Economie Politique, 6e édit. p. 141.
- (4) Première Lettre (Ibid, p. 349).
- (5) Traité 6e édit, P. 142.
- (6) Ibid. p. 142.
- (7) Première Lettre (Ibid, p. 443).
- (8) Ibid. p. 441.
- (9) C. Gide et O. Rist: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1926), p. 134-135.

- (10) Sur la Balance des Consommations, Avec les Productions, (Oeuvres Diverses. p. 257)
- (11) Ibid. p. 257.
- (12) Deuxième Lettre à M. Malthus, 1820 (Oeuvres Diverses, p. 467).
- (13) Ibid. p. 467.
- (14) Ibid. p. 467.
- (15) Traité 6e édit. 142-143.
- (16) Première Lettre (Ibid, p. 446).
- (17) Tugan-Baranowsky: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1901) S. 1-37.

五 銷路說的獨創性

我們已經指出史伊的銷路說，是否出於他的獨創，學者間的議論不同。如要決定他的獨創性，首先應該觀察在史伊以前和此說有關係的主張，是如何展開的。

商品結局被商品交換的物物交換說，雖里士特教授說是重農學派及亞丹·斯密的『陳舊思想』。但在此更發生兩個問題：第一、銷路說是否只是立腳於物物交換說的主張。第二、史伊是否

無發展的重述他們的思想。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指示銷路說不僅是立腳於重農學派以來的物物交換說，更立腳於亞丹·斯密的價格構成論及與此結合的他的收入分配論。因此，至低限度，以銷路說不過是重農學派的再生產，是不當的。

第二、然則這不過是亞丹·斯密的再生產嗎？關於此點，我們也難於贊成里士特教授的主張。誠然，這是立腳於亞丹·斯密的交換論及分配論。但史伊決不是只論交換和分配，顯示有成爲一種『銷路說』的新發展，而這種發展主要是由於時代的進展。如里士特教授也承認史伊的理論上，不少產業革命的影響。在亞丹·斯密的『國富論』（一七七六年）與史伊的『綱要』（一八〇三年）之間，雖不過只有二十七年的間隔，但在這個期間的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從所未見的迅速。在亞丹·斯密時代許多沒有成問題的，如生產過剩和伴隨生產過剩而發生的近世的恐慌，到史伊的時代，尤其是在『綱要』的準備時代和『綱要』各版出版的時代，纔成爲經濟學上的中心問題。亞丹·斯密的理論發展爲史伊的『銷路說』，在這種意義看來，可以說是當然的。（1）

因此，我們不能以銷路說單是重農學派及亞丹·斯密的理論的再生產，可以看出是有新形

態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決不是和前二者無關係的，可以說是以他們的理論為前提而立腳其上。銷路說對於他二者的獨創性，即可在這種意義上加以承認。

其次的問題，是史伊的銷路說，在和他相同事情之下，受同時代影響的各學者之間，有如何關係的問題。換言之，即是史伊的銷路說，對於同時代學者的獨創性是如何。此點特別成為問題的，是和詹姆士·密爾的關係，

詹姆士·密爾子約翰司徒亞特·密爾，曾就此點說過：

「把這最重要點（銷路說的內容）真實的表現出來的功績，主要是歸於大陸明敏的史伊和在這一國的詹姆士·密爾氏。後者……在因當時論爭而著出來的，題為『商業辯護論』的小冊子中，很努力的并且很明瞭的敘述此說。」（2）

即是，他由於指出他父親的『商業辯護論』，以他父親密爾和史伊同露銷路說的功績。然則密爾在『商業辯護論』中的議論，是如何的呢？他的議論和史伊議論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我們因以後有機會詳論密爾的主張，在此無須評述其內容，僅述其結論。

詹姆士·密爾在『商業辯護論』中的主張，第一、立腳於物物交換說。第二、立腳於價格構成論及收入分配論。第三、否定一般的過剩和肯定部分的過剩。而這本小冊子的第一版，是出版於一八〇七年。(3)史伊的銷路說成爲問題，因在『綱要』第二版的一八一四年以後，似乎密爾先史伊七年前創唱此說。

並且，事實上在密爾的小冊子出版後，約十年的期間，密爾、李加圖、馬爾薩斯等經濟學者之間，稱爲『密爾氏的思想』(Mr. Mill's idea) (4)或『密爾氏的理論』(Mr. Mill's theory, the theory of Mr. Mill) (5)而加以論議。那麼，我們和賀蘭德(Hollander)氏同樣的來斷定：『關於年代上的前後，這個疑問的解決，明白的有利於密爾』。(6)可以把密爾作爲此說的創唱者嗎？如要明瞭此點，我們應該首先找出史伊在各版中的發展。(7)

(1) O. Gide et C. Rist: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1926) p. 129-133.

(2)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Ashbee's ed. 1917) p. 562-563.

(3) A. Bain: James Mill (1882) p. 62.

(4) Letters of Ricardo to Malthus 1810-1823. Bonar's ed. (1887) p. 44.

(5) Ibid. p. 49.

(6) Ibid. p. 50.

(7) D. Ricardo: Note on Malthus, edited by Hollander and Gregory (1928), p. lxxvii.

六 銷路說的發展

我們難於贊成賀蘭德氏的主張。因為，史伊的第一版在先於密爾四年前的一八〇三年出版。只是，問題是：第一、當時密爾已經知道史伊的第一版與否。第二、史伊第一版的內容和密爾的主張的異同如何。

關於第一點，我們有可以積極的主張的根據。就是在密爾的『商業辯護論』中，已經發見引用史伊的第一版。因之，應該解釋當密爾執筆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已經知道史伊的議論。

第二、然則密爾不過是史伊的再生產嗎？或者在史伊與密爾之間，可以看出有什麼的不同或發展嗎？在此我們首先不得不回顧史伊的第一版。

一八〇三年的史伊的初版，比較第二版以後的各版，全體尙是沒有完成的作品。例如，一般認

爲是史伊的功績的，如像生產、分配、消費的三分法，在初版中形態還未具備。但現在我們研究的銷路說，已在初版中作爲獨立的一章（第一篇第二十二章）。只是，分量僅占三頁半，不過是第二版的五分之一。內容因此也不免粗樸。但是，銷路說的根本命題，已經明白的在那裏展開。

「使銷路容易的，決不是貨幣的豐富，而一般的是他種生產物的豐富……此點是經濟學上最重要的真理之一……」

「國民如能支付很多的物品，就愈可開拓很多的銷路。國民如增加生產，就可以和此成比例的支付更多的物品。貨幣只是在這兩重交換的裏面，盡牠開始交換的職分。交換一終了，即可發見人人是以生產物支付生產物。」（1）

由此看來，所謂對生產物開拓銷路的是生產物的根本命題，已經明瞭。只是，這個命題的根據，如由右引用看來，不過專是立腳於物物交換說。並且由這個命題當然演繹出的，如一般的過剩之否定及部分的過剩之肯定，在銷路說中完全沒有論及。而在密爾可以說沒有銷路說的存在。第一的根據，是立腳於物物交換和收入分配論。並且向第二的生產過剩的演繹，也已經進展至相當程

度。

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密爾是受史伊的影響，但決不是單是再生產，是有了更大的發展。

反之，密爾的「商業辯護論」，以後對於史伊有什麼影響否？如要明瞭此點，應該詳細考察史伊向第二版的發展。

史伊因初版的內容，和拿破侖皇帝的政策不一致，並且拒絕皇帝要更改此書內容的希望。拋棄法制委員的顯職，陷於不遇的境地。因此種關係，第二版受政府的壓迫，不許出版，及到拿破侖失敗的一八一四年，始出問世，但在這十餘年的期間，他以一企業家，自己經營紡織業。把思索加在他的經營上。改竄舊版以後，差不多是全體改寫過的作品。

而密爾在這個期間公世的「商業辯護論」，史伊究竟知道不知道呢？關於此點，我們沒有什麼積極的根據。如據賀蘭德氏的推測，他說：「在 *Tracts* 的初版和第二版之間，經過十年間的讀書和活動的研究，如像說史伊不知道斯賓士——密爾的論爭及「商業辯護論」的內容，是完全沒有的事。」⁽²⁾ 我們也信任此說。史伊在第二版出版後不久，受新政府的委囑，再渡英視察英國

的產業狀態。他首先訪問密爾，屢次和密爾會見。又由密爾的提議與介紹，和李加圖會見。使人想到在密爾與史伊之間，已經早有交涉，假使史伊因此次渡英纔認識密爾，纔最初接近所謂「密爾氏的理論」，那麼，其影響當然是在以後史伊的第三版（一八一七年）中表現出來。但有如後述，銷路說在渡英的前後，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差別。問題是他在渡英前的第二版中的發展。

史伊的銷路說，在綱要第二版（一八一四年）中，可以看出已大體完成。其分量約初版的五倍，其內容也有顯著的進展。即根本命題的根據，不僅是物物交換說，並且採用收入分配論。向生產過剩的演繹，也當然展開，茲引用他關於後二點的話於左：

「過剩的生產物沒有發見銷路，使牠價值低落的，是因其他不足生產物的生產受阻害。如更通俗的說來，就是許多人減少購買，是因利得減少的關係」。（3）

「這種利得在一切的國家，由最大的商人以至最小的人夫，是從生產物的價值中所得的部份構成的。根據這種分配所行的比較，屬於本書第二篇的問題」。（4）

「然而有人會說：在一般交易狀態不良的時候，特別感到銷售產業生產物時的異常困難，是

從何而來的呢？我在此僅如此說：一種生產物或多數生產物的銷路缺乏，不外是一種或若干產業部門的過剩的結果。在這個時候，這種部門的生產物的分量，其存在的比一般的欲望要求更大。因此，他種部門的生產物，常發生過剩，卻又感到缺乏……」（5）

但是，這些問題密爾已早展開。因之，以史伊的第二版受密爾的影響，纔有更大的發展，並不是無理由的。

在一八一四年十二月由密爾的介紹，最初和史伊相識的李加圖。他批評史伊說：「他關於他寫得極好的問題（經濟學），似乎沒有準備容易商談的樣子。」（6）由此看來，他們的會見，直接對於學問上有如何影響，却是疑問。但見到李加圖立刻「支持史伊在他的著書第一卷九九頁，所謂需要為生產所左右的主張」。（7）自此時以來，史伊似乎很引起李加圖的注意。李加圖從前在和馬爾薩斯關於恐慌的論爭，常援用「密爾說」以證實已說；但「比較「商業辯護論」中的簡單要領，此說在「綱要」中的詳細展開，使李加圖遂不歸於此說唱導者的密爾，而歸於史伊」。（8）即在一八一七年時，李加圖已經很信任史伊的獨創性，以銷路說「包含由這位卓越的學者，最初

解說了的各種原理」。(9)並且暗暗的採用史伊的主張。(10)

在第三版(一八一七年)中，沒有表現出是受密爾及李加圖的影響的什麼發展。只是，史伊渡英的第二年(一八一五年)，是恐慌勃發的一年。因之，在一八一七年版中發展的唯一要點，是史伊對於此次恐慌的關心。此次恐慌是因英國商品的輸出過剩，我們已在前面述過。他新援用這個事實，作為說明他的第三系論的輸入增加則獎勵生產。他說：

「這個事實，今年(一八一六年)在巴西極為明瞭。航海的自由解放，使歐洲向巴西輸入的大量商品，對於這一國的土地生產物與商業，極為有利。因此，巴西的生產物，比較其他任何時代，更能銷售。於是，可以明白大輸入是有利於一國的。」(11)

而事實卻是相反，當時向各外國，尤其是向南美輸出的英國英品，幾乎各處都沒有購買的。我們在前述過，這種輸出過剩是當時的恐慌的原因。只是，我們在此注意史伊的第三版，不是受密爾等的影響，而是受那個時代事實的影響即可。

一八一五年的恐慌以後，英國、法國的經濟界，一般是繼續的不況。在一八一九年，再受恐慌的

襲來，而在這個期間準備和出版的兩種經濟原論（馬爾薩斯及西斯孟第），都是肯定一般的過剩的悲觀論。然而史伊的樂觀論，能在這種時代對於這些的反對論，始終固執他的主張嗎？此點是我們以下要檢討的問題。

- (1) J.-B.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1e édit. (1803) p. 153-154.
- (2) D. Ricardo: *Note on Malthus*; Editor's Introduction, p. lxxxii.
- (3) *Traité*, 2e édit. (1814) p. 149.
- (4) *Ibid.* p. 149 腳註.
- (5) *Ibid.* p. 148-149.
- (6) *Letters of Ricardo*, p. 52.
- (7) *Ibid.* p. 53-54.
- (8) *Note on Malthus*, Editor's Introduction, p. lxxxiv—lxxxv.
- (9) D. Ricardo: *Principles* (Gonner's édit.) p. 2.
- (10) *Ibid.* p. 273-275.
- (11) *Traité* 3e édit. p. 153-154.

七 銷路說的修正

繼承亞丹·斯密的主張，而創唱銷路說的史伊說，傳至密爾大有發展；更反響於史伊，在此纔完全告成。但一方面遭遇一八一五年的恐慌，經濟界的不況；他方面又遭逢因應這些事實的反對說，銷路說遂不得受顯著的修正了。

第一次的修正，見於一八一九年的第四版。其直接的動機，是因同年出版的西斯孟第的「經濟學新原理」。(1) 西斯孟第最初奉亞丹·斯密的主張。在一八〇三年出版的「商業之富」，和同年出版的史伊的第一版，同樣是崇奉自由主義的作品。但他自從一八一八年旅行英國歸來，深受英國當時實狀的刺激。放擲原來信奉的學說，以至發表用「新原理」的經濟學。(2) 史伊直接受的刺激，即是此書。史伊在四版（一八一九年）中加有很長的腳註說：

「西斯孟第氏像很不理解我在本章及本書第三篇第三章所述的各種原理。引用英國把工業生產物的大分量，充斥外國市場的事實，作為生產過剩的一種證據（新原理第四篇第四章）。

但是，這種事實不過是證明其他的事件。即是：英國商品過剩地方的生產的不充分。假如，巴西生產了足以購買英國生產物的物品。那麼，這些英國生產物，在那裏就不會過剩……」（3）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的，是史伊已經承認西斯孟第指摘的事實（英國商品在外國市場的過剩）。在前指出銷路說的第三系論，主張輸入的商品，開拓國內商品的銷路，因此旺盛一國的生產。他的一種證據，是以當時向巴西的輸出過剩，曾使巴西情況比較任何時代良好。但是，現在史伊卻承認在巴西和他處的過剩輸入品，在那裏沒有發見銷路。即不能開拓巴西商品的銷路，不能刺激巴西的生產，只是堆積在那裏的事實。在先主張輸入商品刺激生產。在後則說不能旺盛生產，因此輸入品過剩。

這種修正不僅直接和關於輸出入的系論相矛盾。並且和所謂生產物在生產了的瞬間，已經開拓其他商品的銷路的根本命題相矛盾。假使一定的商品，和生產同時即可發見銷路，那就沒有過剩的輸向很遠的外國市場的必要。並且在當時的事實，國內市場也發生過剩的現象。這是我們已經在前面敘述過了。

第二的修正，是在一八二〇年，受馬爾薩斯的「經濟原論」(4)的刺激。史伊得意的銷路說，一受馬爾薩斯的原論的反對，立刻發表「給馬爾薩斯的公開狀」(5)答復。但他的主張，在此又有顯著的修正。馬爾薩斯反對史伊所謂生產物爲生產物所購買。而主張生產物的大部分，無寧是和勞動交換。他指出商品的大部分，是爲占社會人口大多數之生產的不生產的勞動者所購買的事實。但史伊對於此點，如在前已經述過，僅由勞動也是生產物的主張去抗辯。

但是，不問名辭是怎樣的，修正所謂購買生產物的是生產物的根本命題，改爲購買生產物的是各人的收入或所得。可以說，史伊的論證已由第一的根據轉化到第二的根據。而在這封公開狀中，他的命題又是三變。如以購買生產物的是生產，則愈擴張生產，愈能擴張銷路。略接近馬爾薩斯的主張，卻又是正面的衝突。因馬爾薩斯以開拓銷路的是消費，生產愈擴張，銷路就愈漸狹隘。史伊則以生產愈擴張，銷路就愈漸容易。生產不受什麼的障害，擴張再生產可以無限制的繼續進行。

而最後的最重大的修正，實是對於生產無限的擴張的限制。史伊雖是已經在一九二〇年給馬爾薩斯的信中，承認這種生產的限制。但最明瞭的承認，是在答辯西斯孟第於一八二四年五月

的『百科評論』(Revue Encyclopédique)中揭載的論文，在同年七月寄給同雜誌的論文中，他說：

『西斯孟第氏說：但結果那裏是有對於生產可能的一種極限。假使人人的住居、衣服、教育及有用於享樂的生產物，是可以無限制的增加和相互的交換。但扶養人人的生產物，即最不可缺的生產物，則受土地的廣大的限制。假如漸漸不得不向遠方去取得生產物，人人就愈不得不用高價去支付。到了這個時候，由生產得來的收入，購買更高貴的食料品，就不充足。因之，新的人口增加，即不可能云云。我同意此說』。(6)

史伊自己也明白的承認這種修正，自己告白這種修正。其後一八二七年由馬爾薩斯寄贈新刊『經濟學中的各種定義』(7)他在回答馬爾薩斯的信中說：『在你的其他著書及本書中攻擊的我的銷路說，我想告白結果是受了什麼的限制。我因為很感到此點，在昨年末作為三卷出版的『綱要』第五版中（第一卷一九四頁以下），曾經說明這種限制。本來，密爾、李加圖、馬加洛克諸氏採用我關於此點的主張，英國現內閣也採用為新商業政策的基礎。但是，我想與其執着於三段

論法，無寧是執着於事實與事實的關聯的探究爲善」。(8)

然則所謂在第五版(一八二六年)中新加添的生產限制，是什麼呢？那比較對於西斯孟第的答辯(一八二四年)更一般化了。在前承認生產的限制，單是「扶養人人的生產物，即最不可缺的生產物」。卻保留「人人的住居、衣服、教育及有用於享樂的生產物，可以無限制的增加和相互的交換」。換言之，這不過是部分的限制說。但在二年後的第五版中，「已經就若干的生產物加以觀察，可以由思考推及於一切生產物」(9)的理由，這是從部分的限制發展到一般的限制了。如據此說來，一般伴隨生產的技術的困難，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則急激的增高生產費，以至生產物賣價不能償付出產費。這種生產費與生產物價格的界限，即史伊所謂生產擴張的極限。超過這種界限的生產物，已早不能使生產物需要和此成比例的增加。生產從銷路方面發生窮境，銷路說也不得不發生崩潰。所以史伊自己告白：「我的銷路說，結果是受什麼的限制」。茲引用他在第五版中的附說要點於左：

「漸趨增加的生產的極限，是如何的呢？日日增加的生產物，又在何處纔可彼此交換呢？這恐

怕是人人都想知道的問題。因為，無限制進步的，只限於抽象的分量。在實際上，事物性質上一切的極端，都受限制。而我們在此要研究的，是實際的經濟學。

「伴隨生產的困難，一般是可以由生產的勞務去克服。但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就以更急速的比例增大，以至不停滯的超過由利用生產物所生的滿足程度。在這個時候，縱然可以製造出有用的物品，但效用則比不所耗費的。因之，至少不能充實所謂價值等於生產費的生產物本質的條件……假如，人類三十日的勞動，不過是維持二十日的的生活。那麼，從事這種生產就不可能。這種生產不能助長個人的新發展，其結果也不能發生衣服、住居等的新需要。」（10）

這種銷路說關於生產限制的修正：第一、現於給馬爾薩斯的信中（一八二〇年）。第二、在對於西斯孟第的答辯（一八二四年）中纔明瞭。第三、在「綱要」第五版（一八二六年，生前最後版）中纔一般化。但最後在史伊最後著述的「講義」（Cours Complet d'Economie Political Pratique, 1828-9）中，這種限制更漸展開。

在「講義」的第三篇第二章中，史伊首先展開他的銷路說以後，其結語說：「因着產業的擴

張和資本的蓄積，人口就愈漸增加，並且愈善扶養，以至達到一定的階段，我們其次想努力指出這個階段」。(11) 因此，第三章特別研究「生產的限制」。他開頭說：

「從前章（銷路說）發生的必然結果，是在由一國的勤勞與資本所生出的生產，似乎沒有何種顯示的限制。在事實上，假如一切生產物是一種可以購買他種……那麼，結論可以說：不管生產物的分量是如何的，一切都可以發見購買者。於是，此點惹起重大的論爭。

「想來任何方面的論者，似乎都沒有充分考慮生產物一語的價值。絕對的說來，生產物不單是滿足人類欲望的一種物品，並且是效用值於費用的物品」。(12)

因之，把費用與效用換算作貨幣來比較，在費用超過效用的時候，生產物的生產或購買，以至趨於中止。因此，超過這種程度的生產，不能開拓何種銷路云云。

「我們對於各種物品，竭力想支付少。而這種物品的本源價格（即生產費），在超過物品消費所生的滿足的瞬間，對於這種物品甚廢也不能支付。

「由此可以明白，一般生產物漸次增加，一種可以購買他種的，有某種極限。超過這種極限的

時候，一定的生產物的價格過高，以至其中所含的效用，不能償付消費者得此的犧牲。在這個時候以後，生產物早不是生產物，竟至於不能銷售。其結果也不能由銷售這種物品去開拓新的生產物的銷路」。(13)

以上，史伊在銷路說中的修正，尤其是最後的生產限制說，爲什麼不得不修正呢？關於此點，他說得明白，「與其是執着三段論法，無寧是執着於事實與事實的關聯的探究爲善」。只是，到他顧到事實與事實的關聯，主要是受馬爾薩斯及西斯孟第的刺激。但不管如何，事實上是由抽象的思辯向具體的事實，一步一步的前進的。而他「和建樹空想的經濟學的抽象基礎的活潑鬭爭」，則在最後的第五版中更完成他的最後著述的「實踐的經濟學講義」。(14)但他因着由抽象的向具體的進展，銷路說的修正也愈漸進展，生產限制說也漸漸詳細的展開了。我們在此似乎學到什麼知識。

(1) S.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1819.

(2) Ditto: *De la Richesse Commercial, ou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Appliqués à la Legislation du Commerce*, (1808).

- (3) J.-B. Say: *Traité*, 4e édit. p. 155-156.
- (4)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 (5) Say: *Troisième Lettre à M. Malthus* (*Oeuvres Diverses*, p. 472-486).
- (6) Ditto: *Sur la Balance des Consommations avec les Productions* (O. d. p. 256).
- (7) T. R. Malthus: *Dé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1827).
- (8) Say: *Lettre à M. Malthus*, 24 février 1827 (O. d. p. 504-505).
- (9) *Traité*, 5e édit. (1828) p. 185.
- (10) *Ibid.* p. 194-195.
- (11) *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1852) Tome I. p. 345.
- (12) *Ibid.* p. 345.
- (13) *Ibid.* p. 346-347.
- (14) *Lettre à M. Malthus* (1829) (*Oeuvres Diverses*, p. 505).

八 銷路說的批判

在當時的英國，產業革命完全告成，生產力異常發展的結果，生產有了顯著擴張的可能性。但

因戰爭的勃發、終止、進展等動機而惹起生產過剩。其結果又使恐慌頻發，生產沈滯與銷售停滯先後一再發生。說明這些的現象，探求這些的原因而講究對策，是當時經濟學者所負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一種任務。可以看出史伊的銷路說，也是客觀的對於這種問題的一種解答。

現在，如由這種見地來詳細考察他的主張時，銷路說雖他自己也很自負，但不能說是收得有期待的成果。第一，說明當時的現實，尚不充分。如我們已經見到的，當時的過剩或沈滯，已經相當程度的一般化。尤其是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現象更漸一般化。但他似乎沒有向他有利的方向前進一步。過剩或沈滯，一般認為是景氣的變動，是現在經濟界的一般現象，這是任何人也不能懷疑的。不待言，在任何情形也不免有例外的事例，但不能因這種例外而否定恐慌或景氣的一般性。

● 第二，因之，恐慌對策的自由放任論，也不是妥當的主張。因為，其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暫時是大大體遵奉他的主張，放任經濟的原則，也被是認被實現。恐慌或過剩也應該依着他的主張漸次減少了。而事實卻是反對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後半，竟至有和他的主張正相反對的，以放任經濟為恐慌原因的學說出現，他關於此點的見解，也受了事實的反證。

然則他的主張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我們在此必要是他的內在的批判。

第一、他的研究因爲歷史的存在，就應該率直的由認識事實出發。但他首先「執着於三段論法」，從不願現實事實的思辯出發。於是，由思辯而成立的銷路說，一受實證論者反駁的刺激，就「執着於事實與事實的關聯的探究」加以很多的修正，不得不歪曲最初的主張了。

第二、陷於離開現實的思辯的抽象方法，在史伊也不能免此。他首先不注視賣買關係中的貨幣，認爲是物物交換。但是，這種抽象論所教我們的，只不過是證明在物物交換時代的生產過剩的不可能而已。這和現在的現實社會，並沒有什麼因緣。關於此點，我們在以後批判李加圖時要詳論，在此無須詳細論究的必要。

只是，從物物交換說引導出銷路說，由銷路說去否定一般的過剩，其自身就不免包含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因爲，所謂以生產物購買生產物，因此常可發見銷路的時候，前提已經包含結論。所謂生產物以生產物去購買的命題，如史伊自己也當然承認的，是表明賣生產物而得貨幣，以所得貨幣去購買生產物。然則這種命題已經以生產物向貨幣的轉化爲前提，以銷售的可能爲前提，以銷

路的存在爲前提。而我們要證明的，不是銷售的可能嗎？不是銷路的存在嗎？爲證明銷路的存在，以銷路的存在爲前提。所謂因銷路存在則銷路存在，這究竟是論證什麼呢？

但是，史伊受反對論者反駁的刺激，他的論據又無意識的不明確的由物物交換說推移到收入分配論。如以收入或所得爲購買力資源，這已經和論敵馬爾薩斯及西斯孟第的主張大同小異。在馬爾薩斯的問題，是以資本家收入的一部，追加於資本從事生產擴張時，增加了的生產物與由於資本家階級蓄積的消費減退，如何纔可以保持均衡。在西斯孟第的問題，是以這些和勞動者階級的消費減退，能否保持均衡。而史伊則以收入更還原爲收入根源的生產，以生產是開拓銷路的根源。

假如，已經以生產自己開拓銷路，那麼，抽象的想來，生產可以無限制的擴張，再生產就可以永久的進展。因爲生產自己產出需要開拓銷路，生產在這方面就有全無止境的天地。史伊的生產無限制說，即由此展開的。但如我們已經知道，他又由修正而放棄，代之以生產限制說。但是，史伊的生產限制，和馬爾薩斯及西斯孟第歸之由於消費減退的銷售困難相反。完全在生產中去探求，即是

生產費的遞增。他所謂生產費遞增以至不能償付賣價的主張，馬爾薩斯、西斯孟第所謂生產費的購買需要遞減的主張，都不過是就相同事實的兩面。只是，在他們之間沒有超過的界限，是這種生產的限制或極限，史伊以為在將來只有一次到達的境地。反之，馬爾薩斯與西斯孟第則以在現實的社會，是一再發生的現象。

最後，銷路說不注視貨幣，並且也不注意信用。在現在資本信用發達的社會，創造企業家的需要或銷路的主要是關於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的信用。因之，銷路說把資本信用置之度外，假使得到什麼結論，直接並未說到現實社會的什麼。在現在的社會，生產的增加，雖可增加購買力，但購買力的增加，却不一定是由於生產的增加。本來，在我們的思維過程，不注視貨幣和信用，不僅是不得已，並且也有必要。只是，假如只以思辯去說明現實的社會，去說明實際的現象，則是很難。現在，假如史伊的銷路說沒有得到期待的成果，那麼，其責任就不歸於他的抽象的思辯，而是他以抽象的思辯觀察現實社會的態度。

第四章 詹姆士密爾的需給均衡說

一 需給均衡說的意義

對於因着產業革命的發展，同時漸趨成立的英國資本主義，常感受痛苦的過渡恐慌和近世恐慌的事實，用何種理論去說明或由如何政策去克服的問題，是古典派經濟學家所負任務之一。

我們已經在前一章中，檢討史伊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在他的銷路說中，以開拓生產物的銷路的，是生產物或是生產。一部分的生產物，沒有發見銷路而陷於販賣停滯或恐慌，即因其他購買生產物的生產物不足。因之，要克服恐慌或生產過剩（一部分的），就應該增加其他的生產物。換言之，史伊對於恐慌的政策，是歸著於生產獎勵策。

但和生產獎勵策對立，有可稱為消費獎勵策的見解。主張要克服恐慌，打開生產過剩，須與旺

國民的消費。要創立生產事業，期待經濟的繁榮，就應該獎勵國民消費，喚起需要。這種見解已早見於法國的重農學派。說「消費是擴張生產的尺度，消費如愈興旺，生產就愈漸隆盛」。(1)

而繼承這種主張宣傳於當時英國的，有斯賓士 (W. Spence)、科伯特 (W. Cobbett) 一派，他們以財富的根源是地租，商業不能增進財富一點，立腳於重農學派的根本思想。同時又是繼承右述消費重視說。但和這一派的主張對立，繼承史伊而宣揚生產重視說於英國的，即是在此要研究的詹姆士·密爾 (James Mill)。

密爾的主義，是繼承史伊。但在種種意義上，並非照樣重述。如暫就他們的根本主張看來，史伊早以對生產物開拓銷路的是生產物，需要生產物的是生產物，而歸著於需要即供給。密爾則以供給生產物，是需要其他的生產物，而歸著於供給即需要。不待言，兩說不過是相同事件的不同表現。因之，密爾根本是和史伊沒有什麼不同的主張。只是，事物的相反，不一定是真理。由需要即供給的史伊說，而說供給即需要，這不一定是能斷定的。

例如，史伊所謂需要即是供給的主張，是表明如何的事實呢？我們要需要物品，首先賣去所有

的，然後把所得的貨幣來幫助需要。即是表明為需要首先以供給為前提的事實。但密爾所謂供給即是需要，是表示我們供給物品，為的把由此所得的貨幣去需要其他的物品。史伊主張是為買就不得不買，密爾是說賣是為的是買。可以說，密爾是贊成史伊的主張而加以補充。不過史伊是說需要和供給均衡，密爾是說供給和需要均衡而已。由此，我們可以大概知道銷路說和需給均衡說的關係。

(1) Mercier de la Rivie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L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1767).

二 『商業辯護論』中的均衡說

密爾最初著述的『商業辯護論』(1) (第一版一八〇七年，第二版一八〇八年)。如已經述過，是為反駁英國繼承重農學派一派的主張，而公開的小冊子。這一派在當時受拿破侖大陸封鎖令的影響，『英國商業類於極端困難危險，不以喪失商業為苦，反以為得的時候』，(2) 宣傳重農思想。

密爾的小冊子，直接是反駁斯賓士的『英國商業獨立論』。(3)如由標題爲『商業辯護論』，斯賓士氏科伯特氏及其他之『商業非國富之根源說』。(4)可以明白他排斥這一派的重農思想，而主張商業是增進國富的。但後世認爲這本一冊子有存在價值的，不是這種根本主張，而是他關於消費的主張。卽是我們在此要研究的主張。以下檢討他關於消費的主張。

密爾首先反駁重農學派重視消費，憂慮生產過剩。他說：

「經濟學者和信奉經濟學者的人們，他們憂慮資本不會過於急速的增加嗎？商品生產不會過於急進嗎？他們說：因爲只有一定分量商品的市場，假使超過這種分量而增加供給，那就不能處置這種過剩。」

「而在經濟學上，比較任何命題還要確實的，是說商品的生產，創造生產了的商品的市場，並且是創造市場唯一的普遍原因……」

「因此，在一定的時期，在一定的國家，使購買力增加的財產分量的增加，常在相同的瞬間，正確的造出和此相等的代價。因之，決沒有使資本或商品自然的過剩的……」。(5)

然而商品的生產或供給，何故能創造商品的市場或需要呢？此點密爾也和其他許多論者相同，首先立腳於物物交換說。他說：

「斯賓士氏在某處忠告讀者說：考慮貨幣，因常引起混亂，應該就一切交換都是用物物交換方法施行的國家的國情，加以考察。假如，現在他依着他自己的忠告，他就會承認生產對生產物創造市場。」

「把貨幣放在問題以外時，每年相互交換的，實際上不是那一國的種種商品嗎？即每年產出的種種貨物嗎？……在實際上構成那一國每年的買賣的，不是那一國財富的一半嗎？……種種財富的全體，其一半和他一半交換，市場就常和供給相等。因此，一國的需要，常常看出和一國的生產相等。」(6)

因之，密爾的議論，如限於物物交換說，不問他的表現方法是如何，內容卻是照樣祖述史伊的主張。在密爾的『商業辯護論』中，明白的引用史伊的 *Traité* 第二版，例如密爾說：「最近的法律作家史伊氏，在他的經濟學綱要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第五篇第三章中，關於此

說的實踐者（此說指重農學派的消費說）有一有趣味的插話。他說：「一個青年，要銷去玻璃的空瓶，於是把牠拋棄到窗外去，我知道他是說，這是獎勵瓶製造業。」（7）近來 E. Teilhae 氏引用這個事實，作為「銷路說的萌芽」。

但是，商業辯護論（8）不單是終止於祖述史伊的第一版，相同的主張，更由他種論據附以理由。即是根據價格構成論和收入分配論。密爾說：「一國的需要，精確的是一國的購買力。然而購買力是什麼？無疑的，其範圍是每年的生產物……一國每年生產的各分子，成為各個人的收入。而國民的任何人，都是同樣以他的所得的總額，去購買或是作和購買相同的事。單是向着消費的各部分，明白的是用於購買。但作為資本用的部分，也是一樣的把牠支給各勞動者，作為他們的工資。以便他們去購食物或其他的必需品，或是用於購買原料。」

「因此，一國每年生產物的全體，是用於購買。但賣出的因為也是每年生產物的全體。於是，可以明白每年生產物的一部分，是用於購買他一部分，不問每年產物是如何大，常是產物自身創出市場。同時，作為資本用的部分，不問是如何大，結果常使國家更加富裕，人口更加稠密。決不致使國

民市場混亂或是過剩的」。(9)

最後，商業辯護論不僅加有新根據，並且論到這種主張的當然結果。在這一點我們又應該承認在密爾的發展。所謂銷路說或均衡說的當然歸結，不待言，是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及肯定部分的生產過剩。

第一，在「商業辯護論」中的一般過剩的否定論，由敘述過的地方可以明白。如再指出，如說：「……某國民決沒有使資本或商品自然的過剩的。」又如說：不問蓄積資本的部分是如何大，「決不致使國民市場混亂或是過剩的。」都是否定一般的過剩。

第二，否定一般的過剩，不一定是表示否定部分的過剩。此點密爾和許多論者相同，肯定部分的過剩。他說：

「一國雖是沒有必要以上的一般商品，但應注意某一商品容易達到必要以上。」

「某一商品的分量，容易超過適當的分量以上。但這種情形，是表明他種商品沒有生產充分的分量……把用於生產過剩商品的生產手段的一部，用於生產其他的商品，商品即可彼此成立的。」

均衡」。

「如適當的維持均衡時，就常沒有過剩的商品和無市場的商品。並且事物的自然秩序，有保持均衡的強有力的傾向。政府如不是無謀的加以干涉妨害……就可常精確的維持均衡」。(10)

由此看來，他的主張是以生產方面的均衡破壞，纔會發生部分的特定商品的過剩或不足。但這種過剩或不足，不僅是由於資本的自由移動的均衡的恢復，可以矯正。而恢復均衡的自然傾向，也常存在於社會。

以上，關於密爾在商業辯護論中的議論：第一，不僅是祖述史伊的物物交換說。第二，價格構成論及收入分配論，更發展了史伊的論據。第三，由否定一般的過剩和肯定部分的過剩，更擴張了史伊主張的結果。

因此，商業辯護論出版以後，約有十年的期間。在當時的經濟學者，如密爾、李加圖、馬爾薩斯等之間，名這種主張為「密爾氏的思想」。(11)或「密爾氏的理論」。(12)有彼此膾炙於口之概。例如，李加圖在一八一四年九月十六日給馬爾薩斯的信中說：

『……假如，你以為因着資本的增加，人人就不注意消費及蓄積。在反對密爾氏所謂一國民的供給決不得超過需要一點，是正當的。但資本的增加，不引起對於各種類奢侈的嗜好的增加嗎？』⁽¹³⁾

一八一四年，史伊的 *Principles* 第二版出版。其銷路說大體完成。其後不久，史伊旅行英國，直接和密爾、李加圖等交識。於是，『密爾氏的思想』的地位，漸被史伊的銷路說奪去。尤其是李加圖推稱史伊不置。在這種情形之下，密爾靜靜的思索他的主張，見着史伊的銷路說穿着新裝出現，應受有重要的刺激。因此，更深入的『密爾氏的理論』，成爲他一般經濟理論的一部，即是一八二一年公刊的『經濟學要論』。⁽¹⁴⁾有如伯恩(A. Bain)說：『這本書，是把密爾氏二十年間關於這個問題的思索、議論、記述等總括起來，建有秩序的作品』。⁽¹⁵⁾我們即進而加以檢討。

(1) James Mill: *Commerce Defended* (1807).

(2) A. Bain: *James Mill* (1882) p. 62.

(3) W. Spence: *Britain Independent of Commerce* (1807).

(4) *Commerce Defended, An answer to the arguments by which Mr. Spence, Mr. Cobbett and*

others, have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commerce is not a source of national wealth.

- (5) Commerce Defended (1808) p. 80-81.
- (6) Ibid. p. 82-83.
- (7) Ibid. p. 76.
- (8) E. Teilhas: *L'Oeuvre Economique de J-B. Say* (1927) p. 8-6.
- (9) Commerce Defended (1808) p. 83-84.
- (10) Ibid. p. 84-85.
- (11) Letters of Ricardo to Malabue, 1810-1823, Bonar's ed. (1887) p. 44.
- (12) Ibid. p. 50.
- (13) Ibid. p. 43-44.
- (14)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1).
- (15) A. Bain: James Mill (1862) p. 193.

三 個人的需給均衡

密爾首先主張需要與供給在各人是相互均衡的。換言之，各人供給的，即是其人需要的。他順

次論證此點。

第一、自給生產的情形。在這種情形，嚴格的說來，是沒是需給存在。「一人只限於消費生產了的。適當的說來，那裏就沒有供給，也沒有需要」。(1)不過是只有生產與消費。因為是為自己消費而生產。「他如生產了自己需要的一點，就停止生產」。(2)因之，那就不致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生產與消費是均衡的。這種自給生產的情形，也可以說供給在各人是正確的適合於需要。

第二、過剩生產的情形。如據密爾的意見，現在供給市場的商品，是自己消費以上的生產過剩品，為交換目的而把過剩品拿到市場的時候，纔開始發生供給和需要。「供給與需要，是關於交換，關於賣者與買者」。(3)然而這種情形的供給，何故得和需要一致呢？

各人把自己消費的過剩品供給市場，不外乎是想交換得他種物品。「假如一個人在自己的需要以上，更生產了多量的貨物，那只是為一件事；即是他需要和他的生產剩餘交換而得他種貨物」。(4)換言之，供給商品於市場，是需要相等的他種商品。例如，供給有一〇〇價值的小麥，是需要有一〇〇價值的他種商品。

如據密爾的見解如：「要構成需要，有兩種必要的：第一，對於商品的欲求。第二，給與商品的代價。需要是表示購買的意思與購買的手段。」（5）所謂以商品供給市場，是表示由此購買他種商品的意思，並且表示是供給量的購買手段；就不外乎是表現需要。這即是供給即需要。

在此，密爾的需給均衡說有一種特色。本來，所謂需要供給一致或均衡的時候，是以供給和需要是兩種相對立的，因為是相對立的，纔可以說一致或均衡。而密爾則以為是一物，供給即是需要，不過是一物的兩面而已，因之，實際上兩者最初就是均衡一致的。這即是他的均衡說有形而上學的均衡說之稱的原因。把此點表現得最明白的，是密爾的左面一文。

「需要與供給，在特殊的方法上，是有關聯的意義。供給的商品，常同時為需要手段的商品；需要手段的商品，常同時為加於供給存品的商品。所有的商品，常同時並且一時是需要品，是供給品」。

「兩人行使交換，不是一人只拿的有供給，他一人只拿的有需要，而是兩人都拿的有供給與需要兩種。一人拿出來的供給，即為他的需要的手段。因之，他的需要與供給，自然是正確相等的」。

(6)

因此，在這種意義的需給的均衡，是個人的需給均衡，不過是說需給在各個人是均衡的。甲拿出來的供給，和甲所需要的一致；乙拿出來的供給，和乙所需要一致，只是在說這種事實而已。

因之，第一，不是說各個人間的個人的均衡，甲拿出來的供給，和乙所需要的均衡與否；乙拿出來的供給，和甲所需要的一致與否，不在這個命題的範圍。

第二，不是說一定商品的需要與供給均衡，只是說綿絲生產者拿出來的綿絲供給，是需要和綿絲價值相等的他種商品。綿絲的供給與所需要的一致與否，也不在這個命題的範圍。

所以，所謂需要與供給在各個人是均衡的命題，完全是同一意義的反覆說明，沒有特別成爲問題的價值。自然，密爾不是研究這個命題的價值，實不過是作爲論證社會的需給之均衡的前提。然而如何論證社會的需給均衡呢？以下即加以檢討。

(1) James Mill: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III ed. (1826) p. 229.

(2) Ibid. p. 228.

(3) Ibid. p. 229.

(4) Ibid. p. 228.

(5) Ibid. p. 230.

(6) Ibid. p. 232.

四 社會的需給均衡

社會的需要全體與供給全體，是社會上各個人的需要及供給的總計。而各個人的需要及供給，有如前節所述，在各個人是相互一致的同物。因此，統計社會的全體需要與全體供給，又必然是一致的。

例如，甲供給有一〇〇價值的綿絲，同時需要有一〇〇價值的他種商品。需要與供給，在甲同是一〇〇，是一致的。同樣，乙供給有一五〇價值的綿布，同時需要有一五〇價值的他種商品。由此推及於丙、丁，最後總計這些人的需要和供給時，兩者必然是一致的。因為，兩者本來是同一數值的關係，例如，前例甲、乙實供給的合計為二五〇。同時合計需要亦為二五〇。

密爾說：

「假如，各個人的需要與供給常是相等的。那麼，總計國民中各個人的需要與供給，也應該是相等的。因此，不問每年生產的分量是如何，決不能超過每年需要的分量。」（1）

在這種意義的需給之社會的均衡，只不過是說社會上需要的總價額，和供給的總價額是一致的。並不是說構成總價額的各種商品價額，需給是相互均衡的。因之，並未否定一定商品的供給價額，超過商品的需要價額，即可發生一定商品的生產過剩的事。如就各商品看來，社會的供給與需要，究竟均衡與否，則不在這個命題的範圍；就是這種意義的需給之社會的不均衡，密爾亦未加以否定。

「在此所說需要與供給的情形，明白的我們是就總計而言。我們說在特定的國民和特定的時間，其需要等於供給時，我們並不是表示某一種或兩種的商品。我們要表明的，是說如總計對於各種商品的需要額，是等於各種商品的供給額的總計。

「這種供給和需要的總額，雖是相等，但某一種或多種的商品，超過對於這些特定商品的需

要或生產不足，是極易發生的』。(2)

因此，密爾所謂需給之社會的均衡，不是所謂生產部門的均衡問題。並且，密爾所謂均衡，是事實上常存在於現實的均衡，並不是一種傾向或理想的均衡問題。即是，各生產部門或各商品的需給均衡，密爾也認為在現實是常不能保持的。例如他說：

『……現在，假如想像對於織造品的需要，雖是同樣的停止，而供給則顯著的增加。但因需要沒有增加，織造品自然就會供給過剩』。(3)

但是，密爾並未以這種供給過剩是能够永久繼續的。換言之，就是在各生產部門和各商品，需要與供給也有互相均衡的自然傾向。更以這種自然的社會的均衡傾向，要是原因於伴隨不均衡的利潤率的不平等，在生產部門之間發生資本的移動。密爾關於這些的見解，和亞丹·斯密並無不同。他說：

『因為需要及供給各部分缺乏適合，實際惹起的各種結果，是一般都知道的。即是，偶然過剩存在的商品，其價格下落；分量不足的商品，其價格騰貴。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市場變動。』

「過剩品的價格下落，因為利潤減少。一部分的資本，就由這種生產部門提出。不足品價格的騰貴，更向生產部門加入不少的資本。於是，利潤遂趨平等，需要與供給遂相互適合。」（4）

要之，密爾以社會的需給均衡，和個人的需給均衡相同。不是說社會的供給和需要，是一致的，是均衡的。他以社會的供給，即是社會的需要，兩者的均衡或是一致，最初就明白的。兩者是同一事實的觀念不同，同一數量的兩面。因之，密爾承認有這種意義的社會均衡存在的時候，更有他種意義的需給不均衡的存在；即一定商品的需要和供給的不均衡，或生產部門間的不均衡的存在。但又認為這種意義的不均衡，由於資本移動的自然調節作用，有社會的均衡傾向。在此點，他占在古典派經濟學共通的『社會調和的一般理論』。（5）

(1)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III ed. (1826) p. 232.

(2) Ibid. p. 230.

(3) Ibid. p. 234.

(4) Ibid. p. 235.

(5) W. Heinrich: Grundlagen einer Universalistischen Krisenlehre (1928) S. 6.

五 需給均衡說與恐慌論

市場上一切商品供給之社會的總量，和對於這些的商品需要之社會的總量均衡。換言之，供給總量即是需要總量的密爾說，同時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否定一切商品同時陷於生產過剩。假如，一切商品同時陷於生產過剩或供給過剩，那就是生產或供給的總量，超過需要的總量。因之，這直接和密爾的需給均衡說衝突。如供給的總量已是需要的總量，那麼，供給在總體上，在社會的任何部分，應該發見和此相對應的需要。如像沒有發見需要的供給部分，不能認為是有的。即是，供給比需要過剩的事是沒有的。如說：

「說供給的總量在沒有和此相等的需要總量時，是沒有的，是必然的真理時，由此可以引導出所謂全體商品的供給過剩嗎？……」

「我在我的論證上主張的，是說全體的供給過剩是沒有的……。」（1）
但是，全體的需給一致，不一定是表明部分商品的需給一致；同樣的，否定一般的過剩，不一定

是表示否定部分的過剩。雖沒有全體的商品過剩，卻以為有各個商品的過剩。

「雖不能否定各人的需要，等於他的供給。但他所希望的購買者，不能在市場上發見也未可知。要他賣出的商品的，在市場上沒有也未可知。」（2）

如前節已經述過，關於特定的商品，供給和需要不一定是均衡的。因之，特定商品的供給過剩，由他的理論，也不能否定和肯定。他肯定部分的過剩，其積極的根據，無寧是注重事實。他說：

「對於這個理論發生反對，即是說屢次發見各商品比需要過剩的事，這是事實上有的事，不能否認。」（3）

然而這種特定商品之部分的過剩事實，是如何說明的呢？

「因為各人互相具有相等的需要和供給。現在，假如某種商品有比需要還要大的分量，其他商品就會不足……」

「現在，假如對於織造物的需要，雖同樣的停止，而供給則顯著的增加，但因沒有需要的增加，織造物自然就會供給過剩。」

「但是，必然有和此同分量的他種物品的缺乏。因為，織造物生產過剩的分量，只是由於唯一的手段，即是，由於從其他商品生產提出資本，減少其他的商品量，纔可以生產的關係……」

「因此，在一定的國度，一種或各種商品超過需要，而說其他種種商品並無比較需要不足的事，決定是沒有的。」（4）

因此，在一定商品部分的過剩存在時，其他商品之部分的不足，常存在於他方。但最初爲什麼惹起一定商品之部分的過剩呢？關於部分的過剩原因，密爾和其他論者相同，主要歸於個人的主觀原因。即以爲是企業家誤算的結果，超過對於特定商品的需要，特定商品生產過剩。他說：「在特定的情形，由於誤算，可以發生過剩或不足。」（5）

但特定商品的供給過剩，亦如在前所述，常有被矯正的傾向。即是因資本移動的自然調節。他說：「其結果是如此的，現在一生產特定商品，就有比普通利益還要少的一定種類的商品。在他方面，又生出比普通利益還要多的其他商品。這種不平等，立刻可以自己矯正。這是對於增殖一國生產所行的方式。在國民的財富，由最大的缺乏到最大的過剩的各種階段，明白的是同樣的方式。」

(6)

要之，密爾的恐慌論，在由肯定部分的生產過剩，和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而成一點，與前章所述史伊說及以後要述的李加圖說，其結論並無不同。只是，密爾主要立腳於獨特的需給均衡說，和需給同一說一點，可以認出是他的特徵。

(1)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III ed. 1826) p. 238.

(2) Ibid. p. 233.

(3) Ibid. p. 233.

(4) Ibid. p. 234-235.

(5) Ibid. p. 241.

(6) Ibid. p. 241-242.

六 需給均衡說的批判

有如前述，密爾的恐慌論是立腳於他特有的需給均衡說。而他的需給均衡，根柢又是在個人

的需給均衡說，所以我們不得不首先檢討個人的均衡說。

密爾的個人的均衡說，正確說來，不外是說各個人的供給，即是各個人的需要。就是供給即需要說，需要供給同一說。這本來是同一物，一致均衡與否，最初就沒有成爲問題的性質。根本上說到一致或均衡的時候，應該有兩種以上各別的東西。因爲有各別存在的獨立物，最初一致或是均衡，不是纔可以成爲問題嗎？

在普通想到需給是個人的一致時。所謂需給的意義，不是指各個人最初併存的需給。問題是在某個人的供給，和其他人人的需要比較，兩者一致均衡與否。而密爾的個人的均衡說，對於這種意義的需給，甚麼也沒有說。

在普通的意義上，需給是個人的均衡時，問題主要是就需給對於個人生產的商品：某個人供給的一定商品的分量，和他個人對於這種商品的需要分量，均衡與否。而在密爾的問題，這種商品的種類，完全抽象的除去，而只是價值量。所謂某個人的供給即需要，不過是說某個人的供給價值量，等於某個人的需要價值量。商品種類不成問題。個人對於一定商品的供給，和人人對於一定商

品的需要均平衡否，完全沒有作為問題。因之，密爾所說的供給，是指特定商品的供給；但所謂需要，不是對於特定商品的需要，而是指對於其他多數商品或不定商品的需要。

然而在密爾所說的需給，果如他所說的一致或均衡嗎？換言之，各個人拿出來的供給，即表示是各個人的需要嗎？這就成為問題。在密爾的思考前提，是豫想由商品生產或供給所得貨幣價量的一切，立刻支出購買其他的商品。這種前提是正確的嗎？

在由商品生產或供給所得的貨幣量之中，向工資支付的部分，其大部分即成需要，以購買其他的商品，因此，想這部分沒有大問題。問題只是在歸於資本家、地主或企業家所得的利潤和地租。只在利潤及地租之中，立刻成為他們需要而購買其他商品的部分，即在貨幣形體而蓄積的部分，纔是現在情形的問題。密爾自己也並不是沒有見到此點。但以貨幣的獲得或蓄積，結果是把牠支出購買其他商品或勞務。他說：

「說他拿的有等於供給的需要來，完全是必然的真理。因為，他為得什麼而拿財貨去交換。雖說他或者只要貨幣，但並未發生什麼的差別，因貨幣即是財貨，並且人人要貨幣，不外是為的支出

貨幣以得到生產的或不生產的消費物品』。(1)

但是，在現實的事實，在個人方面，貨幣只作為貨幣而蓄積的情形不少。誠然，究極目的是為充於購買什麼而蓄積也未可知。但在實際上，那單是止於目的或意識。到現實的支出貨幣，時間上有長期間的間隔，並且時間上是完全不定的情形也不少。因此，現實的問題，解釋這部分的貨幣量，不是全部成為需要，卻還近於事實。最低限度，一定期間所蓄積的需要和供給是不一致。而蓄積進行如愈急速，不是愈有釀成生產過剩或供給過剩的可能性嗎？

只是，這些個人蓄積的貨幣，為社會蒐集起來，作為從事新企業的資金而運用時，蓄積貨幣即表現需要。但在這種情形，問題不僅是已經由個人的均衡進到社會的，並且又不能不注意時間的經過問題。要之，假如承認有何種形式的未利用資本，存於個人或社會的事實。那麼，在個人的需給同一說中，即有不可否認的弱點。

再進而批判社會的均衡問題。密爾在這種情形，也不過是說社會的供給總量之貨幣價值量，和社會的需要總量之貨幣價值量一致或均衡。正確說來，與其說一致或均衡，無寧說兩者本來是

同一物。但密爾的社會的均衡說，是立腳於我們已經批判了的個人的均衡說之上，似沒有再批判的必要。然不問個人的均衡說的當否，只是社會的均衡說，尤其是此說和密爾恐慌論的關係，認為值得再加以檢討。

第一、普通所謂社會的均衡，主要是指在一社會各種生產間的均衡問題。即是，大之是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手段的生產，小之是生產手段相互間的各種生產與消費手段相互間的各種生產；在這一切的生產間，常不保持一定的均衡，則社會生產不能圓滑進行。所謂這種均衡破壞即是恐慌原因，是由多數學者所主張的。但密爾則沒有以這種均衡為主要問題。因他所謂需要和供給，不是對立的而是併立的同一物。但密爾也不能完全不注意這種意義的均衡問題，事實上不得不承認為特定商品的過剩或不足。不過主張這種意義的均衡破壞，也可在他所謂均衡狀態之下發生。

第二、因之，密爾的需給均衡說，問題又不是關於在一定社會所生產的特定商品的需給。在普通的意義，說到需給之社會的均衡時，問題是一定商品之社會的供給與社會的需要的均衡。但密

爾所說均衡和此並無關係。只不過是說兩者的價值總額相同因之一致不是就價值總額具體顯現的商品而言。各個商品已或過剩或不足，則全體商品也決不能具體的需給一致。他不注視價值具體顯現的各個商品，問題只是在抽象的價值總額的均衡。在具體的商品，如就全體看來，需給也決不是均衡的。

第三、已經述過，密爾由肯定抽象的價值總額的均衡，以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由否定特定商品的需給均衡，以肯定部分的生產過剩。而在此的問題，是否定一般的過剩之前提的，社會需給的均衡，在密爾的意義，也可肯定常為事實與否。如密爾自己也已經承認的，特定商品的過剩或不足，是事實存在的。現在說某企業家個人的誤算結果，僅特定商品的供給陷於過剩，即是表明過剩部分的不能賣去。因之，賣此而購入他商品的企業家的需要，不得不減少其過剩的部分。即是，他以供給量的全部沒有需要，表示僅是供給過剩部分的需要不足。如由假定企業家的供給，已經超過他的需要，而其他企業家沒有變化，則社會全體的供給，亦不得超過社會全體的需要。既然肯定特定商品的過剩或不足，又肯定那是事實，所謂社會的總需給均衡的前提，結果不是發生崩潰嗎？而

占在這種前提否定一般的過剩，也是由這種理論難於承認的。

部分的過剩之理論上及事實上的肯定，由企業相互關係的理由，不是又可推及於一般的過剩嗎？此點俟以後的機會再論。如已在本論第一章的考證，在當時過渡的恐慌，恐慌決不是止於單一的企業。是由一企業及於他企業，更由一生產及於其他生產，一產業以及於其他產業，已經是相當程度的一般化。因此，密爾肯定部分的過剩，同時否定一般的過剩的主張，在事實上理論上，都有批判的餘地。

最後，否定一般的過剩，在現在的理論，差不多無須理論上的議論，不是由以後事實的發展證實了嗎？在現在的許多經濟現象，所謂物價的漲跌，利息的高低，工資的高下，所謂生產的伸縮，所謂景氣的變動，不是關於各個商品或企業的現象，應認為是社會上的一般現象，這是差不多無人置疑的。而在密爾，就如物價變動和市場變動，不認為是一般的運動，例如他說：「偶然過剩存在的商品，其價格下落；分量不足的商品，其價格騰貴。這是任何人都很知道的市場變動」。(2) 即是據他的意見，所謂市場的變動，不是物價一般的騰貴或下落；而是某商品騰貴，某商品下落的現象，這纔

叫市場變動。

想在密爾的時代，現在意義的景氣變動，尙未充分成立，一切的經濟現象，雖是某種程度的一般化，但如現在的一般的變動，尙未能充分的認識。因之，如像生產過剩，認爲在當時過渡的事實，不過是某種程度的一般現象；在強調他方面的觀察，認爲尙不是一般化的現象，看成部分的過剩的現象。只是，關於是如何方向的發展，則無疑的是向着一般化的傾向。而密爾爲什麼沒有認出這種一般化的傾向？主要是歸於他的認識或研究的態度及方法。換言之，因他的學問，抽象的思辯論太過，在一方面，使特別的均衡說成爲抽象的或形而上學的均衡說。在他方面，抽象的由經濟社會的發展傾向，止於靜態研究的範圍。不待言，抽象的思辯論是學問研究上必要的方法。但以由此所得的結果，卽用於說明現實社會的具體的事實，或遭遇豫想不到的困難不少。如以密爾的恐慌論有批判的餘地，或者就應該歸於此點。

(1)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6) p. 233.

(2) Ibid. p. 235.

本論 第四章 詹姆士密爾的需給均衡說

第五章 李加圖的生產無限說

一 恐慌論在李加圖經濟學中的地位

李加圖經濟學的主要問題，是在「決定左右分配的諸法則」。(1)詳言之，就是「決定產業生產物分配於各階級間的各種法則的研究」。(2)不待言，他的主要問題的分配論，是生產物或所得之階級的分配論。「土地的生產物……在社會三階級間的分割。即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必要的資本的所有者，用勞力耕作土地的勞動者三階級」。(3)「在地租、利潤和工資名義之下，分當於各階級的土地全生產物的比例」。(4)即是他所要研究的。

因此，李加圖在經濟學上的一切問題，都是由這種階級的分配見地去考察。例如，他的價值論是作為分配論之理論的基礎的研究。他的租稅論是為「充分究明租稅及於社會各階級的影響」。

(5) 他的機械論又是關於「機械的改良及於國家各種階級利害的諸結果」的研究。

但李加圖分配論的問題是什麼？他以他最尊敬的先師亞丹·斯密的分配論中所說「價格的構成部分」(6)的思想為機緣，間接作為價格論的連續或一部，直接作為生產論的一部而加以論究。而斯密以「價格的構成部分」(7)為地租、利潤和工資三者。因之，併立的研究決定這三者自然率的法則，實質上即是論分配。

而李加圖的見解，以「亞丹·斯密……其他有能的學者們，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解地租的真理，所以沒有見到地租問題只是在徹底的被理解以後，所發見的許多重要真理」(8)但到了李加圖的時代，已經由馬爾薩斯及威士特 (Sir Edward West) 兩氏，在一八一五年「同時公開地租的真學說」(9)已經明瞭「地租不是價格的構成部分」(10)因之，李加圖研究的分配論的問題，即是立腳於這種正確的地租論，而研究「利潤及工資的諸法則」(11)

在「利潤及工資的諸法則」中，李加圖特別作為問題的是：

第一、利潤和工資間之靜的比率關係。

第二、利潤和工資關係之動的變化。即「財富的增進及於利潤和工資的結果」。(12)

他關於第一問題的研究結論，是在設定利潤和工資間存在的反比例關係。因為兩者是一物的二分，一方面大則他方面小，一方面小則他方面不得不大。即是「利潤和工資的高低成比例而高低」。(13)

他對於第二的問題，首先承認工資遞增的傾向。因為「勞動的自然價格，是依存於維持勞動者及其家族的必要食物。必要品和便宜品」。(14)「左右自然價格的主張商品之一（食物），如生產增加困難，則價格漸次增高」。(15)所以，「因着社會的進步，勞動的自然價格，常有騰貴的傾向」。(16)

其次，利潤之一般的傾向，是工資一般的騰貴傾向的反面，常有下落的傾向。即是「利潤自然的傾向是在下落。因為隨着社會和財富的進步，必要食物的追加量，更要由多數的勞動犧牲纔能得到」。(17)這即是李加圖利潤率遞減的法則。亞丹·斯密也已經承認這種法則，但斯密以伴着財富的增進，資本家的競爭為遞減原因；而李加圖則以這種原因應歸於利潤和工資的反比例關

係。因之，「工資騰貴如無某種永久繼續的原因，則資本蓄積不致使利潤永久繼續的下落」。(18)
「假如，勞動者的必要品，同樣容易的不絕增加，那麼，資本也可蓄積到任何數額，在利潤率和工資率也不會發生什麼永久繼續的變化」。(19) 只是，在現實的社會，社會的進步和財富的增進，因增加食物生產的困難，發生工資遞增的傾向，以至招致利潤遞減的傾向云云。

而在此成問題的，是利潤率遞減法則和資本蓄積的關係。如以社會的進步，財富的增進，資本的蓄積等的結果，利潤率漸次遞減，那不是資本蓄積自身發生一種矛盾嗎？因為，促進資本蓄積的動機，不待言是在利潤的獲得。而資本蓄積發生利潤遞減，即是蓄積自身消失自身的動機，表明蓄積的自滅或自己矛盾。

李加圖已經在研究「利潤率永久繼續變化的原因」。(20) 第六章「利潤論」中，不得不論到這個問題。更特別設關於這個問題的一章，在第二十一章「蓄積及於利潤和利息的各種結果」中，詳細論究這個問題。本來，資本蓄積的內在矛盾的問題，是後世經濟學者最重要理論之一，但在那時的李加圖，已經這樣的加以研究，卻是有興味的事實。而比比更有興味的事實，即是我們現在要

研究的恐慌論，在李加圖又和蓄積論關聯着加以論究。

- (1) 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Gonner's ed. 1913) p. 1.
- (2) Letters of Ricardo to Malthus 1810-1823, ed. by J. Bonar (1887) p. 175.
- (3) Principles. p. 1.
- (4) Ibid. p. 1.
- (5) Ibid. p. 1.
- (6) Ibid. p. 3.
- (7) A.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Ch. VI,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 (8) D. Ricardo: Principles p. 2.
- (9) Ibid. p. 1.
- (10) Ibid. p. 55.
- (11) Ibid. p. 2.
- (12) Ibid. p. 1.
- (13) Ibid. p. 87-88.
- (14) Ibid. p. 70.

(15)Ibid. p. 70.

(16)Ibid. p. 70

(17)Ibid. p. 98.

(18)Ibid. p. 272.

(19)Ibid. p. 272.

(20)Ibid. p. 87.

二 資本的蓄積與生產的限制——生產無限說

李加圖的恐慌論，作為和資本蓄積與利潤率遞減有關的問題而加以研究，已經在前面述過了。因為伴着資本的蓄積，擴張再生產的進行，增加對於勞動的需要。於是減低耕作範圍，加添食料生產的困難。工資即呈遞增傾向，其結果不得不使利潤率遞減。

而這種傾向達到極限，在工資消耗利潤，全部生產物歸於一切工資的時候。資本蓄積因完全失去動機，蓄積即趨停止，勞動需要無新增加，而人口亦不得不達於頂點。『工資一達農業家（企

業家）的全收得額，蓄積即告終了』。（1）在這種情形，『任何資本也不能生出何種利潤，也不需要任何追加勞動，其結果人口即達於頂點』。（2）如像這種工資過大，利潤全無，蓄積停止，人口停頓的狀態，是極限的理想靜止狀態。假想這種靜止狀態，是古典派諸學者的一種共通理想。『人由青年而壯年以至於衰老死亡。這並不是國民的進路。如達到最強盛的狀態，以上的進步誠然被阻止。但其自然的傾向，是在維持繼續至幾多時代，財富及人口沒有減少』。（3）

但據李加圖的意見，這種擴張再生產之極限的停止，在現實是比利潤之極限的消滅，其發生的時間還要早。『實則在這種時間到來以前，利潤率的過低，即抑制一切的蓄積』。（4）因為，『他們（企業家）對於蓄積的動機，是因着利潤的減少而減少，在他們的利潤過低，對於他們的勞苦，對於他們使用資本生產時必然遭遇的危險，不能與以相當的報酬時，即會完全停止』。（5）因此，利潤率遞減之現實的極限，是在對於企業家的勞苦和危險的報償限度。利潤在破了這種報償限度的瞬間，即蓄積停止，人口停頓，工資未達生產物的全部即已停止。這即是李加圖所說現實之極限的靜止狀態，理想狀態。

因此，達到一定極限的利潤率遞減，常應其遞減的程度，成爲對於資本蓄積的限制，對於生產擴張的限制。而利潤率遞減達極限時，同時生產擴張也受極限的限制。於是李加圖所說利潤率的遞減，卽是表明生產擴張的限制。但他更進一步，主張一般生產擴張的限制，不外是利潤率的遞減，僅此纔是生產限制的唯一原因。

「必要品騰貴的結果，則工資騰貴。結果幾無資本利潤的存留。因之，蓄積動機達到消失的程度，未使用於從事生產的任何分量的資本，也不能在一國蓄積起來。」（6）

「資本生出何種利潤的時期，則資本的使用無限制。」（7）

然而李加圖所謂在利潤率遞減以外，則生產無限制的積極主張，是如何論證的呢？

第一、據他說，物的生產，其性質上必要的是消費。因之，生產和消費必然要適合。如就個人生產說來，「任何人都是無消費或無販賣目的則不生產。並且，販賣在直接於他無益，無利於將來的生產，或沒有購買其他商品的意思，也決不從事生產的。他從事生產，必然是他自己財貨的消費者，或是他人財貨的購買者及消費者。」（8）如就資本家的生產看來，「假如他使用了一萬鎊從事生

產，那麼，他的有效需要，即是新勞動者在工作所獲得的食物、衣服和原料」。(9) 而那裏或不得不有物的消費。

因此，不論在任何時候，資本的蓄積——生產的擴張，必然伴着消費的擴張；消費的擴張，必然表示是需要的擴張。而「需要不過只受生產的限制」。(10) 「有效需要是依存於生產」。(11) 於是，生產就是需要，消費即為需要。因為需要喚起生產，在結果不過生產只受生產的限制，只受利潤率遞增的限制。利潤率遞減達一定的限度後，此外並無何種的限制，而生產即可永久繼續。

第二、據他的意見，商品的流通，其性質上表示需要和供給的必然適合。他說：「生產物常被生產物或勤勞購買。貨幣不過單是行使交換的媒介物」。(12) 以一定貨幣購甲商品的需要，這種貨幣因為也是由乙商品的供給而得，對於甲商品的需要，豫想反面的乙商品的供給。因之，前者的需要和後者的供給一致。並且，欲得一定貨幣的乙商品的供給，因為以貨幣需要甲商品，乙的供給表明對於甲的需要，前者的供給和後者的需要一致。在這種情形，購買甲商品的，直接是貨幣，但結局是乙商品。因之，一商品的存在，常不得不有對於其他商品的需要。「生產了的各物，應該有牠的所

有者。不論是雇主、地主或勞動者的所有者，一商品必然有需要者。」（13）

因此，李加圖以貨幣經濟信用經濟，結局都歸於物物交換經濟。此點他和已經述過的史伊及密爾，占在共通的立場。而他的論證，更一方面採取供給表示需要的密爾說，他方面根據需要即供給的史伊說。在併用這兩者之外，更加添有所謂生產即消費的論據。因此而樹立他獨特的生產無限說。即所謂限制生產擴張的，不外是利潤率遞減的主張。本來，在他的論證中，也援用有如後述的欲望無限說；並且又根據如已經述過的物物交換說和需給均衡說。但我們不過把他的論證簡單的付以特徵的便宜手段，以之為生產無限說。

(1) D. Ricardo: Principles p. 99.

(2) Ibid. p. 99.

(3) Ibid. p. 251.

(4) Ibid. p. 99.

(5) Ibid. p. 100-101.

(6) Ibid. p. 271.

(7) Ibid. p. 283.

(8) Ibid. p. 273.

(9) Ibid. p. 274-275.

(10) Letters of Ricardo to Trower and Others 1811-1823 (ed. by Bonar 1899) p. 128.

(11) Letters of Ricardo to McCulloch 1816-1823 (ed. by Hollander 1895) p. 79.

(12) Principles, p. 275.

(13) D. Ricardo: Note on Malthus (ed. by Hollander and Gregory, 1828) p. 160.

三 一般的恐慌之否定及部分的恐慌之肯定

李加圖說可以限制生產的不外是利潤率的遞減。其反而即是表明生產決不受需要的限制。換言之，他以生產不受需要的限制，反以需要依存於生產為論據，而論證他的生產無限說。這種意義的生產無限說成立，所謂一切商品同時過剩，因之一般惹起恐慌的，一般的生產過剩說或一般的恐慌說，可以容易的加以否定。為甚麼呢？因為他以生產即是消費，消費就成需要。如像生產了的商品，一般的沒有發見需要而供給過剩的事，認為是沒有的。以生產比需要過剩，即是承認生產受

需要的限制，那正和他的生產無限說不相容。

由爲另一方面論據的物物交換說，也可以容易的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因爲既然物品與物品交換，種種物品以交換目的而生產。如像一切物品同時一樣的沒有發見交換物，以致一般的生產過剩，不能認爲是有的。只是，就各個的商品看來，特殊商品由何種原因而生產過剩，因之纔會沒有發見交換物。『特定的商品生產過多，不足償付因此所用資本的供給過多，發生於市場也未可知。但這並不是一切商品是如此的』。(1)

這種特定商品的生產過剩，即部分的生產過剩的現象，並不是可以永久繼續存在的，常只是一時的發生。因爲，『用如何方法使用資本，常是自由選擇的事件，在某一定的期間，不會有某種商品過剩存在的事。假如，那裏發生過剩，那麼，物品低落至自然價格以下，而資本即移於其他有利的用途』。(2) 即是所謂自由競爭之自然的調節結果，各生產間的生產力的比例關係——『資本最有利的分配』(3)——雖一時的被擾亂，但常回復均衡狀態。這種古典派的共通理想，在此也可以看出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這種均衡狀態的回復，不一定是圓滑進行的，常不免多少的衝動，以至有一時的混亂。而這種一時的部分的恐慌，因着其性質上回復均衡狀態的難易，恐慌的損害或影響的程度也不同；「這種困難的時間，因着人人放棄長期習慣的資本使用時所感困難之強弱，而得延長或短縮」。

(4) 並且，因着爲回復均衡狀態條件的資本移動之難易，其困難的程度也不同。然而資本移動的難易，主要是依存於資本構成的如何，因固定資本之比例的增大，同時加添其困難的程度。「由某種事業所用的資本，提出流動資本，並不如提出固定資本那樣困難。把爲一種物品而建造的機械，用於製造他種物品，常是不可能的。但一事業的勞動者的衣食住，則可充於維持他種事業的勞動者」。

(5)

因之，這種一時的恐慌，如就地理上看來，產業發展大的國家，其慘害應該很大。「在大資本投資於機械而富裕強盛的各國，較之比較少量的資本存於固定資本；比較多量的資本存於流動資本的貧弱國家，更經驗到受產業激變的大困難……但這種事是富裕國民不得不忍受的一種禍亂。如因此而鳴不平，恰和一個富裕商人，他的船遇着航海危險，而貧窮的鄰人的小屋，卻免去一切

危險。因此而鳴不平相同，是不合理的。」(6)

一時的部分的恐慌所發生的慘害，他以就歷史的觀察，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其程度亦不能不有增加。資本構成的高級化傾向，明白的已由李加圖加以承認。他說：

「對於勞動的需要，是依存於流動資本的增加，而不依存於固定資本的增加。這兩種資本間的比例，並不會在一切時間一切國家同樣的發生……因着技術的發達，文明的擴大，固定資本對流動資本更保持大的比例……」(7)

只是，李加圖注意到巴頓 (J. Barton) 闡明資本構成的高級化傾向的著作，(8) 是在「原論」第三版 (一八二一年) 中最初加入的一章 (第三十一章「機械論」)。我們在此主要要研究的部分，在第三版中差不多沒有修正，因之，沒有重視關於此點的議論。

(1) D. Ricardo: Principles, p. 275.

(2) Ibid. p. 275, Note.

(3) Ibid. p. 252.

(4) Ibid. p. 250.

(5) Ibid. p. 251.

(6) Ibid. p. 251.

(7) Ibid. p. 387.

(8) J. Barton: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o Condition of Labouring Class of Society (1817).

四 部分的恐慌之原因及欲望無限說

然而隨着這種一時的部分的生產過剩，而發生一時的部分的恐慌，是如何惹起的呢？

第一、歸於所謂生產者的「期望不同」之個人的主觀的原因。「不能認為某人有意生產比自然價格更可廉賣的商品，我也並不否定屢有這樣的事件，但這種情形是由於誤算或期望不同而發生，不是可以繼續至一二年以上的。」(1) 在這種意義，那也是一時的性質。

這種個人的誤算，也決不是一般的存在，「誤算也未可知，二三種或五十種以上的商品，比存在的有效需要生產更多也未可知。」(2) 「但這通常是期望不同的結果，一種或多種商品發生也

未可知，但並不是一時的全體商品都發生」。〔3〕

第二部分的生產過剩的原因，又歸之於流行的變遷、租稅的新設、戰爭的終始、一年的豐凶等等外部事情。因這些事情，擾亂產業間原來存在的比例關係。特定商品的供給，或過剩或不足，以至發生部分的過剩，伴着資本移動而惹起種種困難。這個問題，在第十九章題爲『產業之急激變化』中，李加圖曾特別加以研究的。他似乎想由這種理論去說明在他那個時代的恐慌，特別是一八一五年的恐慌。

「長期間和平後的戰爭開始，或長期間戰爭後的和平開始，一般是引起產業顯著的困難。因使各國資本原來投資於事業的性質，發生大程度的變化的關係。新事態在資本安定於最有利地位的期間，多數固定資本不能使用，或者完全失去。而勞動者亦不能得到充分的工作」。〔4〕

「一商業國的戰爭，阻害各國間的通商，從以些少生產費生產的各國，向無此有利地位的其他各國輸出穀物，屢受妨礙。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分量資本流於農業，原是輸入國的國家，得外國援助而獨立……當戰爭終結時，對於輸入的種種妨害除去，而對於國內農業家的破壞的競爭開始，

國內的農業家，如不以舊資本的大部分供諸犧牲，則不能由這種競爭引身……」。(5)

「這種困難在直接和戰爭到和平的變化有關聯時，由我們關於這種原因存在的知識看來，認為是合理的：是在相信勞動維持的基金，實質的沒有減損，而是由原來的方向轉向於他方面；一時的苦痛之後，國民得再繼續繁榮。」(6)

如已經述過，李加圖所經驗的許多恐慌，是和戰爭的開始、進行、終結有關聯。但有如多數史家所認出的，其原因不一定只是戰爭。李加圖力主這種要素為恐慌原因，恐不免是片面的觀察。

並且，據李加圖的意見，這些恐慌是 *temporary reverses and contingencies* (7) 是大 *distress*。但不是沈滯。他說：

「沈滯 (*Stagnation*) 一語，作為適用於一時的沒有生產動機存在的事態，不能認為是適當的。在事態的進行中，因資本的大蓄積，因對於增加人口的食料供給手段的缺乏，利潤極低的時，更會完全沒有節約的動機。但那裏就沒有沈滯。生產了的一切，在公平的相對價格，是可以自由交換的。沈滯一語，對於這種事物的狀態，確是用得不適當。因為，既沒有一般的供給過剩 (*General*

(Giffen) 而任何特定商品在比保證需要更大的分量，也不會生產的。(8)

欲望的無限性

一般的恐慌之否定與部分的恐慌之肯定，李加圖以為可以從我們的欲望的性質上演繹出。他首先指出對於生活必要品的欲望與對於便宜品的欲望之間的區別。在對於必要品的欲望，因我們身體有生理的界限的存在，不能無限制的消費必需品云云。

「對於穀物的需要，受食此的人口數的限制。鞋、上衣則受用此的人數的限制……在一社會或社會的一部，具有可以消費的或需要消費的大量穀物和大量的鞋帽，也未可知。」(9)

因之，生活必需品因欲望的有限性，供給能夠超過欲望，以致惹起生產過剩。

但是，如像生活必要品的生產過剩，「不能就各種商品而言」。(10) 因為，「對於種種的便宜品及……裝飾品的欲望，似乎沒有限度或一定的境界」。(11) 如像這些便宜品超過對於牠的欲望而供給的事，不能認為是有的，因之，「自然在一定的時期，必然限制可以有利的用於農業的資本。但在用於生活的「便宜品及裝飾品」的生產的資本額，並未有任何的限制」。(12) 這些便宜

品的生產，因着『人類欲望的無限性』，(13) 可以無限制的擴大。於是，最低限度，奢侈的便宜品不致發生生產過剩。

因此，『假如各人停止使用奢侈品，只注意於蓄積。那麼，立刻就可以生產不能消費的多數必需品。在限於這種情形的商品，無疑的，可以發生一般的供給過剩。其結果對於這種商品的追加量，也沒有需要。並且對於使用更多的資本，也會沒有利潤』。(14)

因此，在這種假設之下，似乎有一般的生產過剩的存在。但是，『如承認有這種現象，即是否認一般的原理。例如，如說英國有舉其一國之全資本全勞動，只努力必要品的生產的意向，這是想像也困難的』。(15) 假使那裏已經容許必需品以外的生產。那麼，必然的可以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因之，在必要品的生產與奢侈品的生產併存的現實社會，可以發生部分的生產過剩的一種原因，可以歸於生產者對於這些欲望的期望不同。

『假如，生產了的各種商品，適合購買者的欲望。這些商品就不致有不能發見市場的過剩存在。……』

「因誤算而生產不能適合欲望的商品也未可知——這些商品在那裏發生供給過剩也未可知……但在這種情形，那就是由於誤算，並不是由於對於生產物的需要的缺乏。」(16)

- (1) Letters of Ricardo to Trower and Others 1811-1823 (ed. by Bonar and Hollander) p. 128.
- (2) Ibid. p. 128.
- (3) Letters of Ricardo to McCulloch 1816-1823 (ed. by Hollander 1899) p. 126.
- (4) D. Ricardo: Principles, p. 250.
- (5) Ibid. p. 251-252.
- (6) Ibid. p. 250.
- (7) Ibid. p. 248.
- (8) Letters of Ricardo to Malthus 1810-1823, (ed. by Bonar 1887), p. 189-190.
- (9) Principles, p. 275-276.
- (10) Ibid. p. 276.
- (11) Ibid. p. 277.
- (12) Ibid. p. 278.
- (13) K. Dieh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Erläuterungen zu David Ricardos Grundgesetzen der

Volkswirtschaft und Besteuerung, (1922). II Bd. S. 415.

(14) Principles, p. 276.

(15) Ibid. p. 276-277.

(16) D. Ricardo: Note on Malthus, (ed. by Hollander and Gregory 1828) p. 160.

五 總括及部分的恐慌說的批判

要之，李加圖的恐慌論，是從立腳於物物交換說、欲望無限說與生產無限說等三說的，一般的恐慌之否定與部分的恐慌之肯定而成。

第一、在我們的消費生活中，對於必要品的欲望，因有生理的界限，所以能够發生生產過剩。但我們對於奢侈品的欲望，因為沒有限制，所以這種生產不致發生生產過剩。

第二、在我們的流通生活中，商品的購買，雖然直接用的是貨幣，但這種貨幣是由銷售其他商品而得。所以間接是以商品去購買。因之，結局是歸於以商品購買商品的物物交換。已經是物物交換，並且生產有種種的商品，就不會一般的發生流通停滯。只是，因生產者的誤算，那裏纔存在有特

殊的商品的過剩或不足。

第三、在我們的生產生活中，不待言，生產是依存於需要。但生產自己有產生需要的性質。生產就可不受需要的限制，可以繼續或擴張。生產過剩即不致因需要不足而發生。

這就是李加圖的一般的恐慌之否定論。

生產者個人的錯誤，由於豫測欲望而發生誤算。又因戰爭及其他非經濟的事變，可以變更需要的方向。於是，在特殊的商品或特定的生產部門，可以看出限於這種範圍的生產過剩。因此即發生部分的恐慌。這種部分的恐慌，因基於生產部門之比例的關係的破壞，所以，這種比例的均衡的回復——分裂之強制的統一——不免有多少的困難或混亂。但這種混亂或困難，不過是只有從均衡的破壞到回復之一時的過渡的性質。只是，這種部分的恐慌，在資本構成高級化的國家，又因着高級化的進展，就愈漸增加牠的程度，可以容易的想到這種恐慌的困難，是由於依存資本移轉的難易。

這就是他的部分的恐慌之肯定論。

我們首先檢討這種部分的恐慌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尚在發展初期的當時，商品生產的一般化，還不及後世的充分。因之，在當時的恐慌，雖是某種程度的一般化，但僅限於最尖銳化的商品的範圍。還沒有十分的一般化，這是已經明白了的。因之，如李加圖肯定的部分的恐慌，是表示限於比較的窄狹範圍，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但是，已經由貨幣經濟入於信用經濟以後，在經過長期間的當時社會，如以部分的恐慌，僅只於特殊的商品或生產部門的範圍，這在理論上事實上都是難於承認的。我們在前已經述過李加圖最初經驗的恐慌（一七九三年），已經不是限於特殊的商品或生產部門，而是遍於各種的商品及生產部門，由商工業以至金融業，是相當程度的一般化。因之，李加圖說已受事實上的檢討。我們以下僅從事理論上的檢討。

貨幣的機能，從流通手段出發發展到支付手段的時候，銷售的停滯，漸次發生一般化的傾向。因爲，一種商品的銷售不能，表明是生產者的支付不能。一個生產者的支付不能，就直接間接惹起依存於他的支付能力的其他多數生產者的支付不能。即是，銷售的停滯，表示是約定的支付的

不能……破壞作爲支付手段的貨幣造成的支付義務的連鎖在一點的停滯使其他各點的停滯繼續，停滯即成一般的。」（1）

所謂流通信用的發生，使銷售停滯一般化，不過是表明共通對於各個，連鎖對於孤立，並不是表示全體對於部分，廣泛對於狹隘。因爲，商品銷售在社會的一般化，是以資本家社會的成立爲前提。在資本家社會以前，商品銷售不過占經濟生活不重要的一部分。因之，在這種社會的銷售停滯，在一方面，發生於極有限的範圍。同時在他方面，可以發生絕對的停滯。這雖是便與不便的問題，但並不是死活的問題，銷售停滯發生的範圍雖然狹隘，其程度卻深刻，在發生的全範圍和全期間，能够使販賣完全不可能。

但隨着商品生產的一般化，商品買賣一般化時，在一方面，擴大販賣停滯的發生範圍。在他方面，正因此使停滯不能成爲絕對的。「因着生產的進步，不論在任何狀態之下，都不得不繼續的生產部分，也就增加。所謂不得不繼續者，因可以限制流通行程及生產的全然停滯。」（2）在爲生活而不得不買的社會，一定期間的絕對的販賣停滯，即表示是生活的停滯。因此，恐慌不是一般的時

候，銷售停滯雖是絕對的，但恐慌的範圍愈廣泛，販賣停滯就不能完全發生。

這種恐慌之質的及量的發展，不待言，是因着資本主義經濟的成立，纔得飛躍的發展。而李加圖經驗的幾次恐慌，正是這飛躍的發展期的過渡的恐慌。因之，明白的不是固有意義的部分的恐慌。只是，在他的部分的恐慌說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迷於當時的俗說，始終在生產關係中去探求原因。看破生產均衡之部分的破壞。伯格曼評之曰：「他的見解的特徵的表現，是在把販賣停滯顯現於表面的國民經濟的停滯，專從生產部面去引導出」。(3)這雖是片面的，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銳利的洞澈觀察。

(1)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1823), S. 298.

(2) a. a. O. S. 360.

(3) E.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1835), S. 39-94.

六 欲望無限說物物交換說生產無限說的批判

在此首先檢討是李加圖的一般的恐慌之否定及部分的恐慌之肯定的，一方面論據的欲望

無限說。

現在，假如必需品與奢侈品的欲望不同，承認對於必需品的欲望是有限性。對於奢侈品的欲望是無限性。但由此能否肯定必需品的生產過剩，否定奢侈品的生產過剩呢？

假如，因着必需品的生產過剩，於是發生販賣停滯。但是，在發展到某種程度的經濟組織，這決不是僅止於必需品的生產部門，是漸次及於其他的生產部門。例如，可以及於奢侈品。此點已經在前節論證過，姑置不問。關於奢侈品的生產過剩，因為對於奢侈品的欲望無限的關係，究竟能够發生與否呢？關於此點，我們首先應該知道所謂「生產過剩」是表示什麼。李加圖立腳於欲望無限說去否定的生產過剩或供給過剩，如已經述得明白，常是表明比較我們的欲望過剩的生產或供給。現在假如名之為絕對的過剩。

但這種絕對的生產過剩，在現實的事實，就是必需品的生產也沒有的。如徵之於對於食物的貯藏欲望，也就可以明白。因此，如像比較欲望的過剩，不是就任何商品而言。我們所謂生產過剩，常是比較需要過剩的生產。即在社會的生產條件之下，可以繼續生產的價格，超過購買生產物的程

度而生產而供給時，纔名之爲生產過剩。即所謂生產過剩者，常表示是相對的過剩，應該是比較在一定價格的需要的過剩，此點不免伯格曼的非難。伯格曼說：「他（李加圖）關於生產過剩的觀念，如和絕對的欲望對比一樣，似乎粗雜」（1）云云。

本來，李加圖也一般的承認欲望與需要的區別。例如他說：「人在不能得到某種熱望的滿足的期間，他是有對於多數貨物的需要。他在有和那些交換的某種新的價值時，那就是有效需要」。（2）又說：「任何人都沒有支付手段的貨物，即沒有需要的貨物，就不能生產」。（3）只是，可惜他在和生產過剩對照着比較的時候，不用這種有效需要，只單是用欲望。在此留有使後世消費不是說發展的餘地。要之，欲望無限說就是成立，但這並不是否定或肯定生產過剩的。因爲，所謂生產過剩不是和欲望對比的，而是和需要對比的。

其次，檢討李加圖第二論據的物物交換說。不注意從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或爲買賣媒介的貨幣及信用，卻還原到物物交換說的時候，就會如他所說，不能成立一般的恐慌。但是，他由此去證明的，只不過論證在物物交換時代，一般的恐慌的不能成立。這和現在的社會，並沒有什麼關係。並且，

在物物交換時代，交換經濟不過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因為經濟生活的重要部分，是由自給生產維持。在這種時代，不能看出所謂部分的恐慌。因着交換經濟的範圍擴大，同時發生商品向貨幣的轉化。貨幣一成為流通手段，這時恐慌纔最初有可能性。

因為，販賣停滯發生的一種可能性，是在販賣的存在，即貨幣的存在。沒有販賣停滯也有販賣，但無販賣就沒有販賣停滯。販賣是販賣停滯發生的可能的基礎和條件。所以西爾費丁（S. Feil'ding）說：『恐慌的一般的可能性，是在商品成為商品及貨幣兩重物的時候』。(4) 貨幣的發生，使貨幣的儲藏可能。貨幣的儲藏，即是購買的停滯；因之販賣的停滯。在貨幣發生的當初，貨幣單是流通手段的時代，主觀的各個人的欲望，珍重貨幣當作一種財寶而儲藏起來，已經很能够使販賣停滯實際的發生。

但是，基於這種主觀的個人的欲望，在貨幣儲藏的過程中發生的販賣停滯，『只是，各個獨立發生的事……一商品的販賣停滯，並不是一般的販賣停滯』。(5) 這種各個獨立的部分的恐慌，是如何發展到連帶的一般的恐慌呢？如已經述得明白，是在貨幣的機能，更發展成支付手段。要之，

李加圖的物物交換說，是否定現在社會的生產過剩及販賣停滯，而引出無販賣社會。在無販賣社會沒有販賣，這應該是很明白的。

最後，特別觀察李加圖說具有特徵的生產無限說。爲此說根據的李加圖的蓄積論，和亞丹·斯密同樣的是看過或輕視生產手段。如據他的見解：「我們說儲蓄收入增加於資本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說所謂追加於資本的收入部分，不是被不生產的勞動者消費，而是被生產的勞動者消費。」（6）即是，他在資本蓄積時的問題，不過是收入向資本的轉化部分，是被生產的勞動者消費，或被不生產的勞動者消費的問題。現在，假如不問是生產的或不生產的，收入向資本的轉化部分，是向着一切勞動的維持。然則生產的擴張，就有如他所主張的，直接作出和此成比例的消費及需要。

但在現實的情形，資本蓄積因分割於第一，工廠、機械等的固定資本。第二，原料、補助材料等的流動資本。第三，勞動者的新僱用。直接維持勞動者的蓄積部分，不過是蓄積資本的一部分。不僅如是，這一部分因着資本構成的高級化，有相對的漸次減少的傾向。因此，如像李加圖認爲蓄積資本

的全部，立即轉化爲工資。最低限度，這是離開現實甚遠的主張。(7)

但是，李加圖已經注意直接向資本的轉化，間接喚起需要的地方。尤其是至以後明瞭的說：「因着資本的增大，其大部分使用於機械。對於勞動的需要，即因着資本的增加而繼續增加。但不和資本的增加成比例的，其比率必然是一種遞減的比率」。(8)這種思想，因着資本構成的高級化傾向，到李加圖比較的後期，大概是在第三版（一八一九年）與第三版（一八二一年）之間纔達到。並且，在蓄積論是極重要的思想。假如，現在他以這種思想再度觀察他的蓄積論；即具體的說來，如他有了和第三版中加入的一章「機械論」（第三十一章）的主張調和，改寫論究這個問題的第二十一章的餘裕，那麼，他的蓄積論及恐慌論，或者內容有了多少的變更，也未可知。並且有使我們想到他自己曾經期待這種修正的理由。在一八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給馬加洛克的信中他說：「在印刷第三版的目的，關於現在正交於印刷的我前著中的蓄積一章，因有同樣理由（無時間），不能加以改正。但是，如在寫這一章以前，我有時間，有足以改善此章的能力，我是要力加改正的」。(9)無論如何，他的蓄積論尚不完全。爲此說前提的生產無限說，如由現在的理

論看來，恐怕也不堪批判。

如以上所論，在他的恐慌論，尤其是一般的恐慌之否定論，包含難於承認的許多點，然而各點又是由於什麼原因呢？

第一、我們應該承認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是受自己之歷史的、社會的存在的必然限制。他所經驗的許多恐慌，並不是如以後的許多恐慌，在明瞭的近世的形態中發現。李加圖不能從他自身的經驗，完全的得到自由，本來是難於避免的。

但是，第二、使李加圖對於這些恐慌事實，始終是片面觀察的一半責任。或者應該歸於他的認識或研究方法。本來，他的抽象的演繹方法，並不如一部分批評家的非難，是空虛的獨斷的假設，而根本是具體的歸納的觀察。但又有如他自己所說，他的目的是在說明諸原理，自然無關於具體的各個問題。說是這種原理之適際的適用，也是在他的直接意圖之外。始終是一般論，故又不免是抽象論。所幸他的一般的抽象論，免掉後世許多經濟學者所陷的缺陷，如所謂靜的抽象論。其考察常在動的變化中一點，覺得奇異。但他的動態研究，常受諸原理的限制，是抽象的，是離開現實的一般

傾向的探究。觀察這種一般的傾向，在現實的運動中，是如何的歪曲進展，即可發見恐慌或景氣變動的存在。但這種現實運動的研究，在他是具體的各個問題的說明，或諸原理的適用，本來不應該是在他的思維過程中的。他一方面雖意識到此點，但他方面又打破這種限制，想說明資本的現實的運動，而否定一般的恐慌。他的破綻似乎多由此點而來。

最後，我們決不是沒卻李加圖在恐慌論史的地位。大凡問題之絕對的解決，既然不是向任何人可以求得的，一思想在思想史發展上的意義，不是在問題的解決，無寧是在問題的提出。他在恐慌論史上的意義，和他在價值論史的意義相同，應認為是問題的提出者而加以承認。在這種範圍，他的恐慌論有其存在的理由，並且是在現在也有的。

(1) E.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1895) S. 92.

(2) David Ricardo: Principles, p. 274.

(3) Ibid. p. 382.

(4) R. Hiferding: Des Finanzkapital (1923) S. 297.

(5) a. a. O. S. 297.

- (6) David, Ricardo: Principles. p. 132.
- (7) Ibid. p. 274-275.
- (8) Ibid. p. 387.
- (9) Letters of Ricardo to Mc'Culloch 1816-1823, (ed. by Hollander 1895) p. 94.

第六章 馬爾薩斯之一般的過剩說

一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與經濟學的關係

有不朽名著之稱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刊於第二次過渡的恐慌的翌年（一七九八年）。反對高德文，康特塞等的社會改革論，對於沸騰當時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曾與以相當的打擊，此點姑置不問。我們要研究的經濟學，對於人口論是如何關係而存在的呢？覺得在論馬爾薩斯的恐慌論之先，有就此點一言之必要。

不待言，他的人口論不單是想發見人口法則的學問上好奇心的產物。著者的意識所及，是立腳於人道主義的見地，想到『各國民最占多數的社會下層階級的幸福』；（1）根據人口法則的權威，排擊世所謂『改善社會將來的思索』。（2）這種排擊當然主要是向着空想的社會主義。但

人口論的標題。是「高德文氏康特塞氏及其他著作家思索之評論」。在所謂「其他著作家思索」之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有我們亞丹·斯密的經濟學，這是特別足以引起我們的興趣的。

所謂「人口常應比生活資料的水準減低」(3)的人口法則，然則在何處纔存在有容受人類多數幸福的餘地呢？

不待言，人口法則不過是表示一種傾向的社會法則，不是說人口和生活資料的水準，常是正確一致的。反之，人口是以生活資料的水準為中心而上下振動，一再不絕的「逆行的及順行的運動」。(4)人口超出生活資料之上的瞬間，即是人口過剩的時期，表示是逆行運動的暗黑時代。反之，生活資料超過人口的瞬間，即是食料豐富的時期，順行的光明時代。

社會的下層階級，就是這樣的「被宣告永久來去於幸福與貧窮之間」。(5)在這種情形，影響人類多數的幸福的主要要素，明白的是所謂「生活資料」。而人口論和經濟學接觸的契機，即不外乎是「生活資料」的問題。

馬爾薩斯因由這種理由評論斯密的經濟學，特別另設一章（第一版第十六章），指出是和

富的研究有密切關係，並且是更重要的關於幸福的研究。他說：

「亞丹·斯密博士明言研究的目的是諸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但他常常混同有其他更有興味的研究。即是影響於諸國民的幸福，或各國民中最占多數的社會下層階級的幸福及安樂之各種原因的研究……有增加一國財富傾向的各種原因，一般的說來，同樣是有增進人民下層階級的幸福傾向，此點我也是充分知道的。但是，亞丹·斯密博士或者認為這兩種的研究，不是現實的，而是有最密切關聯的。最低限度，他以為一社會的財富（依照他的財富定義），沒有增加社會勞動階級的安樂的任何傾向，他沒有注意到可以增加的情形。」（6）

馬爾薩斯所說的，是以國富的增進，當不一定是國民幸福的增進。如據馬爾薩斯的意見，在沒有把資本的蓄積部分投於農業，只是投資於工業的時候，勞動生產物的增加，即是亞丹·斯密所謂國富的增加。但在這種情形，因同時沒有生活資料的增加，工資的騰貴，是名目上的，國民多數的幸福，是不會增進的。

反之，在以蓄積資本投資於農業的時候，生活資料即趨豐富，財富的增進，即是幸福的增進。因

此，他主張『當一般使用財富……改良土地使成爲生產的，對於一國，尤其是對於一國的下層階級，較此更有利的方法，恐怕沒有別的』。(7)

關於此說的當否，是另一問題。由此可以知道經濟學在他最初的『人口論』中有如何的地位，同時，可以充分得到馬爾薩斯的經濟學將來是向如何方向發展的暗示。

『人口論』第一版出版以來，馬爾薩斯對於經濟學的關心，似乎常以『生活資料』爲中心。例如，二年後的一八〇〇年公刊的第二著述，是『關於現在生活資料騰貴原因的研究』。(8)

在一八〇三年『人口論』第二版中，他的經濟論更有大的進展，論議分爲四章（第三編第七——十章）。在此所論，依照第一版中暗示的方向，尊重土地的生產物、農業。保護貿易，比較尊重勞動的生產物、商工業、自由貿易爲尤甚。許多地方都反對亞丹·斯密，而和重農學派接近。這種重農的傾向，在以『生活資料』爲中心的他，可以說是當然的歸結。

就第二版以後『人口論』各版詳論馬爾薩斯的經濟論，在現在并不重要。在此僅止於注意第四版（一八〇七年）和第五版（一八一七年）間約十年間他的經濟論的發展。在這個期間

中，有一八一〇年及一八一五年的恐慌。自第一版以來，他的考察是以「生活資料」為中心，因受這個時代的社會情勢的刺激，當然也進展到穀物法、農業法、地租論等，以至在一八一四——一五年，公表關於這些的三種研究。(9)

自一八〇五年以來，馬爾薩斯曾任東印度學校教授，講授史學及經濟學。他的經濟論已經從這時以來，構成一種經濟學了。一八一五年的「關於地租的研究」，即是他一部分的主張，因時勢的必要所驅，特別急於發表的。(10)

當一八一七年「人口論」第五版時，他不知道是把人口論擴張，和經濟論併合詳論嗎？或是把經濟論從人口論分開，作為獨立的著書出版嗎？遲疑難決。換言之，是馬爾薩斯的經濟論，在人口論中成長過甚的原故。

在一八一六年一月二日李加圖給馬爾薩斯的信中，對於馬爾薩斯想把人口論新版縮少，把經濟論分開的計劃，表示遺憾之意。他說：「補助金及（輸入）限制的問題，極為重要。如你現在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還沒有在什麼地方發表，……就應作為你此次著書的一部，出版雖是稍遲，也

不是大問題」。(11)在二月十三日的信中，又說：「我想你的出版已決定追加一卷」。(12)但在同年九月李加圖給脫洛瓦 (Trowell) 的信中說：「他（馬爾薩斯）在他的人口論中再追加一卷嗎？或者是分開獨立的出版，包含他現在的見解，如農業及工業有興味的問題，和由於自然的人為的原因對於這些的獎勵，現在仍遲疑未決」。(13)至一七年六月出版的第五版，就是接受李加圖的忠告，追加一卷而成三卷的人口論。

馬爾薩斯在這一版中的經濟論，不僅是分量和排列上有了變更，就是他所論的內容，也見到某種程度的變更。其主要的，如第一、認為財富和幸福的關係，更有極密切的關係。他說：「這種（財富的）增進，可以說不單是表示勞動維持基金之比例的增加，而同時對於社會的下層階級也有利益。這種利益和所生的不利益相殺……財富的急速的進步，不問主要是從生活資料的增加而來，或由便宜品及奢侈品的增加而來，對於貧民常發生有利的結果……」。(14)

第二、從來的重農傾向，顯著的改變。農業主義及商工業主義，同被推斥，推稱農商（工）併立主義。他說：「土地的資源和用於商工業的資本，均極重要。沒有一方面凌駕他方面的國家……在

這種情形下的國家，併有兩主義的長處。同時分別的採用一主義時，可以免去彼此發生的特殊弊害」。(15)

第三、雖仍然推稱穀物的輸入限制，但承認自由貿易的原則。他說：「完全的自由貿易，是實現可能被疑惑的一種幻想，但我們的目的，應該盡力接近。當作一般的大原則。如稍有差離時，提案者應明白樹立例外的方針」。(16)但是，這些變更並不是他的主張的本質改變，主要是隨着他的經濟論的發展，諸問題漸次從一般的見地去處理。他對於現實的具體問題，并未見有大的改變。

像這樣準備構成漸次發展而來的馬爾薩斯的經濟學，已經在一八一七年末，完成獨立的形態。例如在一八一七年十二月十日李加圖給脫洛瓦的信中說：「馬爾薩斯完成一種書物，書中他發表關於我以前所寫的各种問題的意見，并且知道和我的意見顯著不同，我正等待看此書」。(17)在翌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又說：「前信所言馬爾薩斯的新出版，尙未印刷。此書和他前著毫無關係」。(18)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中說：「他的著作到明年末還不能成功罷」。(19)在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信中說：「馬爾薩斯的著作，想正在印刷中。但聽說他沒有論及租稅的問

題，覺得遺憾」。(20)

他的經濟原論在一八一七年已經有了獨立的形式，經過兩年，在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作序文。在一八二〇年初頭纔出現。因之，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一九年的兩種恐慌，正當他的經濟原論的準備構成的時期。想到多數人類的幸福，最初即以生活資料問題為中心的馬爾薩斯，當然深受這些恐慌的影響。

而經濟學，在馬爾薩斯是關於財富增進的研究。如動態的研究，也包含在牠在一部中。由動態研究，經濟學和人口論發生關聯。馬爾薩斯自己承認兩者的關係，曾這樣說：「在我前著（人口論）中，我努力探求一國人口實際被一國現實（生活資料）的供給水準所抑制的各種原因。我現在的目的，是在表明主要影響供給的原因是什麼；或以生產力為喚起財富增進的原因」。(21)

要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經濟學，主要是以決定多數人類幸福的生活資料為中心，在關於財富增進的動態研究中接觸，而有如我們以後所述的馬爾薩斯的恐慌論，也當然是和動態研究關聯着研究。

- (1) 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1st ed. (1798), p. 303.
- (2) Ibid. preface iii.
- (3) Ibid. preface iii.
- (4) Ibid. p. 31. 32. 33.
- (5) Ibid. p. 2.
- (6) Ibid. p. 303-304.
- (7) Ibid. p. 300.
- (8)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 (1800).
- (9) 1.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s (1814).
2. The Grounds of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Corn (1815).
3.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1815).
- (10) 拙稿『馬爾薩斯的地租論』(經濟論叢第十七卷第5號)
- (11) Letters of Ricardo to Malthus 1810-1823 (ed. by Bonar 1887) p. 18.
- (12) Ibid. p. 111.
- (13) Letters of Ricardo to Trower 1811-1823 (ed. by Bonar and Hollander 1899) p. 18.
- (14)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5th ed., 1817, vol. III, p. 25.

(15) Ibid. vol. II. p. 420.

(16) Ibid. vol. II. p. 507.

(17) Letters of Ricardo to Trower. p. 44.

(18) Ibid. p. 46.

(19) Ibid. p. 71.

(20) Ibid. p. 93.

(21)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345.

二 恐慌論在馬爾薩斯經濟學中的地位

馬爾薩斯的經濟，和亞丹·斯密同樣的是『諸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如就馬爾薩斯的『經濟原論』說來，是由關於財富性質的第一研究（第一章至第六章），和關於財富進步原因的第二研究（第七章）而成。換言之，馬爾薩斯的經濟學，分爲財富的靜態研究和動態研究二種。如藉柏格曼 (H. Bergmann) 的話來說：『他的努力，是在把握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想從若干主要原因的協力來說明這種發展』。(2) 即是，和在人口論中是研究人口增加的各

種條件相同，在經濟學中是研究財富增進附帶條件的各種要素，是在想明白「一種國民經濟的動態」。(3)本來，馬爾薩斯自己想明白動態與靜態與否，尚屬問題。但屬於動態研究的最後部分（第七章），則明白的是他自己從其他部分加以區別，因為只是這一部分，至第二版時纔分離，獨立的作為第二篇。這一部分雖只占有最後的一章，但分量則占全體三分之一，是他得意的實證方法最能活用的部面，屬於他經濟學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而我們要研究的關於恐慌的論議，也當然在這一部分中。

馬爾薩斯的動態研究，當然從他的靜態研究出發。在他關於財富性質的研究中，關於此點最重要的思想，是在認識財富的二重性。據他的見解，財富有分量與價值的二重性，兩者是有關聯的。但又是互有區別的。本來，在馬爾薩斯的價值概念，不是由交換價值或自然價格出發。因之，馬爾薩斯的財富的二重性，和馬克思的商品的二重性是不同的。馬爾薩斯反對李加圖基於勞動價值說，以「價值本質的和財富不同」(4)的主張；認為「財富與價值確不一定是同一的，但有極密切的關聯」。(5)據馬爾薩斯的意見，「一國的財富，一方面是依存於由勞動所得的生產物的分

量，他方面是依存於適合現存人口的欲望與資力的價值……財富的一定分量，沒有一定的勤勞，則不能得到，而個人或社會的所得物的價值，如不能充分償付得此的犧牲，這種財富在將來也就不會生產的。」(6)因此，「考慮無關於價值的分量，和考慮無關於分量的價值，同樣是重大的錯誤。」(7)即是，關於財富增進的問題，必然要併合考慮財富分量的增進與財富價值的增進。他的動態研究即由此出發。

馬爾薩斯在動態研究中的問題，是「財富增進的直接原因」(8)何在。在此所謂「直接原因」，不外是預備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的間接原因除外。「在影響各國民財富本質上最重要的各種原因之中，計及屬於政治及道德的，這并不是問題……但是，這些原因雖是如何的重要和有效，如要詳細的加以研究，則不是現在的意圖。現在主要是限定對於財富增進最直接最接近的諸原因……因之，我們要考察的實際問題，是在對於財富永續的創造及增進最直接的刺激是什麼。」(9)關於在此所謂「永續的」是指什麼，至以後即可明瞭。

馬爾薩斯考察財富增進的直接原因，第一在人口。人口的增加，是財富增進的原因嗎？

以勞動力的入口是生產源，人的入口是消費源。勞動力的入口的增加，是生產力的增加，即是財富分量的增加，而財富分量的增加，因常不一定是表明財富價值的增加。所以，生產源的人口增加，如據馬爾薩斯的理論，常不一定是保證財富永續的增加。但此點沒有十分引起他的注意，他無寧是重視消費源的人口增加。

然則人口的增加，不增大需要刺激財富的增進嗎？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人口的增加，不過單是欲望的增加。但刺激財富的增進，不單是欲望，是有效需要。而勞動階級的欲望，能否成爲有效需要，這完全是依存於他提供的勞動，是否爲資本家所需要。因此，他主張無需要的人口增加，即單是人口的增加，對於財富的增進，是沒有貢獻的。

人口增加又惹起工資低下，使生產費低下，使利潤騰貴，因此遂不能刺激生產嗎？馬爾薩斯也否定此點。因爲，人口的增加，增加生產的分量，商品價格因此低落，資本家的利潤也就低下，以至生產復趨於萎縮。

所以，馬爾薩斯在結論上說：不論在什麼時候，「人口的增加，在沒有勞動追加量的必要時，因

工作不足或從事工作者的支持不足的關係，未幾即妨礙增加。因之，對於和生產力成比例的財富增進，也就不能提供必要的刺激」(10)云云。並且舉例證實此點。

馬爾薩斯否定了人口為直接原因，更進而論究「生產最有利的三大原因」。(11)其第一原因，即資本的蓄積。資本的蓄積，直接刺激財富的增進否？這種財富的增加，是分量的增進或價值的增進呢？單是分量的增進，可以永久的保證生產擴張否？不致引起生產過剩嗎？關於這種恐慌的問題，馬爾薩斯和李加圖相同，作為資本蓄積的問題，必然的加以檢討。

資本的蓄積、土地的豐饒和技術的進步，認為是有利於財富生產的三大原因。因之，在生產的範圍，財富的增進，應該是和三原因的增進成比例進行的。但馬爾薩斯以分量的增加，不一定表示是價值的增加。在財富的增進，有分量和價值的二面。而分量的增加，是依存於生產；價值的增加，是依存於分配。因之，他的動態研究，和關於生產的研究對立，以關於分配的研究為必要。

財產的分割、商業的擴張和不生產的消費的存在，認為是關於分配的三大原因。這三大原因，是作為保證財富增進永續可能的價值增進的原因。換言之，是作為決定生產過剩或恐慌存在與

否的要素，而加以研究。

這種馬爾薩斯的動態論，簡言之，是包含生產動態與分配動態。如由恐慌論的視角看來，前者是論恐慌成立的原因，後者是論恐慌消滅的原因。最後，在結束以上一般的動態理論，和恐慌之理論的一般的考察，以關於當時恐慌事實的實證研究爲一章，論究「以上諸原理對於一八一五年以後勞動階級的困難之適用」。(12)我們首先檢討他的一般理論，其次再觀察他的適用論。

(1)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30, 37.

Letters of Ricardo to Malthus, p. 175.

(2) E.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1875) S. 138.

(3) a. a. O. S. 138.

(4) 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Gonner's ed. (1913) p. 258.

(5)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434.

(6) Ibid. p. 340-341.

(7) Ibid. p. 344.

(8) Ibid. p. 345.

(9) Ibid. p. 347.

(10) Ibid. p. 349-350.

(11) Ibid. p. 413.

(12) Ibid. p. 490-522.

三 生產動態論（一般的恐慌之肯定）

（第一）『財富的二大要素』（1）——生產與分配的關係

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財富是『人類必要而有益的好適物』。（2）因之，所謂財富的增進，即是這種物的增加；本質上即是他所謂財富分量的增加，不是價值的增加。

於是，發生兩個問題：一、分量的增加，伴着和此成比例的價值的增加否？二、財富的分量，可以和價值沒有關係的獨立增加否？馬爾薩斯對於其中第二的問題的解答，是在以分量的增加依存於價值的增進。單是分量的增加，即不伴着價值增進的分量增加，結果不免要發生困難。在這種意義，價值的增加，即成對於財富增加的消極原因。『在各種情形……生產物的價值之永續的增加，在

永續的不受妨害的財富增進，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如沒有這種價值的增加，明白的新勞動是無從活動」。 (3)

馬爾薩斯對於第一的問題，即，對於財富的增加與價值的增加，比例的進行與否問題的解答，又是如何的呢？價值的增加，表示是和此成比例的財富的增加嗎？馬爾薩斯否定此點。「財富不是和價值的增加成比例的增加。因為，價值的增加，在某種情形，是在生活的必需品、便宜品及奢侈品等實際上減少的時候，也可以發生的關係」。 (4) 反之，財富的增加，是表示和此成比例的價值的增加嗎？在先主張分量的增加，是依存於價值的增加，已經間接的否定此點，但馬爾薩斯更直接的加以否定。他說：「價值又不和屬於所謂財富之名稱下的分量成比例的增加。因為，構成這種分量的種種物品，不限於適合社會的欲望和資力，而附與的適當的價值」。 (5)

所以，第一，價值的增加，常不定表示是財富的增加；財富的增加，常不一定表示是價值的增加。第二，不伴隨價值增加的財富增加，決不是永續的。因之，永續的增進之必要條件，是在同時併行價值的增進。「一般生產物的增加，和價值的增進併行而進。這即是財富增進上最良好最自然的健

全狀態』。(6)

而財富分量的增加，是依存於生產。價值的增進，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是依存於分配。『生產物的分量的增加，主要是依存生產力；生產物的價值的增加，主要是依存於分配。生產和分配，是財富的二大要素。如這兩種是適當比例的結合起來，不要很久的期間……即可達於其可能的資源的極限。而兩者別開或不適當的結合起來，雖在數千年之後，也不過是如散在於現在地球上的貧弱的財富，和稀薄的人口而已』。(7)

在此高唱的生產與分配的『適當比例』，是馬爾薩斯理論上的一種特徵，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他常常排斥兩極端，主張應採取事物的中間的一種中庸說。又高唱他主張的兩極端適當比例的存在的均衡說，但此說以後尚有一再言及的機會。

基於這種理論的根據，馬爾薩斯的動態研究，分爲生產論和分配論。就介在於兩者中間的聯繫，『確保財富永續的增進的，生產力與分配手段結合的必要』。(8)加以論究。在此所謂『生產力』，比後世學者的解釋更要廣泛，意思是指物的及人的生產資源。因之，生產力的單獨存在，和財

富的增進沒有何種關係。因為「雖具有大生產力的諸國，卻是比較的貧窮；有小生產力的諸國，卻是比較的富裕」。⑨問題是在生產力由適當的刺激，而覺醒發動起來，以招致財富的生產。

馬爾薩斯在此所謂「分配」，不是如李加圖所謂所得之階級的分配，而是生產物向消費者分配，和今日所謂商品的流通或配給，是同一意義。他主張這種意義的分配，和生產的適當的均衡，即不外乎是主張生產與消費的均衡。馬爾薩斯已經在「經濟原論」的緒論上，就生產與消費的均衡說過：

「假如，消費超過了生產，這一國的資本就會減少。其次，這一國的財富，因缺乏生產力的原故，就會漸次消滅。又如生產大程度的超過了消費，因為缺乏消費的意思，也就沒有蓄積及生產的動機，這種兩極端即可明白，其間應有中和點……此點應考慮生產力與消費意思的雙方，對於財富增進的獎勵纔很大」。⑩

而生產與消費的均衡，同時是表示供給與需要的均衡。在為防止伴着財富增加的價值下落，「在消費物與消費者數，欲望及資力之間，換言之，在商品的供給與需要之間，應保有適當的比

例』。(11)

像這樣的，馬爾薩斯常在相互對立的關係上，考察財富的分量對於財富的價值，對於生產的分配和消費和對於供給的需要。此點是他和史伊、密爾、李加圖等顯然不同的地方，同時是對於恐慌的議論紛歧的原因。

(第二)生產的「三大原因」——土地的豐饒與技術的進步

馬爾薩斯的生產動態論，即恐慌成立說，是由資本的蓄積、土地的豐饒、技術的進步而成，已經在前面言及。

第一、土地的豐饒，是生產力的一種重要要素。不待言，是增加財富生產的可能條件之一。只是，問題是在單是土地的豐饒，可以永續的使財富增進與否。馬爾薩斯的結論，是否定此點。其原因又安在呢？

馬爾薩斯首先顧到現實。他說：「極廣大豐饒的國家，充分的利用自然資源的例子，在近世并不多。而狹小的貧脊國家，由於外國貿易，在狹小的領土內……蓄積莫大的財富的例子，卻是很

多」。(12)爲什麼會見到這樣矛盾的現實呢？因爲，在豐饒的國土，第一、勞動維持的能力，比較的缺乏意欲。第二、必要品生產既然容易，便宜品生產亦無須大勞。人類性好懶惰之較甚於好奢侈。第三、在豐饒國土的財富的缺乏，不是由於資本的缺乏，而是由於需要的缺乏。本來，國土的開發，自然是需要資本；但資本的增加，即是生產物的增加；生產物的增加，必要的是市場的擴張。因此，「一般是資本增加必要的是需要，和需要必要的是資本增加，恰恰是同樣的」。(13)

要之，土地的豐饒，在財富的增進上，是有利的可能條件。但現實的引起財富的增進，必要的是資本；如更欲永續的增進，則必要的是需要的存在。因之，「一般的只是土地豐饒一點，并不能成爲財富永久增進的適當刺激」。(14)云云。這種結論，是表明不伴隨需要增加的土地生產力的發展，必然的引起生產過甚。

第二、技術的進步，即「節約勞動的諸發明」，(15)是刺激財富永續的增進的原因嗎？技術的進步，和土地的豐饒的性質不同。後者是自然的恩惠，其存在和人類的意欲無關。因之，經過長期間還未見充分的利用。反之，前者是由於人類的必要而產生的。因之，如像超過必要程度過剩存在的

事，幾乎是沒有的。但是，兩者的性質雖是不同，「同一法則卻適用於兩者」。(16) 第一、兩者同使財富的生產容易，使供給力增大。第二、「這種供給力，如沒有伴着適當的市場的擴張，即不能充分的利用」。

節約勞動的機械的發明，對於勞動階級有如何影響的問題，是當時的一種重要問題。李加圖改變他從來的見解，傾於悲觀論，以至在經濟原論第三版（一八二一年）中，主張「以機械代替人類的勞動，確信對於勞動階級的利益，常是極有害的」。(17) 但馬爾薩斯的見解，則極為樂觀。

「由於機械發明，勞動的節約，把比從前低廉的貨物售於市場時，其最普通的結果，因在多數購買的資力以內，擴大商品的需要。所以，由新機械製造出的貨物全體的價值，超過從前的價值甚大，勞動雖然是節約，但製造業卻要求更多的勞動者」。(18) 「生產趨於容易，即有開拓國內及國外的市場的強有力的傾向。因此，在多數國的實際的狀態，憂慮採用機械而發生永續的弊害，是沒有任何理由的」。(19)

即是，馬爾薩斯豫想在機械的利用，價格的下落和市場的擴大之間的，一種必然的關係。

生產方法的發展，引起生產物的增加時，這種增加可以永續的保證與否，完全依存於市場的擴大。如藉馬爾薩斯的話說來，這種情形的財富的增加，應伴着由於分配的價值的增加。因此，他對於技術的進步的樂觀，是在有所謂「常可誘導財富及價值的大擴張的假說」。(20) 如要價值伴着財富同時增進，必要的是市場的擴張。「從機械代替手工勞動所得的莫大利益，是依存對於生產商品的市場的擴張及對於消費的刺激之增大；如沒有市場的擴張及消費的增加，其利益即大程度的失去」。(21) 這是此種情形的最重要點。「和土地的豐饒相同，良好機械的發明，與以莫大的生產力。但這種大生產力……如妨礙充分的市場的開拓及適當的消費的增加，即不能充分的活動」。(22) 要之，只是技術的進步一點，不能保證財富永續的進步。如沒有伴着消費的擴張和市場的擴大，財富的增進，結果是會發生困難的。這即是馬爾薩斯的主張。

(第三) 資本的蓄積

土地的豐饒和技術的進步，如要現實的作為生產力去活動，必要的是資本。資本的蓄積，在這種意義，即成為直接刺激財富增進的原因，應該是最重要的。「財富之永久的永續的增進，無資本

之永續的增加，則不能發生，確屬真理」。(23) 然則反對的現象，也是真理嗎？資本的蓄積，常可保證財富的增加嗎？

何謂資本的蓄積，在馬爾薩斯也正當的是「從追加於資本的收入之節約」；是企業家的生產擴張。然而企業家分他利潤的一部，追加資本擴張生產時，那裏會發生如何的變化呢？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第一、關於勞動階級。勞動者的一部分，從原來不生產的勞動轉化為生產的勞動。但他們全體的消費，並不因此而增減。第二、從「假設他們同意節約，割愛他們平常的便宜品及奢侈品，節約他們的收入而追加於資本」。(24) 那裏就有消費的減少。第三、因着資本的追加，不生產的勞動向生產的勞動之轉化，生產物即顯著的增加。然則全體就成消費減少生產增加的結果。因此，馬爾薩斯說：「在這種事情之下，我敢問由增加生產的勞動者所得商品的增加量，如何纔可以發見購買者呢？」(25) 這即是馬爾薩斯的生產過剩說。

在這種生產過剩的時候，「發生極大的價格的下落，恐怕其價值降低至生產費以下，或至少大為削減節約的能力和意思」。(26) 換言之，資本的蓄積，在此達於極限，以至和自身發生矛盾。即

是，「節約的原則，如達於極端，即消失生產的動機」。(27)

這種意義的生產過剩，由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不是關於特殊商品的部分的，而是關於一般商品的一般的生產過剩。只是，所謂一般的過剩 (General glut)，有如波拉 (J. Bonar) 氏所論，不一定是表示普遍的過剩 (universal glut)。(28)

要之，「資本的蓄積、土地的豐饒及節約勞動的諸發明，是生產最有利的三大原因……因這些和需要都無關係，有促進供給的傾向。不論是分開和協同，對於財富永續的增進，不能與以適當的刺激。財富永續的增進，只是由於商品需要之永續的增加，纔可以維持」。(29) 否則，必然的引起一般的生產過剩——一般的恐慌。

(第四) 一般的生產過剩之肯定

馬爾薩斯由於主張單是資本的蓄積，即引起一般的生產過剩。和史伊、李加圖等恐慌否定論者正面衝突。他舉關於蓄積的論議的大部分，以排擊這些否定論。首先指摘否定論者的重要根據之一，是出發於物物交換說。馬爾薩斯說：

「如據若干極有能的著者們的意見，以容易發生特定商品的供給過剩，但不會有一般商品的供給過剩。爲什麼呢？如據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因商品常是和商品交換，一半開拓他一半的市場。於是，生產即成需要的唯一根源，一貨物的供給過剩，不過單是證明他種貨物的供給不足。因之，一般的過剩，是不可能的。」（30）

但據馬爾薩斯的意見，以物物交換說不是真理，與其說是商品和商品交換，無寧說是和勞動交換。因之，商品生產雖是擴張，但社會的勞動無變化時。商品對於交換的勞動，不得不發生過剩。例如，在前面的例子，商品的供給，雖是對資本的蓄積比例的增加，但不過是見着社會的勞動，由不生產的向生產的之部分的轉化而已。在全體並無增減。因之，勞動對商品的交換比例被擾亂，即不免發生供給過剩。而這「正確的是所謂供給過剩一名辭的意義。在這種情形，明白的是一般的，而不是部分的。」（31）

對於物物交換論者不注重貨幣，馬爾薩斯又加以反對。他這樣說：

「想他們怕對於所謂財富由貨幣而成的意見的非難罷。財富不是由貨幣而成，確是真理；但

貨幣在財富的分配上是最有力的代理人，這也同樣的是真理。在一切的交換，實際上是由貨幣施行的國家，當說明需要供給的原理或工資利潤的變動，依然主要以帽子、鞋、穀物、衣類等解說的人們，必然不免失敗的。」（32）

「流通媒介物，因對於財富的分配及產業的獎勵，是有極重要的位置。把牠放在我們的考慮之外，屢引起我們的錯誤。」（33）

然則否定論的「根本錯誤」（84）何在呢？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第一、基於他們對於商品的見解的錯誤。如據他們的意見解，「以為商品恰如數學的數字或算術的性質的東西，沒有想到和消費者的人數及其必要有關聯的消費物。」（85）而商品結局是被消費的。因之，「他們的相互關係雖無變化，但他們對於社會欲望的關係……可以經驗到最重要的變化。」（36）

第二的「根本錯誤」是在他們沒有考慮一般重要的人類性的原理。」（37）即是他們「承認好奢侈甚於好懶惰」。（38）而據馬爾薩斯的意見：現實的人類性，是「好懶惰甚於好奢侈」。（39）其結果急激增加的奢侈品的生產，不免惹起需要的不足。

第三的『最重大的錯誤，是在假定蓄積保證需要』。(40)但蓄積由於消費的節約，是可能的。在這種限度，蓄積和需要不能兩立。『假如，在節約的過程中，由資本家失去的一切，可以由勞動者得來。那麼，對於財富增進的妨礙，有如李加圖所說明的，不過是一時的罷了……但是，假如資本向收入的轉化，超過一定的程度。那麼，由於減少對於生產物的有效需要。勞動階級即會失掉工作。節約的習慣，如入於過大的程度，最初就伴着最困難的結果，永久伴隨財富及人口之顯著的衰退』。

(41)

要之，否定論者的錯誤，是在只考察生產與生產、供給與供給、商品與商品的相互關係的問題，沒有十分注意消費對於生產、供給對於需要、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問題。『敢問：假如在以後的半年間，除了麵包與水之外，一切的消費都中止了，對於商品的需要，會發生如何的變化呢？將惹起何種商品的蓄積、如何的銷路、如何奇怪的市場呢？』(42)

(第五)資本法則與人口法則的相似

『支配利潤率及資本的增進的法則，對於支配工資率及人口的增加的法則，有極可驚異的

類似點』。(43)馬爾薩斯隨處陳述此點，闡明關於資本蓄積的法則。

第一、資本蓄積的極限，是由利潤率遞減的法則演繹出；和人口增加的法則，由工資遞減的法則演繹出，完全相同。即是，「因勞動者得到食物的困難的增大，利潤率即趨減退。蓄積的增進，遂達於止境。……勞動的工資，同樣的漸趨貧弱。因之，人口的增進，因得到生活資的困難的增加，遂亦達於止境」。(44)

第二、所謂資本的過剩或不足，不是對土地或人口而言，是對於資本需要而言。同樣的，所謂人口的過剩或不足，不是對土地的廣大而言，而是對人口需要而言。資本人口，在前的意義，都沒有常不足或過剩的事。只是，在後一點的意義，即對於各的需要，纔有發生過剩的事。而在人口對需要過剩的時候，獎勵人口的增加（如救貧法）不過是加重伴着人口過剩而發生的勞動階級的慘狀。在資本過剩的時候，獎勵資本的蓄積，也不過是加重伴着生產過剩而發生的資本家階級的困難（恐慌）。

第三、資本急激損失後的急速回復，恰恰類似人口喪失後的急速回復。因回復急激損失的急

迫需要，在資本則利潤增高，在人口則工資高增。以實現資本或人口的迅速的回復。但由此類推，「如想像人口沒有豫先減少，即發生同樣的增加率，這是最大的錯誤。如想像資本沒有豫先損失，即以同樣的迅速蓄積資本，這也是同樣的大錯誤。」（45）

第四、工資對於人口增加的關係，和利潤對於資本的蓄積相似。人口增加降低工資，工資降低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口即趨減少。此時勞動階級即處於悲慘的境遇。而人口的減少，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使工資增高，再引起人口的增加。此時他們的狀態趨於緩和。這種人口法則，是關於勞動階級的運命的自然法則。他們以生活資料的水平線為規準，一再不絕的動搖於其上下。和此相同的，伴隨資本蓄積的生產的增加，使利潤低下；利潤的低下，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蓄積遭受阻害，此時資本家階級不免恐慌的激動。

要之，「支配資本的增加的法則，和支配人口的增加的法則，雖不完全明白是相同。但兩者確是同種類的。……在從想永續的增加財富的目的，對於資本生產物沒有適當的需要時，繼續的把收入轉化為資本，恰和沒有勞動需要的勞動維持基金的增加，繼續的獎勵結婚和產兒相同，同樣

是無益的』。(46) 在後者情形，即成陷勞動者於罪惡與窮乏的人口過剩；在前者情形即成引起資本家的破產與勞動者的失業之生產過剩——恐慌。

- (1)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428.
- (2) Ibid. p. 28.
- (3) Ibid. p. 419.
- (4) Ibid. p. 339.
- (5) Ibid. p. 340.
- (6) Ibid. p. 426.
- (7) Ibid. p. 426.
- (8) Ibid. p. 413-426.
- (9) Ibid. p. 349.
- (10) Ibid. p. 9.
- (11) Ibid. p. 419.
- (12) Ibid. p. 376.
- (13) Ibid. p. 399.

- (14) Ibid. p. 401.
- (15) Ibid. p. 410.
- (16) Ibid. p. 402.
- (17) D. 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Gouner's ed. (1913) p. 379.
- (18)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402.
- (19) Ibid. p. 412.
- (20) Ibid. p. 412.
- (21) Ibid. p. 412.
- (22) Ibid. p. 412-413.
- (23) Ibid. p. 351.
- (24) Ibid. p. 352-353.
- (25) Ibid. p. 333.
- (26) Ibid. p. 353.
- (27) Ibid. p. 8.
- (28) J. 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1924) p. 281.

- (29)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413.
- (30) *Ibid.* p. 353.
- (31) *Ibid.* p. 354.
- (32) T. R. Malthus: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1827) p. 60, note.
- (33)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361, note.
- (34) *Ibid.* p. 355.
- (35) *Ibid.* p. 355.
- (36) *Ibid.* p. 356.
- (37) *Ibid.* p. 358.
- (38) *Ibid.* p. 358.
- (39) *Ibid.* p. 358.
- (40) *Ibid.* p. 359.
- (41) *Ibid.* p. 369.
- (42) *Ibid.* p. 364, note.
- (43) *Ibid.* p. 370.
- (44) *Ibid.* p. 370.

(45) *Ibid.* p. 374.

(46) *Ibid.* p. 375.

四 分配動態論（一般的恐慌之否定）

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要永續的確保財富的增進，不僅是分量的增加為必要，同時必要的是價值的增加。而左右分量的增加的生產上諸條件，僅此並不能保證價值的增加，反因此惹起如前述的生產過剩。但防止生產過剩的價值的增加，是依存於分配——生產物向消費者的分配——因此，要不發生生產的困難，確保財富永續的增進，必要的是「生產力與分配手段的結合」。(1) 這就是他的動態研究與生產論對立，論究分配論的原因。

據他的見解：「依存於分配的價值的增加之最有利的理由：第一、土地財產的分割。第二、國內外的商業。第三、不生產的消費者之維持」。(2) 以下就這三原因與分配的關係，來探討他的論究。

（第一）土地財產的分割

如把這個問題翻譯成現在的問題，就是一般財產的集中與分散的狀態，對於商品分配上如何影響的問題，在封建遺物還殘存的馬爾薩斯的時代，首先即研究土地財產的分割，可以說是當然的。他首先主張財產的集中，在財富的分配，在財富永續的增進，是不利的條件。論由來於封建制度的土地的不平等分割，是中世財富進步上的主要妨害。斷定正當的是「少數者的過度財富，關於有效需要，不能匹敵多數者的通常財富」。(3)以近世商工業的發展，是伴隨財產分割需要擴大的結果及原因。

「製造家及商業家能發見他們的商品市場，只是在職人及勞動者層以上的多數消費者階級之中。如據經驗上看來，製造家的財富，是財產分割極良好的結果；同時由於增加社會中等階級的分量，是使這種分割更見進展的原因」。(4)

第二、土地財產的過小的分割，又是馬爾薩斯排斥的所在。非難關聯此點的法國的平等繼承法，並反對英國長子繼承法的廢止。他主張「英國如沒有貴族，即不能維持。而有能的貴族，如無長子繼承法，則不能維持」。(5)和他的地租論遙相呼應。馬爾薩斯這種主張的結果，是排斥財產的

過大集中，同時又排斥財產的過小分散。而歸著於主張在兩者中間的適當比例的中庸說或均衡說。(6)

「土地財產的分割，和工業及商業資本的一定程度的分散，在財富增加是最重要的，實屬真理；但超過一定程度的時候，則妨礙財富的增進，也同樣的是真理……如有比較少數的富裕財產家，財富的增進，因有效需要的缺乏而受妨害；如小財產家過多……財富的增進，因供給力的缺乏而受妨害。在經濟學中關於財富的一切大結論，都是依存於比例……」。(7)

但是，現在假如財產的分割，得乎中庸，保有適當比例的時候，財富的增進，可以無障礙的進行？否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這種進行也有一定的限界，「遂逢着反對原理，開始和生產力衝突」。(8) 即是，伴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量的增加，由於因財產分割需要的擴大，得到完全的解決，但更遇着第二的「衝突」。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這種衝突由商業的擴張，尤其是外國市場的開拓，可以得到解決。

「土地財產的分割，是關於財富分配的大手段之一，有維持增進其交換價值的傾向。因此惹

起的分配，因着分割的進展，繼續引起財富上更有利的結果。但不免逢着反對原理，開始和生產力衝突。這主要是因着依存於內外商業的活動……的諸事情，會早晚發生的。」（9）

（第二）商業的擴張

馬爾薩斯第一反對主義學派的主張，以商業是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在他所謂價值，即是交換價值。因認為是由需給關係而決定，在已經有一定供給存在的時候，其價值是依存於需要方面的事情。因之，求適合於需要的商業，即能够增加價值。即是，「在一國進行的一切交換，施行最適合於社會欲望的商品的分配，對於全生產物，即可與以極大的市場價值……假如，國內商業沒有增加國民生產物的價值的傾向，商業即不能進行。因為，干與商業的商人，是從這種價值的增加而得到支付。」（10）

第二、商業由於增高商品的價值，故刺激生產。如已經述過，馬爾薩斯以價值不僅是生產擴張的消極動因，又是對於生產的積極的調節者。「在一切種類的財富的生產，不僅是大刺激，更是財富的存在形態及相對量的大調節者，即是這種價值。不論是如何種類的財富，如社會的一部分，沒

有承認和自然價格或必要價格有相等的價值，即不能永續的存於市場」。(11)不待言，生產是爲的利潤。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利潤是和價格成比例的增加。因之，「這種價格上昇時，生產即增加；價格低落時，生產增加即受妨礙」。(12)這是極易明白的。要之，「由國內商業而惹起的商品的分配，是向着財富及資本的重大增進的第一步」。(13)

第三、外國貿易也因同樣的是增高商品的價值，增高利潤，保證生產永續的擴張。在已經由國內商業達到財富進步的限界的國民經濟，也能够由外國市場的開拓，解決生產過剩。「外國貿易的結果，即增加商品的分量；同時更伴隨一種最重要的結果……即是交換價值量的增加。這種結果，爲對於生產的產業，創造永續的刺激，維持豐富的商品的供給，極爲必要。因在這種結果發生稀少的時候，即立刻感到勞動需要的沈滯，妨害財富的進步」。(14)要之，「外國貿易及一切市場的擴張，在由分配而發生的價值增加，應認爲是極有利的」。(15)在此各點，馬爾薩斯也和李加圖是對立的。

(第三)不生產的勞動者之必要

在分配上的三原因之中，不生產的消費者所占的地位，恰和生產上的三原因之中的資本蓄積對立，是最重要的。因之，是在他的分配動態論中最值得注意的主張。不待言，在此所謂不生產的消費者，並不是不生產的勞動者。因為，在他所謂資本的蓄積，是不生產的勞動者轉換為生產的勞動者。資本的蓄積及生產的增加，在現在是議論的前提。『在那裏應該有重要的消費者階級。如若不然，商人階級繼續擴張他們的業務，即不能實現他們的利潤。在這種階級有優越的地位的，無疑的是地主』。(16) 即是首先承認地主之不生產的消費的存在理由。(17)

不待言，政治家、軍人、官公吏、自由職業家等等的不生產者的消費者，在維持一國是不可缺的要素。只是，問題是這些不生產的消費者的存在，在直接是有經濟以外的必要理由。因之，他們的存在，在最低限度，在直接是表明一國經濟的消耗；或者是『他們提供對於生產的新動機，一國的財富，比較他們沒有存在的時候，更有以上的進展傾向與否』。(18)

這個問題的解決，如據他的見解，更依存於兩種問題：第一，『蓄積的動機。在受勞動者得到生活資料困難的妨礙以前，即因有效需要的缺乏，而受妨礙或絕滅與否』。(19) 第二，『雖是承認這

種過剩的「可能性」，但在人類的實際習慣之下，有十分值得信賴的發生理由否」。(20) 其中第一的問題，已在資本蓄積論中，馬爾薩斯積極的解答過。即是，僅資本的蓄積、生產的擴張，由於有效需要的缺乏，不得不陷於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的「可能性」，在實際的社會，能否轉化為「現實性」的第二問題，這是現在要解答的問題。

生產過剩的可能性，究竟能否轉化為現實性呢？他主張在生產階級及地主階級，過剩能在現實發生。第一、生產的勞動者之消費的增加，表明是他們生活的向上。從社會多數人的幸福的觀點看來，無論如何不是刺激財富增進的原因。因為，如據馬爾薩斯的見解，「勞動階級間的消費的增加，因提高生產費甚大，致減低利潤，在農工商達到某種程度的繁榮以前，即減退或絕滅蓄積的動機。並且，永久的受人口法則的支配。在禁欲的習慣盛時之外，勞動不能把消費生活豐富到某種程度以上」。(21)

第二、關於生產資本家，增加他們的消費，是可能的。他們有這種能力。但是，應着這種能力而增加消費的事，「和資本家一般實際的習慣不一致」。(22) 他們雖有消費能力，但沒有消費的「意

思」。他們的意思與習慣，必定是蓄積利潤的一部。因之，假如「生產資本家沒有十分欲消費的意思，生產勞動者沒有消費的能力」，⁽²³⁾縱使那裏有地主階級的消費，如要把這些一切的消費去消化增加了的生產，是困難的。即是，只在這種範圍，恐慌的可能性纔會現實化。

所以，在這些生產階級及地主階級之外，需要不生產的消費者的存在。這種階級的存在，「不單是對於一國的統治、防衛、保健、教育等，是必要的。在為喚起充分開發一國自然資源所要的勤勞，也是必要的」。⁽²⁴⁾換言之，這些不生產的消費者，不僅是有政治上的存在理由，並且有經濟上的存在理由。我們在此想起亞丹·斯密的政府最小限度的存在，感到兩者對立的興味。

不生產的消費者，馬爾薩斯又分為兩種範疇：第一，如僕婢、自由職業者，由個人之私的支付而生活者。這種不生產的階級，不僅是喚起需要，「刺激產業最有益的」，⁽²⁵⁾並且沒有伴隨增高生產費的弊害。反之，第二的不生產的階級，如軍人、官吏、公債所有者，受公的支付者。他們在刺激生產一點，與第一的並無不同，但為他們生活資源的國家的租稅，因增高工業的生產費，妨礙商業的自由活動，即阻害財富的增進。「因之，由租稅支持的不生產的勞動階級對於國富的影響，因着國家

的情形，遂有極大的差異。完全是依存於生產諸力與各國租稅徵收的方法。』(26)

所以，不問是屬於何種範疇，在考慮到不生產的消費的存在或增加，生產過剩即失去牠的現實性。不生產的消費的存在，在為打開因需要缺乏的生產的困難，是絕對必要的。但在他一方面，不生產的階級的存在，因是表明財富的消耗。其過大的存在，反轉阻害財富的增進。

在此的問題，即是這種消耗階級與生產階級的比例如何。『現在，假如不生產的勞動過多。因拿到市場的物質的生產物之比較的小量，全生產物的價值，即因分量少而減少。又假如生產階級過多，全生產物的價值，即因供給過多而低下。生出最大的價值的，明白的是存於兩者間的一定的比例。』(27)我們在此又見到馬爾薩斯的中庸說。

但一般的決定這種兩極端的適當中庸的事件，如據馬爾薩斯的意見，這是經濟學所未能的。因為，這是依存於種種事情的變化。例如，在土地肥沃的大國或生產上有能的國民，較之不如此的國家，有保有極多數的不生產的消費者的可能與必要。要之，是由自然的及人的生產力之大小如何而決定的問題。如在歷史的發展上看來，因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階級之相對的減少與不生產

階級之相對的增加，漸漸感到是必要或可能的。

- (1)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413
- (2) Ibid. p. 427.
- (3) Ibid. p. 431.
- (4) Ibid. p. 431.
- (5) Ibid. p. 582.
- (6) 參照拙稿『馬爾薩斯的地租論』經濟論叢第十七卷第五號
- (7) T. R. Malthus: Ibid. p. 432.
- (8) Ibid. p. 439.
- (9) Ibid. p. 439.
- (10) Ibid. p. 582.
- (11) Ibid. p. 342.
- (12) Ibid. p. 583.
- (13) Ibid. p. 448.
- (14) Ibid. p. 455.

- (15) Ibid. p. 585.
- (16) Ibid. p. 466.
- (17) 參照前揭拙稿
- (18) T. R. Maltheus: Ibid. p. 477.
- (19) Ibid. p. 478.
- (20) Ibid. p. 478.
- (21) Ibid. p. 478.
- (22) Ibid. p. 465.
- (23) Ibid. p. 587.
- (24) Ibid. p. 478.
- (25) Ibid. p. 479.
- (26) Ibid. p. 480.
- (27) Ibid. p. 489.

五 一般恐慌論對於現實方面的適用

以上，已經詳述馬爾薩斯關於一般的理論，而馬爾薩斯是隨處高唱『理論與經驗』(Theory and Experience)。因着經濟諸原理的研究，同時要明瞭『原理對於實際上適用的見解』，(1)是他的意識上的意圖之一。因之，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恐慌論，也是作為『上述諸原理的某種適用』(2)關於現實的恐慌的論究，也包含於其中。這種論究，即是作為關於『一八一五年以後勞動階級的困難』(3)的問題，而結束他的『經濟學原論』的。一八一五年及其後的恐慌事實，是我們已經檢討過的。引起李加圖的注意的，主要是此次恐慌以後的事實。我們對於馬爾薩斯首先把這個現實的問題，作為自己的恐慌理論的適用，而意識的加以論究，感到特殊的興味。

(第一)現實的恐慌與資本蓄積的關係

當時的恐慌及勞動階級的窮迫，是基於資本的缺乏之說，在當時極為普遍。意思是說資本比較勞動人口缺乏，因此惹起勞動階級的失業與窮迫。

但據馬爾薩斯的見解：資本對於人口的缺乏與資本對於資本需要的缺乏，應該明瞭的加以區別。『兩者因同是引起勞動階級間的困難，兩者情形常被混同。但這些本質上是可以區別的。兩

者有極不相同的特徵。因之，須用極不同的方法去處理。」（4）

第一、一國的資本，積極的向外國輸出。商品生產即趨減少。但因需要沒有變動，商品的價值即趨騰貴，增加利潤，刺激蓄積，減少了的資本，即急速的回復。在這種情形的「兆候」，是在由利潤的增高表示需要的存在一點。對於這種情形的處理，是在蓄積的獎勵。

但第二、一國的資本，在因恐慌的破產而減少時，由於需要的缺乏，遂利潤低減，商品下落，資本比較需要過剩。在這個時候而獎勵蓄積，反加重資本家階級的困難。

然則當時英國的狀態，屬於這兩種情形的那一種呢？無疑的是屬於後者。第一因戰爭「政府消耗莫大的資本」。（5）第二、戰爭終結時「極異常的需要沈滯」。（6）及私的資本之消耗。第三、由於沈滯的結果，利潤及地租的減少，需要的減退。第四、受戰爭刺激的人口增加與因軍隊解除的勞動供給的過剩。因這許多原因，資本雖是絕對的減少，但和需要比較，仍屬過剩；生產雖是絕對的減少，但比較對此的有效需要，則呈商品過剩；工資雖是低下，失業者卻仍在增加。其特別的徵候，即是資本的過剩。利潤的低下。在這種狀態之下，「而獎勵節約，獎勵更大的收入向資本的轉化，不是

反於經濟學的原理嗎？對於一切原理中最大最普遍的原理——需要供給的原理——不是徒事無益的反抗嗎？不是和在國民餓死轉徙的時候，而獎勵結婚相同嗎？（7）要之，這種恐慌，不是由於資本之絕對的缺乏，而是基於資本之相對的過剩。這即是馬爾薩斯的主張。

但這種困難，在他一方面，又有基於其他諸原因之說。如耕作限界的低下，商業的限制，租稅的重課等等原因。在這些原因的一般的性質，不利於財富的進步，馬爾薩斯也不反對此點。只是，問題是關於現實的恐慌原因。他主張這些原因對於現實當面的困難，不能與以任何的說明。

因為，這些原因在最有強力作用的戰時中，卻是最急速的國富增進的時期。但由於和平的回復，「在最貧弱的土地放棄耕作以後，在和平排去了許多商業上的限制以後，……在千七百萬的租稅由國民減輕以後，我們經驗到最困難與幾乎不能忍耐的壓迫」。（8）因此，「我們應該在他方面探求現在的困難的直接原因」。（9）然而應在何處去探求呢？

「戰爭以來一般感嘆的沈滯，我認為由以生產力為唯一的財富的要素，如生產力增加，財富即與此成比例的增加。多數人這樣推論的理論，是不能說明的」。（10）因為，社會的生產力，和戰爭

的終結，同時被解放。增加的資本與勞動，在等待使用的瞬間，即惹起沈滯的關係。此點即是明白的表示「財富永續的增加，在生產力的增加以外，另有其他的必要」(11)云云。

(第二)現實的恐慌原因

如資本的缺乏及其他諸原因，不是現實的恐慌原因，那麼，應在何處去探求恐慌的原因呢？

其他的論者，又以這種恐慌是由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期惹起的經濟擾亂。即基於生產部門的均衡之一時的破壞。資本適應新變化的事情，「由過剩的事業向不足的事業移動，恢復適當的均衡」(12)的困難，而發生的一時的擾亂。我們在前論李加圖部分的恐慌之原因時，已經知道他是

此說的代表者，馬爾薩斯則加以反對。因為：

第一、為適應新事情的資本的移動，「認為沒有戰後至今那樣長期間（約五年）的必要。：

…產業部門的必要變化，在一二年間即會發生」。(13)

第二、「如據此說，應該是多數存在的資本不足的事業；能把普遍於極多數的種種產業部門，明白使歐洲市場供給過剩的一切過剩資本，充分的吸收的事業，這種事業存在於何處呢？」(14)

因之，馬爾薩斯以爲從戰爭向和平的推移，自然是恐慌的原因。但決不是因此惹起資本移動的困難。因是惹起「消費及需要全量的大減少」。(15)「產業部門的必要變化，在一二年間即會發生。」但這種由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期惹起的消費及需要之一般的減少，是可以繼續到極長久的期間」。(16)因爲，這種需要減退，在第一次是由於政府支出的減少；在第二次是由於民間支出的減少，更表示是國際的一般的減少。再，就與此有關聯的，馬爾薩斯所謂消費與需要的減退，指出值得注意的二三點。

第一，所謂消費與需要的減少，是「全量的大減少」，是「一般的減少」。既不是對於特定商品的部分的消費之減少，又不是對於特定生產部門的特殊需要之減退。我們在前已經知道李加圖所謂需要方向的變動，和他的部分的恐慌論有關；現在又發見馬爾薩斯所謂需要之一般的減少，和他的一般的恐慌論有關，不得不感到興味。

第二，所謂消費及需要的減少，常是表明對於生產及供給之相對的減少。由此更發生兩種結果：第一，即是馬爾薩斯想到的恐慌的特殊性。現在，假如和平的恢復，常伴隨這種恐慌，那就是不幸

而言中。馬爾薩斯認為不一定是如此的，從前各次戰爭的終結，不一定發生過如現在的困難。在此次的恐慌，特別顯著的伴隨和平與戰爭，是由於「伴隨最近戰爭的極特殊的諸事情」。(17) 然而所謂特殊事情是什麼呢？我們在前從事當時恐慌之史的考證時，已經明白這些恐慌雖是和戰爭的勃發、進展、終結有關聯，但同時又是由於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飛躍的發展。現在馬爾薩斯說伴隨戰爭的特殊事情，即不外乎是戰爭中的生產力的異常發展。他主張和這種生產力的異常發展對比的消費及需要的減退，即不外乎是恐慌的原因。他說：「支出急激的大減少時，資本家及勞動者所感的困難，恰和生產力成比例。又和資本急激的蓄積與大量消費的容易成比例」。(18) 消費及需要的減少，作為表明對於生產及供給之相對的減少的第二結果。以為這種恐慌在各國的強度，表現出所謂和戰爭損害成反比例的一見矛盾的現象。現在，假如這種恐慌單是基於戰爭的打擊，那麼，恐慌的強度，就應該是和戰爭的損害成比例。但事實卻是相反，戰禍大的國家，卻受恐慌的損害甚少；戰禍小的國家，恐慌的打擊卻甚大。「一般……作為原則設定的，是由於戰爭所受苦痛最多的各國，受和平的苦痛最少」。(19) 因為，在戰爭損害大的國家，生產力不能在戰

時中大大增加，反趨減退的原故，戰後的需要減退，不是如何的痛苦，反是好機會。反之，在戰時中發展異常的生產力，顯著的增大了資本的蓄積的國家，伴隨和平恢復的需要減退，不得不是極大的打擊。而據馬爾薩斯的見解：「英國與美國近於後一種類的國家。他們受戰爭的痛苦最少，無寧是由戰爭而增加了財富。但他們現在受和平的痛苦最深。」（20）

（第三）現實的恐慌對策

因之，馬爾薩斯排斥作為恐慌原因的資本不足說，主張資本過剩說；排斥需要變動說，主張需要減退說。其必然的結果，是恐慌對策排斥蓄積獎勵策；不主張生產獎勵策，而主張消費獎勵策。我們在前已經見到他關於恐慌的一般理論，是由肯定一般的恐慌之成立的生產論，和論究一般的恐慌論之否定的分配論而成。其次，知道他的恐慌否定論，是立腳於由貢獻財富的分配，增進財富價值的三原因的存在。即：財產的分割、商業的擴張及不生產的消費者之存在。因此，現在事實上否定恐慌的恐慌對策，如能招致這三種事情即可。然而招致這些的具體政策，是如何的呢？

其中關於土地財產的分割與商業的擴張，他也沒有明確的揭出徹底的對策。如像直接干涉

土地財產的分割，不是他所贊成的。雖論及關聯財產分割的國債處分的問題，但他在此點的主張，也不明確。只是，如由他以國債「造成財產的分割及中產社會階級的增加」(21)的見解，即是不贊成國債急激的償還。關於商業的擴張及外國貿易的問題，他雖是一般的主張自由貿易，卻又贊成成爲當時問題的穀物條例。對於其他的貿易限制，因主張漸進的撤廢，故現實的恐慌對策，他的主張在此也不明確。

馬爾薩斯的恐慌對策，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的不生產的消費的問題。對於各個私人，「充分的知道關於不生產的勞動之結果的真理。不以妨礙財富增進的爲目標，而宣傳是可以增進財富的」。(22)應該應着他們的能力，維持不生產的勞動者。

如由國家政策的見地看來，應該整興如像使用勞動而直接沒有引起生產物增加的事業。如道路的開通、運河的開鑿等等公共事業。以這種事業是惹起生產資本之減退的反對論，在這種情形，並不能成爲問題。因爲，現在情形是苦於資本的過剩。只是，問題是在「這種事業過於隱蔽國民對於勞動需要的減退，成爲妨礙人口自己適合於減少後的需要的結果」(23)一點。因此，在這種

情形，應由支給低廉的工資，以防止這種弊害。於是，「在道路及其他公共事業使用貧民的事，建設改善地主及有產者間的土地，僱用職人及婢僕的傾向，這兩種在為救濟因生產消費的均衡擾亂所發生的害惡，是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並且是最直接的對策」。(24)

要之，由於分配上三原因的作用，回復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要的均衡，增高生產物的全價值，因之增高利潤。資本家至此纔開始能夠從健實的高利潤——不是由支出的削減——蓄積資本。『我們此時纔開始能由節約的普通過程，即由以增加了的收入一部追加於資本的過程，安全有效的回復我們損失的資本』。(25)

(1) 『馬爾薩斯經濟學論』卷四

(2) T.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490.

(3) Ibid. p. 499.

(4) Ibid. p. 490-491.

(5) Ibid. p. 493.

(6) Ibid. p. 493.

(7) Ibid. p. 495.

- (8) Ibid. p. 498.
- (9) Ibid. p. 496.
- (10) Ibid. p. 498.
- (11) Ibid. p. 498.
- (12) Ibid. p. 499.
- (13) Ibid. p. 499.
- (14) Ibid. p. 499.
- (15) Ibid. p. 499.
- (16) Ibid. p. 499.
- (17) Ibid. p. 501.
- (18) Ibid. p. 502.
- (19) Ibid. p. 500.
- (20) Ibid. p. 501.
- (21) Ibid. p. 507.
- (22) Ibid. p. 511.
- (23) Ibid. p. 511.

(24) Ibid. p. 512.

(25) Ibid. p. 513.

六 恐慌的一般性及相對性

由以上所述，可以明白馬爾薩斯的恐慌論，既不是如普通所解釋的絕對的恐慌論，又不是恐慌必然論。如以恐慌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現象。在當時社會的存在，在立腳於古典學派共通根柢的馬爾薩斯，是不能不考慮的地方。簡言之，他的恐慌論，是相對的恐慌論，不過是在肯定某程度下之一般的恐慌的成立，想率直的認識存在於現實的恐慌而已。

但是，此點已經和李加圖等的否定論對立。而有如我們已經知道，李加圖等的否定論，也並不是絕對的加以否定。他們的否定，不過是一般的恐慌之否定，並未否定部分的恐慌之偶然的發生。因此，馬爾薩斯恐慌論的特徵，是在第一、爲李加圖等偶然的部分的恐慌論之對立物。第二、爲後世學者必然的一般的恐慌論之對立物。成爲連絡前者向後者發展的一連環，作爲相對的一般的恐

恐慌論而存在一點。前者的發展，馬爾薩斯是由部分的向一般的。由偶然性向相對性的發展。向後者發展的機軸，是表明向絕對性發展過程的相對性。換言之，由於認識恐慌的一般性，他自己對於前者具有特徵；由於主張恐慌的相對性，他自己對於後者具有特徵。以下就此二點一言之後，再對於二點加以批判。

(一) 恐慌的一般性：馬爾薩斯所謂生產過剩，不是限於特殊的商品或特定的生產部門，而是遍於主要生產部門之大部分的一般的生產過剩。其論據的第一點：是在以這種生產過剩，是基於需要之一般的減少。基因於社會的購買力之一般減少的生產過剩，明白的是一般的。他在此點的主張，和李加圖等單是強調需要方面的變動之部分的恐慌論對立。

一般的恐慌的第二論據，是在排斥物物交換說的物勞交換說。馬爾薩斯非難為部分的恐慌論者之主要論據的物物交換說，不取則於現實。主張大部分的商品，無寧是和勞動交換。這種主張在常在與消費者的關係中觀察商品的馬爾薩斯，可以說是當然的主張。如據他的見解，勞動者的消費及需要，在從事蓄積的時候沒有增加。因之，對於已經增加的商品生產，即發生與此交換的勞

動之相對的不足，生產遂不免過剩。第一論據的需要之一般的減少，是在由戰爭向和平的過渡中所惹起之現實的特殊的恐慌原因。第二的論據，是伴隨資本的蓄積之一般的傾向。無論如何，馬爾薩斯由於這種一般性的是認，在一方面，和部分的恐慌論對立；在他一方面，是成爲向一般的必然論之過渡程序。

(二) 恐慌的相對性：增加財富的分量的生產上三原因，僅此不能增加財富的價值；因之，正因此而發生增加分量的困難。如就資本的蓄積看來，在一方面，是增加生產的分量。同時在他一方面，發生社會的需要的減少，惹起價格的下落與利潤的低下。蓄積動機遭受阻害，生產發生困難。即是，只是生產力的發展，必然的引起生產過剩，這就是他的恐慌否定論。

但由此可以明白的，不過是這種一般的恐慌之成立，只是在一定條件之下，即限於只是生產上諸原因發生作用的情形，纔有可能。現在，假如在由增進財富價值的分配上諸原因，和分量的增加同時是價值的增進；那麼，生產的增加，就沒有發生過剩的事，可以永久的進行。即是，恐慌的成立，可以由考慮財富的分配去否定。同時，現實的恐慌事實，又可以由分配政策去防止。因之，馬爾薩斯

的生產動態論，是論恐慌的肯定或成立；分配動態論，是論恐慌的否定或克服。所以我們呼馬爾薩斯的恐慌論為相對的恐慌論。他由這種相對性，一方面和李加圖等的偶然性對立，他方面表示是向後世學者的絕對性或必然性的過渡程序。

七 馬爾薩斯恐慌論的批判

第一、先考察馬爾薩斯關於生產過剩或恐慌的一般性的議論。我們已經論證過當時的恐慌，是相當程度的一般化；並且，在發展到當時程度的資本主義，恐慌決不是止於特定的企業或特別的生產部門。現在，馬爾薩斯在理論的及實證的主張恐慌的一般性，和部分的恐慌論者比較，可以說是表示有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主張當時的一般的恐慌，是基於資本主義初期的生產力之飛躍的發展，和需要伴隨戰爭終結之一般的減退。應該認為是立腳於正當的理由與觀察之上。

只是，論證恐慌的一般性的第二論據，覺得尚不充分。對於物物交換說的物勞交換說，當觀察商品，不僅是在商品相互的關係，並努力在商品對消費者的關係中去觀察，雖完全是正當的，但他

非難他人不取則於現實，他的物勞交換說能否免去此種弊病，恐怕還是疑問。假使不問此點，而他以這種物勞交換說為根據，引導出恐慌的一般性的推論，究竟正當與否，亦屬可疑。

如由他的假定，是在說收入的一部轉化為資本時，但勞動者全體的消費及需要，並不因此而有一絲毫的增加。因之，「已經增加的大量商品，比較和商品交換的勞動，則成供給過剩」。(1)不待言，和商品交換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而是資本家需要的勞動，或有購買力的勞動。換言之，不外乎是勞動者的購買力。然則認為勞動者的購買力，不因資本的蓄積或生產的擴張，而有絲毫的增加，這究竟是正當的嗎？因着生產的擴張，勞動需要的增加，增加既存勞動者的購買力，同時是有購買力的勞動者的增加，這是馬爾薩斯在他處也承認的。因之。正當說來，應該是因着資本的蓄積，勞動者全體的購買力也增加。並且在事實上也是常見到的現象。在這種情形，物價騰貴的傾向，比較工資騰貴的傾向還強時，各個勞動者的購買力，反趨減少，而全體的購買力，不一定能由這種事實去判斷。在這種情形的問題，無寧是由資本蓄積生產物的增加，和伴着蓄積勞動者的購買力增加之比例如何的問題。有如後論，假如因着資本構成的高級化，增大資本投資對勞動投資的比例，

引起勞動者購買力之相對的減少。那麼，在此就留有消費不足說存在的餘地。但馬爾薩斯以消費不足是發生於資本家方面。

禁欲生活。消費節約與資本蓄積，馬爾薩斯認為是必不能分離的。本來，不注意在資本主義的開始時，禁欲生活及消費節約對於資本本源的蓄積所占的位置，不是正當的。因之，古典派或古典派以前的經濟論者，認為節約與蓄積是同一意義，應該承認他們有相當的理由。但是，已經在資本主義的組織內，資本開始增殖運動以後，資本的增殖，並不一定是和節約或禁約不可分離的。假如資本家能滿足於從來的生活限度，那麼，雖是和禁約或節約如何無關，但蓄積則大速度的進行；雖是更遞增他們的奢侈程度，但遞增率在不及資本的增殖率時，增殖運動即可無限制的進行。因此，如馬爾薩斯以在資本蓄積時，在資本家方面的消費，即和此成比例的絕對的減少，由此以生產過剩作為結論。不能認為是正當的推論。

第二、考察馬爾薩斯關於恐慌的一般性的主張。在此的根本問題，是他的價值論及與此有關聯的分配論的問題。根本的論評他的價值論，不是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此有說明的必要的，是馬爾

薩斯所謂價值和李加圖等所謂勞動價值不同而是屬於呼爲交換價值自然價格或生產費價格之類的下位範疇的。我們先在這個前提之下加以論究。馬爾薩斯與李加圖終生的論爭，是及於許多問題。但他們的主要問題，是以價值論與恐慌論爲主。後者根本的關聯雙方價值論上不同之點甚多。但在這種情形，他們互相有以自己的價值概念以律對方的傾向，並沒有努力根本的分析對方的概念。因之，論爭終生不盡，而因這種論爭，他們的任何一方或一般的經濟學界，曾有如何發展與否，亦屬疑問。

現在，我們占在馬爾薩斯自己所謂價值概念之上，檢討他的議論。在一方面，他主張價值概念的必然結果，是價值由需給關係而決定。但在他一方面，他以價值專由需要而決定。因之，價值主要是依存於商品之適合社會的欲望。帶着重視主觀的要素的傾向。由此，『價值的增加，主要是依存於分配』。(2)

所謂價值是依存於分配，是表明價值依存於對於欲望或需要的適合。因之，沒有十分顧到供給方面情形的如何。他以需給原則是『一切原理中最大最普遍的原理』。(3)認爲有最高的權

威。雖又極力主張對於價值論的適用，但未十分顧及古典派共通的自然價格說或生產費價格說。由於價格變動的生產之自然的調節。代之以由於分配政策的價格維持，故又主張生產維持。這即是他的價值論中一種內在的弱點，同時又是橫於他的分配論中，相對的過剩說根柢的一弱點。

馬爾薩斯以為有特殊意義的分配，是存在於維持商品價值的必要過程中。在此他所謂價值，不是作為生產之自然的調節者的生產費價格；而是在由於因分配手段需要之永續的確保，作為保證生產之永續的擴張的刺激。他的表示商品向消費者的配給的分配論，在一方面，常在商品與消費者的關係中考察商品，與以引導出供給與需要、生產與消費之相對的考察的功績。同時，在他一方面，以至沒有注意到固有意義的分配，即收入或所得之個人的及階級的分配問題。蓋地主、資本家、勞動者三階級所得的地租、利潤、工資的相互關係，亞丹·斯密作為價格的構成部分，李加圖作為獨立的分配問題，曾經惹起特殊的注意的。這種意義的分配，在一方面，是作為各階級的生活資源，更是決定勞動階級生活程度的一要素。同時，在他一方面，是作為一社會的購買力資源；更是決定資本家階級生產擴張的一要素。而李加圖的分配論，主要是偏於前者，沒有十分注意到成為

購買力資源的生產活動的刺激，以至否定一般的過剩。但在馬爾薩斯的動態論，幾乎沒有注意這種固有的分配論，故未十分論及成爲生產的刺激之勞動階級的購買力。他對於消費或需要的關心，無寧是以資本家階級的爲中心。例如，以伴隨資本蓄積的過剩生產，是因資本家消費之絕對的減少；分配論中的財產分割及不生產的消費，也主要是以資本家消費的增加爲中心。馬爾薩斯的分配論，是止於向消費的階級的商品分配。沒有進而論及占消費者大部分的勞動階級購買力如何的問題。在此使消費不足說留有發展的餘地，可以說是分配論逸去所謂分配的主要問題的當然歸結。

馬爾薩斯的特殊分配論的內容，也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財產的分割愈漸平等，各人對於所有生產的發言權，亦漸趨平等。因之，存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的需要與社會的必要之背反，可以漸趨緩和。在這種意義，他所謂分配是依存於財產的分割，是正當的。只是，所謂財產的分割，主要是土地財產的分割，不過是包含商工階級。不以這些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所得的分割爲問題。他這種財產分割說，不能與現實的恐慌對策以任何明確的暗示，實是當然的歸結。

第二、商業的擴張，尤其是海外市場的開始，擴張商品的流通，即長價值的實現。並由此可以防止生產過剩的主張，或屬正當。他在此點有暗示後期資本主義的海外市場爭奪戰之感。只是，他受極端的地主擁護說的掣肘，作為現實的恐慌對策的貿易論，又是極不徹底的。

第三、馬爾薩斯高調不生產的消費者之必要的主張，當時非難這是獎勵浪費。但以恐慌或不況的救濟策，政府應整興公共事業的主張，則為後世多數人所支持實行。只是，他的主張，不是勞動者的失業救濟策，無寧是有由寄食於地主、資本家的所得之不生產的消費者之增加，或寄食於國家租稅的不生產的消費者之增加，而喚起需要之感。然而這些不生產的消費者的生活資源，結局是歸於利潤或地租的負擔，不是阻害蓄積的動機嗎？因此，他以為是永久確保財富增進的這種不生產的消費，在結局不是直接壓迫財富生產的結果嗎？

最後，檢討馬爾薩斯的蓄積論。第一、資本的蓄積，他以為正當的是從收入向資本的轉化。只是，在這種已經轉化的資本部分，是投於如何對象的重要問題，他和李加圖同樣的陷於古典派共通的錯誤，在李加圖，以為蓄積一切成為勞動需要，其次即成勞動階級的商品需要，生產擴張即是需

要擴張。故否定生產過剩在馬爾薩斯，以爲蓄積成爲對於生產勞動之需要的增加，但勞動階級全體的商品需要，並不因此而增加，故肯定生產過剩。在這種情形，兩者共通的弱點，是在完全不注意生產手段轉化爲資本的蓄積部分，最低限度，其一部是投資爲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因此，如像蓄積部分的一切，立即成爲對於生產勞動的需要的事，可以說在一般是沒有的。但是，馬爾薩斯以爲勞動階級的商品需要，沒有絲毫的增加，是和李加圖陷於極端反對的主張。如更以這種情形的蓄積，表示是資本家消費之絕對的減少，也不是適當的。因之，馬爾薩斯關於蓄積的錯誤，似乎是有三重存在。

第二、馬爾薩斯關於蓄積的極限的考察，在和李加圖的對立；是值得注意的。在李加圖，以爲蓄積的極限，是從利潤率遞減的法則演繹出。蓄積的極限，即擴張生產的困難，或者是在遙遠的將來，只有一次的到來。但達到這種狀態的社會，決不是如像沈滯或恐慌的悲觀狀態。反是理想的靜止狀態。但在馬爾薩斯，以爲蓄積的極限，並不是這種只有一次的歷史發展的極致，而是一再在現實發生的沈滯或恐慌；他們當時遭逢的恐慌，即是達到這種蓄積的極限的左證。柏格曼 (Dr. Berg-

mann) 引用李加圖所述蓄積的極限的事實說：「李加圖在此敘述的事實，恰和馬爾薩斯在生產過剩說中所述事實相同」。(4)這是很適當的。

第三，作為以上的結果，現實問題的蓄積，即生產擴張的困難，李加圖是加以否定；馬爾薩斯不僅是率直的加以肯定；並且，和人口法則併立，作為一種自然法則的資本法則，存在於資本家社會。恰和勞動階級的貧窮，作為人口法則的結果，是必然存在的相同；生產過剩或恐慌，作為資本法則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家階級不能避免的運命。只是，以貧窮由道德的抑制而緩和，恐慌也由他的分配政策，可以緩和至某種程度或避免而已。

(1) Thomas Robert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 p. 353.

(2) Ibid. p. 426.

(3) Ibid. p. 495.

(4) E.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1895) S. 94.

第七章 西斯孟第的所得不足說

一 西斯孟第的研究方法與恐慌論

在任何意義都不能認爲西斯孟第是屬於古典派的。里士特(C. Gide et C. Rist)教授稱之爲「批判學派之創始」，(1)誠屬當然。關於論究他的經濟學，在何種意義與古典派不同，不是現在的問題，在此我們要研究的，不過只限於他的恐慌論的範圍。

第一、在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西斯孟第和史伊、李加圖諸學者成顯著的對照。與其說他是經濟學者，無寧說他是歷史家，在留有偉大業績的他，先基於事實之實證的研究，然後從事抽象的思辯的研究，可以說是當然的。他被稱爲以後德國歷史派經濟學的先驅，即因此故。但他並不一定是排擊抽象的思辯的方法。里士特教授就此點指摘西斯孟第的矛盾。非難他一方面排斥抽象的方法，

而自己卻不得不用這種方法。(2)但我以為他決不是排擊一般的抽象法，只是排斥李加圖及其他的特定抽象法，止於指摘他們抽象的思辯內容的錯誤。(3)他說：

「爲着適用自己的計算，比較造一和現實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陷於更大錯誤的推理方法，恐怕沒有別的……」

『第一論者(John Ramsay, Mucculloch)假想沒有利益的事業，假想勞動者的消費，僅止於正確更新的再生產……』

「同時，論者假想不是爲利益而成立的分業；論者假想僱主與勞動者，但僱主的一份，什麼也沒有加以承認」。(4)

因之，思索方法的抽象法，也是他自己所好用的；並且，他自己也承認他的原理是抽象的。他說：

「……不能因這個原理是抽象的，理解困難，規定也困難的關係，又有陷於錯誤的說明的原故，拋棄在我認爲是真理的辯明」。(5)

「……這是計算最容易的假說。於是，我們達到最簡單的情形。但是，我們觀察現實組織的社

會，那裏工資是由競爭而決定。並且，僱主如不需要勞動，立刻可以解僱……

「我們假想具有現實組織的社會，在一方面有地主，僅指揮勞動而獨自取得收穫，由發明而獨享利益。在他方面有日傭勞動，在他們的勞動能力之外，沒有何種的財產；在他們的工資之外，沒有何種的收入。」（6）

現在，如就恐慌論看來，兩者的方法，更明白不同。我們已經知道李加圖及其他的學者，是從已經有先驗的一般的原理演繹，否定一般的過剩之存在。常有掩蔽存在於現實的事實的傾向。反之，西斯孟第首先認識現實的事實，然後求應由如何的理論或原理，去說明這種事實；一方面由理論去求事實，他方面由事實去求理論。這種一般的態度，是西斯孟第自己在「新原理」的序文中言明了的。他說：

「在著述「商業之富」以後，十五年以上的期間，我讀經濟學的書籍極有限。但我決沒有停止對於事實的研究。覺得這些事實的某一種，和我從前的原理相矛盾。

「由於我的理論有了新發展，我忽然明白是被這些事實整理和相互的說明。我的思想如愈

進步，愈深信我對於亞丹·斯密的學說所加的修正，是重要而有真理的。

「從這種新見地去考察時，原來在學問中曖昧的存在的一切，即趨明瞭。這個原理使我解決了一步也沒有前進的困難。」(7)

西斯孟第首先以這種態度率直的承認一般的過剩的事實，他奇怪反對論者爲什麼沒有承認這嚴然存在的事實呢？

「我在我的「經濟學新原理」中，和他（歐文）同樣的承認這種一般的停滯（engcombrement universel）的事實。我很不了解人人爲什麼反對現在世界商業顯示的實例，否定這種事實呢？我當說明這種事實的時候，是用我以爲新的一種理論。」(8)

「無疑的，商業上一般的過剩（engorgement universel）是比較部分的過剩（engorgement partiel）遙爲稀少……但是，假如李加圖的門弟子（MuckJulok）他四顧他的環境，他也見到這種過剩可能的事實能……」(9)

要之，西斯孟第的方法，是在由現實的事實出發，再加以抽象的思索，以求可以說明這種事實

之一般的抽象的原理。和由一般的抽象的原理出發，示明適合原理的事實的方法，完全是正相反對的。這種方法上的特異點，是使西斯孟第的恐慌論具有特徵的一種原因。

(1) C. Gié et C. Rist;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1926.) p. 201-234.

(2) Ibid. p. 207-208.

(3) H. Grossmann: Simonde de Sismondi et ses Theories Économiques (1924) p. 24.

(4)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II ed. (1827) Tome II. p. 383-384.

(5) Ibid. p. 372.

(6) Ibid. p. 419-420.

(7) Ibid. 1e ed. (1819) Tome I. Avertissement III-IV.

(8) Ibid. 11e ed. (1827) Tome I. p. 375.

(9) Ibid. p. 404.

二 西斯孟第的研究目的與恐慌論

如據他的見解，政治學是屬於經濟學的一部。因為政治學目的的人類之幸福，分爲精神的福祉(Bien-être Moral)與物質的福祉(Bien-être Physique)。故分政治學爲高等政治學與經濟政治學。後者(即經濟學)的目的，是在圖人類物質的福祉之增進。

「經濟學是教我們關於人類福祉的一切理論」。(1)

「經濟學是研究在一定國家最大數人類，享受最大程度的物質的福祉之手段……」。(2)

在以經濟學的目的，是在幸福的增進一點，他又和當時的古典派單以財富的增進爲目的的一點對立。如據他的見解，財富不是單作爲財富，應作爲謀人類幸福的手段，即作爲與人的關係的財富而加以研究。因此，在他的經濟學中，「人口」即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註釋他的著書的標題是：「經濟學新原理，或財富與人口之關係論」。(3)即以此故。他說：

「我的見解：政治家學者在研究什麼最可增進財富，或什麼最可增加人口，似乎都陷於相同的錯誤。如分別的考察財富與人口，不過是抽象物。在政治家的真問題，是在發見財富與人口的結合及比例。這纔是對於一定地域的人類，保證最大的幸福的。」

「經濟學研究財富是在財富利用人口的範圍經濟學研究人口是在人口享樂財富的範圍」。(4) 財富與人口在關於人類的幸福方面，即是經濟學的對象。

「於是，經濟學即成爲廣義的厚生理論 (Theorie de la Bienfaisance) 其最後的結果，在無關於人類幸福的一切，即不屬於這種科學」。(5)

但是，成爲「厚生理論」的經濟學，其必然的結果：直接問題不是在財富的生產，而是在財富的消費。而財富的消費，在交換經濟又是由所得來決定。因之，在西斯孟第的厚生經濟學中，所得論即成爲中心問題。

「我相信已把經濟學置於一種新基礎之上。即是，由於一切人人所得的決定，或關於這種所得分配的研究。這是與國民以最大的幸福的。因之，最能達到這種科學的目的」。(6)

「他們(李加圖等)所犯的錯誤，完全是這種錯誤原理。即由於以每年的生產與所得是相同的……如用這種原理去理解或說明商業歷史上最明確的事實，如市場的停滯 (l'engorgement des Marchés) 是絕對不可能的……」

「把每年的所得和每年的生產混同，即是把學問的全體掩上黑幕。反之，把所得從生產分開，一切即可明白，以至一切的事實和理論一致。」(7)

要之，西斯孟第以經濟學的目的，是在人類的幸福。其必然的結果：問題不僅是財富的生產，更注重財富的分配。因之，所得的研究即成中心問題。而以這種所得論為機緣，以論斷他的一般的過剩之肯定。以後要就他的所得論詳述。

(1)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IIe ed. (1827) Tome II. p. 378.

(2) Ibid. p. 250.

(3) Ibid. Ie ed. (1819) Tome I. Avertissement p. V.

(4) Ibid. IIe ed. (1827) Tome II. p. 250.

(5) Ibid. p. 250.

(6) Ibid. Tome I. Avertissement sur cette seconde édition. p. XIV.

(7) Ibid. Tome I. p. 366-367.

三 西斯孟第之理論的研究與恐慌論

西斯孟第由於他的研究方法的特異性，稱爲後世歷史學派的先驅；由於他的研究目的的特異性，又被稱爲後世社會政策學派的始祖。(1)我們也承認此點。但這兩種影響，都是離開西斯孟第自己的意識或意圖，是一種無意識的結果。他自己決不是意識的要創立歷史學派，或創始社會政策學派。

但在他一方面，卻有出於西斯孟第的意識的，是在對於經濟的貢獻。即是他的理論的研究方面。不待言，他的理論離開他的意圖，客觀的對於經濟學有如何貢獻，這是另一問題。但最低限度，在他的意識或意圖，尤其是在他的獨特的理論中，明白的是主張自我的存在。此點，如由他的著書標題用『新原理』的文字，即可窺見。關於這個標題，他自己也說：

「……我現在以十分的自信再版『經濟學新原理』，因爲這個標題稍爲曖昧，使人以爲此書只是初步經濟學的新概論，也未可知。但我的意圖與此大不相同，我相信已把經濟學置於一種

新基礎之上……」。(2)又在第一版的序文中說：

「從這種新見地去考察時，原來在經濟學中曖昧存在的一切，即趨明瞭。這種原理使我解決了一步也不能前進的困難」。(3)

然而他所謂「新原理」，所謂「新基礎」，所謂「新見地」的理論或原理，是什麼呢？這就不外乎是他關於所得（或收入 *Revenu*）的理論。他說：

「我在我的「經濟學新原理」中，承認這種一般的停滯（*encombrement universel*）的事實……當說明這種事實時，用在我認為是新的一年一種原理。即是，用關於置各人於購買每年生產物中他一份的狀態的，所得性質的理論」。(4)

「人口、生產、消費、蓄積、繁榮、貧窮等，一切和所得有關聯，一切由所得來說明」。(5)

但是，他的所得論的特異性，並不是在所得的概念。所得的概念，自亞丹·斯密的「價格的構成部分」以來，在古典學派是一貫的。西斯孟第也並不是排斥這種根本概念。只是，他極力主張地主與利潤的相似性，以兩者合而為一，和工資處於對立的地位。因之，又力主不是三階級的對立，而

是貧者與富者的對立。但是，各人的所得，爲生產所有各要素的代價，由賣生產物所得價額來支付，此點在他也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關於所得的重要問題有二：一、國民所得全體是由什麼而決定的問題。二、國民所得向成員方面的分配問題，現在，如就西斯孟第的所得論觀察他的特異性何在，知道是存在於這種所得論的兩方面。如說：「我相信已把經濟學置於一種新基礎之上。卽是，由於一切人人所得的決定，或關於這種所得分配的研究」。(6)所得分配論，姑俟後論。現在研究他的所得決定論的特異性。

因以所得是由生產而決定，故增加生產，必然增加所得。由此引導出所得決定論，以否定一般的生產過剩的，我們已經知道這是史伊、李加圖等的主張。但西斯孟第反對這個根本命題，誠然，所得是由生產而決定，但這種所得反決定其次的生產；所得在前是生產的結果，以後則成生產的原因。卽是，西斯孟第以爲所得與生產，不是抽象的兩種概念，而是在具體的時間的經過，有相互的因果關係的。現在的所得，因是過去的生產的結果。故生產增大，所得亦增加；但現在的生產，是過去的所得的結果，不過是將來的所得的原因。在關於現在的所得，現在的生產雖是如何增大，但所得並

不是和此同時增加的。『就是在各個人，在多數人，所得常不一定是和生產同時增進』。(7) 關於現在的問題，所得與生產是無關係的。認為生產決定所得，因為沒有充分的理解這種所得的性質，從兩者的混同而來云云。

如據西斯孟第的見解：史伊、李加圖的錯誤，『由於以每年的生產和所得是相同的』。(8) 『把每年的所得和生產混同，即是把學問的全體掩上黑幕。反之，把所得從生產分開，一切即趨明瞭，以至一切的事實和理論一致』。(9)

『生產在社會所得之中發見限界，如不知道這種所得，獎勵無限制生產的人們，雖一方面是向國民開富裕之道，但同時即引起生產的破滅』。(10)

因之，西斯孟第以為生產的增加，不一定是表明所得的增加。只是生產急激的增加，而不伴隨購買生產的所得的增加時，遂不免生產過剩的現象。

『每年所得的全體，應該是和每年生產的全體交換的……假如，每年的所得不購買每年的生產，那麼，這種生產的一部，即不能賣去而殘留下來，充塞生產者的倉庫，麻痺他們的資本，以致生

產停滯』(11)

然則所得是如何決定的呢？所得與生產、消費及支出有的關係呢？我們其次即檢討這個問題。

- (1) C. Gide et C. Rist;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1926) p. 206-210.
- (2)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1827) IIe ed. Tome I. p. XIV.
- (3) *Ibid.*: 1e ed. (1919) Tome I. p. iv.
- (4) *Ibid.* IIe ed. (1827) p. 375.
- (5) Simonde de, Sismondi;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1837) Tome I. p. 134.
- (6) *Nouveaux Principes* IIe ed, Tome I. XIV.
- (7)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I. p. 155.
- (8) *Nouveaux Principes* IIe ed, Tome I. p. 368.
- (9) *Ibid.* p. 367.
- (10) *Ibid.* p. 82.
- (11) *Ibid.* p. 106.

四 所得不足說

所得論是西斯孟第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他的理論的特異性，在他的所得論中發見；因之，他的恐慌論的特徵，也是由他的獨特的所得論出發。我們已經在前一節中，研究他論所得與生產的關係，現在更進而探討他的議論。

第一、在西斯孟第，生產與所得、所得與支出、支出與消費、消費與再生產的諸關係，不是抽象的觀念的，而是在時間的繼起關係中去規定。

「國民財富增進的時候，成一種循環運動進行。各個的結果，其次即成爲原因；各個的一步，即受從前一步的規制，而決定其次的一步……」。(1)

第二、在成爲這種循環運動之連環的生產、所得、支出、消費四種要素之間，成立如次的四種規定：

(一) 生產決定所得。他在這個命題，並沒有表現什麼根本的不同。只是，特別促起他的注意的，是生產物不是立即成爲所得。如要生產物成爲所得，首先應該銷售云云。

「……從再生產而生所得。但成爲所得的，並不是生產。生產呼爲所得，作爲所得而活動，是被

實現以後纔開始的。即是，已經生產的各種物品發見消費者……以後纔開始的。」(2)

(二) 所得決定支出。富者的支出超過，即是坐食資本，減低將來的所得，以至自趨滅亡。貧者的支出超過，即是坐食有限的儲蓄，或由於借貸。無論如何，支出是不能超過所得的。「國民的所得，應規定限制國民的支出。」(3)

(三) 支出決定消費。「國民的支出……應消費國民的生產全部。」(4) 支出不能消化生產物的全部時，過剩的生產物，即不能完成所謂滿足欲望的本來使命。在要消費生產物，就應由消費者的支出去購買。

(四) 消費決定再生產。此點如就個人觀察，在有超過個人消費力的生產物時，他不會開始再生產。再生產的施行，是為消費而施行；並且，是在能消費的範圍中施行再生產。因之，規制再生產的，在個人是人的消費。「但是，消費附於再生產的限界，深感不是在孤立的個人，而是在社會。」(5) 因為，在交換社會的消費，是由購買力而決定，這種購買力是由所得而決定。

因之，我們是出發於生產而歸著於生產。生產決定所得，所得決定支出，支出決定消費，彼此先

後的決定；最後是這種消費決定再生產，這在概念的，確是循環論法。因最初的生產與最後的生產，在概念的同是生產。但在具體的，決不是循環論法，因最初的生產與最後的生產，在具體的是兩種不同的存在。

所謂消費決定再生產的最後的命題，是他的所得論有特異性的根本命題。史伊、李加圖以為規定生產的，不外乎是生產。但西斯孟第以為生產先由消費而決定，這種消費更由所得而決定。

「購入今年的生產物的，是去年的所得。限制將來未定的勞動量的，是一種既定量。主張無限制生產的人們的錯誤，是由於他們混同過去的所得與未來的所得」。(6)

把問題在量的方面加以考察。由消費而決定的再生產，和從前的生產比較，在量的方面有何關係呢？是同量？或更小？或更大呢？換言之，是縮少再生產呢？擴張再生產呢？或是同規模的再生產呢？「絕對的消費，決定同樣或更大的再生產」。(7)但西斯孟第與史伊、李加圖相同，常豫想「財富的增進」。因之，縮少再生產，自然是在問題之外；就是同規模的再生產，也是在問題之外。雖是說「同樣或更大的再生產」。但具體的問題，常是論更大的生產。

「循環擴張螺旋狀進行的，即在此點。假如去年生產及消費爲一〇，即可以想到翌年生產及消費同爲一一」。(8)

然而是如何的從事這種生產的擴張呢？不待言，是由於資本家保留利潤的一部追加於資本；即由於所謂資本的蓄積而施行。

「已經是富者從他的所得取出幾分追加於他的資本，或追加支付貧者的工資，其結果即可成更多的勞動」。(9) 因之，前述所謂所得決定支出的命題，不一定是表示兩者在量的方面是一致的。最低限度，富者階級不是把所得的全部支出或消費，從支出保留一部追加於資本時，生產擴張纔有可能。這種生產擴張的結果，在一方面，由於增加富者的所得源，間接是增加他們的所得；在他一方面，即是直接增加貧者的工資所得。他說：

「其結果即成更多的勞動。假如，更多的勞動賣去或善價賣去，這種新資本即生和此成比例的所得。而這種所得更要求新的消費。在過去一年的節約，分配於次一年。一部成爲所得以增加富者的享樂；一部成爲工資以增加貧者的享樂。因此，如這種運行合乎節度，是可以繼續的，但過於急

激時，即發生破滅」。(10)

因之，在再生產漸次的擴張進行時，因係以過去生產結果的所得購買現在的生產物，這種所得即常比生產物不足。這種所得的不足，與生產過剩以發生的可能性。只是，這種所得的不足，在止於某程度的期間，再生產即可無障礙的繼續進行。

「要之，人決不是今年生產物的總量和前年生產物的總量交換；假如生產是漸進的增加，則各年的交換惹起僅少的損失，同時可以改善將來的狀態。

「假如，這種損失有統制而且分擔良好，則各人對於各自所得，沒有感到不滿的事，可以忍受的。而因此國民的節約纔成立。其次，這種犧牲的損失的聚集，即是增殖資本或公衆的財產的」。(11)

因此，這種所得的不足，從一方面看來，是「犧牲」；「損失」；但從他方面看來，則是「節約」；「增殖」。從一方面看來，是一般的恐慌之可能的原因；但從他方面看來，則是財富增殖的原因。他在他處呼之爲「剩餘價值」(mieux-Value)。

「這兩種力（勞動與資本）結合時，兩者合而爲一，以至有一種擴張力。而勞動者今年的勞

動，較之去年的勞動，更有極高的價值。產業確保財富繼續的增殖，即由於這種剩餘價值（*plus-value*）的原因。既可成爲產業階級的所得，又可追加於他們的資本』（12）

但是，如要資本增殖繼續的進行，這種「剩餘價值」或「犧牲的損失」，不能過大。西斯孟第所謂「漸進的」，所謂「僅少的損失」，及所謂「如這種運行合乎節度，即可繼續」云云，即是此。假如反對的是生產急激的擴張，以極大的損失去交換，或輕率而無節度的增殖，於是恐慌勃發，運行遭受阻害。

因此，西斯孟第以爲恐慌的可能性，是在所得比較生產的不足。這不一定是表示勞動階級所得的不足，是全體的國民所得，已經必然的比國民生產不足。只是，在這種可能性帶有現實性，有如後論，是這種所得與生產的不均衡，更由其他諸事情而增高至某種程度。

「假如，在新生產與舊生產之間，發生極大的不均衡。那麼，資本即趨減損，惹起苦難，國民的進步即變成退步」。（13）

「不論從如何見地去考察財富的進步，我們常是達到相同的結果。如財富的增進是漸進的，

是和自身成比例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急激的增加，這即是增進一般的幸福。但是，假如這種機關之一，比較其他的過於迅速的活動，那就發生苦難。這種苦難生於消費比所得的形成更急速時，而結果是生產比消費更大的情形。這是我們已經見到的。」（14）

要之，「生產與所得及消費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擾亂，在國民是有害的。這在生產引起比通常更少的所得的時候，或資本的一部成爲消費基金的時候；反之，在消費減退對於新生產無要求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只是均衡如破壞，國家即發生苦難。」（15）這種均衡的破壞，即是恐慌。但西斯孟第認爲這種又是可以自然的調和的。他說：

「幸福不是國民在錯誤的制度中可以把握。如政府不與國民以避遠自然利益的刺激，則資本與所得及消費的增進，最能同一步調的進行。無須加以人力之必要。假如這些相互適應的財富的三部分之一，如一時的有不能適應他部分的情形，則幾乎是常待外國貿易去回復均衡。」（16）這種思想和他的恐慌必然論如何調和，卻沒有明白。只是，如爲避免他自身的矛盾，應解釋這種自然的均衡恢復，只行於他所謂「漸進的」條件之下。

- (1) Simonde de, *Simondis: Nouveaux principes* IIe ed, (1827) Tome I. p. 113.
- (2) *Ibid.* p. 121.
- (3) *Ibid.* p. 113.
- (4) *Ibid.* p. 115. p. 119.
- (5) *Ibid.* p. 117.
- (6) *Ibid.* p. 120-121.
- (7) *Ibid.* p. 119-120.
- (8) *Ibid.* p. 120.
- (9) *Ibid.* p. 120.
- (10) *Ibid.* p. 120.
- (11) *Ibid.* p. 121.
- (12) *Ibid.* p. 103.
- (13) *Ibid.* p. 121.
- (14) *Ibid.* p. 409.
- (15) *Ibid.* p. 122.
- (16) *Ibid.* p. 123-124.

五 恐慌的諸原因

西斯孟第所謂恐慌的根本原因或可能原因，有如所述，是在所得比較生產的不足，國民所得全體比國民生產不足，在此即潛伏有恐慌發生的可能性。這即是我所以把他的恐慌論和消費不足說及勞動階級的所得不足說許多見解分開，稱之為所得說的原因。但是，他也以所得是決定消費的，所得的不足，即是消費的不足。因之，即發生生產消費的不均衡，他並且常常注意這種事實。

「由於商人的介入，各人已早不是爲自己而生產，而是爲未知的人們而生產時，在欲望與滿足欲望的物品之間、勞動與所得之間、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種種均衡，早已不能確實的得到……」。

(1)

「這即是現實的困難的表徵，表明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均衡的增大」。(2)

但是，這種情形的消費不足，又決不是表示特定階級的消費不足，不過是說全體的消費不足。自然，有如後述，勞動階級的消費不足，也可承認是一種原因。但是，這不過是和其他諸原因併立，爲

在現實惹起恐慌的原因之一。

已經述過，他以所得比生產不足，故消費比生產不足。但這種不足在止於一定範圍之間，不僅是不發生什麼的不便，反因此可以期待國富的增進。於是，問題是這種不均衡增高到某種程度以上，妨害國富的增進的事情是什麼？換言之，在現實惹起恐慌的事情是什麼呢？

西斯孟第關於諸事情的說明，不一定是明瞭的。決不能認為是有系統的考察。但我們想整理他散見於各處的主張，可能的有系統的加以考察。首先分爲生產或供給方面的諸事情，和消費或需要方面的諸事情。

第一、在現在交換經濟已經發達的生產者，因並不是爲必要而生產，而是爲利潤而生產。於是，生產有擴張至必要以上的傾向。

「商業，即勞動及商品的交換，分割機能於社會成員之間，以達到共同的目的。各人追及私的目的，失去一般利益的見地。因之，不能如充足人人一切欲望一樣的，正確的調節各自的行爲。

「施行分業時，各人只考慮一種物品的生產。他恰不知道社會是如何需要這種物品，只求達

到他的目的。而他自己就想無限制的生產。因為，他的可能目的，不是貨物的集積，而是貨幣的集積。……他所考慮的，不外乎在富裕自己，他的希望是沒有限界的。」(3)

第二、生產者之間的自由競爭，又必然的引起生產擴張。

「各生產者都努力比較他的同業者低廉的賣去，由廉價而得到購買者……於是，任何人在廉賣的必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一切對於人的停滯。即是有比欲望更大的商品，達到沒有損失不能售賣的市場。」(4)

「他們只是相互的排除顧客，這種競爭遍於世界各處。足以充分的證明生產超過需要的事實。在這種競爭繼續的範圍，只注意增多交易的商業，決沒有回復均衡的傾向。」(5)

「這三階級常是同樣的只注意生產更多或更低廉的生產。因想收回在價格上所受的損失，如回收愈少，愈想生產增多。當他們努力生產，并未考慮在消費者中發見的購買能力能否適應自己。」(6)

第三、機械的發明及其他技術的進步，更使生產擴張有不能終止的傾向。因為，機械的發明節

約勞動和降低商品的生產費。在瞬間即增加利潤或提高工資。但立刻因他人的競爭而利潤低下，他方又由勞動者的增加而降低工資。於是，更不能不用新機械，發明驅策發明，而角逐於廉價競爭。

「新發明及新發明的輸入，使工業家有了比其他競爭者更低廉的完成工作的手段。這種利益繼續的期間，他們僱用的勞動者，得到良好的支出，以致生活潤澤，於是結婚而家族急速的增加起來……但是，技術的性質上，發明是一步一步的前進的，新發明即剝奪舊發明的效果。因之，隨着一切工業的繁榮，即是不況時期的到來。」(7)

「……引起勞動的節約與不少利益的各種發見，只是在為得利潤而建立新工廠。這種工廠決不是為滿足新欲望的，只是為比舊工廠主更低廉的售賣(bons-ventre)。」(8)

但在為廉賣以達到營利的目的，勢不得不採取數量主義，從大量生產向過剩生產的必然性，即是在此。於是，所謂 *under-sell* 與 *over-trade*，「在現在的英國，是使商業精神的全體具有特徵的兩種作用。」(9)

「所謂 *over-trade* (*sur-commercer*) 是使商業達極端，與消費者的欲望無關係的生產或

輸入，以至使市場停滯。

「所謂 *under-sell* (*sous-Verdre*) 是為銷售為銷售商品，比其他任何生產者更極的售去，使其他的生產者發生破綻，逐出市場。自己以比較他人更少的利益或損失為滿足。」(10)

因西斯孟第以技術的進步及機械的發明，反是阻害民衆的幸福。於是，普通解釋他曾加以反對。但我不取此說。他對於技術的進步的態度，在次一文中表現得最明白。他說：

「……我所反對的，不是機械或發明，而是社會的近世組織……現在，假如一切人平等分配他們曾經協力的勞動生產物，那麼，一切的進步，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中，成為萬人的幸福……現在的弊害，不是在於發明，而是在於發明的結果，人人不公正的分配。」(11)

第四、機械的發明或技術的進步，隨着生產者的競爭，引起企業的集中。這種企業集中又必然的引起生產過剩。

「機械的技術之發見，其最終的結果，是產業集中在極少數極富裕的商人之手。這種發見使原來用大量勞動的用高價值的機械，即用大資本……於是，小商人小企業家消滅，一人的大企業

家，代替百人的地位……

「但如合計百人的消費，是比他一人之大。他一人消費的奢侈，比較百家族的相當生活，不過是與產業以極小的獎勵」。(12)

即是，在一方面，是伴着企業的集中，大量生產的發展。同時在他一方面，是伴着財富的集中，引起消費的減退，於是生產即成過剩。

以上，主要是生產及供給方面的事情。同時，在需要及消費方面，也可以認出使恐慌實現的諸原因。

第一、從市場構成的性質上，生產消費的均衡，必然的被擾亂。

「消費者人數。他們的嗜好，他們消費的程度，他們所得的程度等構成市場，各生產者為這種市場而勞動；這四種要素的各一，常和其他三要素獨立的變化，這種變化即使銷售弛緩或促進銷售」。(13)

第二、財富不公平的分配，惹起所謂消費不足 (sous-Consommation)，以至結果發生一般的

過剩。

「因財產集中在少數所有者之手，國內市場愈漸狹隘。而產業愈不得不在外國市場去求銷路。於是，即有最大的變革威脅他們……」。(14)

「人人一切便宜品及享樂品的一份，近於平等否；或大多數只得到必要品，而少數的則得到剩餘的一切，這在市民的幸福不是同一的。同樣的，這兩種所得的分配，在商業財富的增進上，也決不是同一的。」

「享樂的平等，其結果常使生產者的市場擴張；其不平等則常使生產者的市場趨於狹隘。同一的所得，在富者貧者都是同樣的被使用，但並不是同方法的使用。前者比較後者喚起極大的資本，但喚起很小的勞動，前者對於人口遙為不利。因之，貢獻於財富的再生產的，遙為稀少」。(15)

在伴着交換經濟發生的營利生產，所得的分配，必然是不公平。占國民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所得的不足，以至使市場愈趨狹隘，這是可以明瞭的認出的。在這種範圍，說他的恐慌論是消費不足說，並無錯誤。可以說，西斯孟第比較馬爾薩斯的注意富裕階級的消費不足，表現出一種進步。但是，

如以爲他的恐慌論單以這種消費不足爲終始，那恐怕是沒有窺見他的全豹。

第三、不公平的財富的分配，不僅是招致勞動階級的所得不足，在他方面又破壞生產部門的均衡，以至惹起恐慌。機械的發明與技術的進步，使伴着營利生產的分配的不公平愈不公平。於是，富者要求的奢侈品的生產部門，和貧者要求的必要品的生產部門，各應着對於各的需要的變化而調節，其間即應保持均衡。在古典派諸學者，由想像資本及勞動的自由移轉，故信資本與勞動的均衡回復。但西斯孟第反對此說，以勞動與資本都不能自由的移轉，只由於劇烈的激動，均衡纔開始恢復。即只由於恐慌，纔可恢復這種均衡的破壞。他說：

「監視所謂均衡自己恢復這種危險的理論……誠然，一定的均衡，結局是成立的。但這只由於極可怕的苦難。我們可以認爲是不斷的事實的，是資本如沒有使所有者發生破綻，不致從一種產業提出的。或人人如不是由於其人之死，不會拋棄一種職業的……」（16）

要之，他認爲恐慌的直接原因，不僅是勞動階級的貧窮化，而是由有如所述的許多要素而成。但這些的諸原因，決不是各別的存在，其一切必然是伴着他所謂交換經濟的伴隨物。但他並不是

即由此以交換經濟爲恐慌的一切原因。在此可以發見他的非社會主義者的，而爲社會政策家的理論根據。此點俟下節再論。

- (1)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IIe ed. (1827) Tome. I. p. 327.
- (2) Ibid. p. 371.
- (3) Simonde. de Sismondi: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1837) Tome I. p. 69-70.
- (4) Ibid. Tome II. p. 232-233.
- (5) *Nouveaux Principes* IIIe ed. (1827) Tome II. p. 403.
- (6) *Études* Tome I. p. 74-75.
- (7) *Études* Tome II. p. 305-306.
- (8) Ibid. p. 298-299.
- (9) Ibid. p. 301-302.
- (10) Ibid. p. 302.
- (11) *Nouveaux Principes* IIIe ed. (1827) Tome II. p. 433.
- (12) Ibid. p. 327.
- (13) Ibid. Tome I. 327.

(14)Ibid. p. 381.

(15)Ibid. p. 357.

(16)Ibid. Tome II. p. 220.

六 結論

勞動階級的所得的減少，減退社會大眾的購買力，在此即惹起對於生產物的消費不足，以至恐慌勃發。這種消費不足說，一般認為是西斯孟第的恐慌論，(1)我並不完全加以否定。但是，假如以此點即是西斯孟第的恐慌論，或以為他的唯一特徵即在此，則有如所述，是不正當的。消費不足說，不過是他所指出的許多原因中之一種。在這些的諸原因之中，自由競爭與機械生產的結果的生產過剩，也是同樣重要的存在。而這些諸原因，他以為是必然伴着一切近世的經濟組織的附隨物，所以，問題根本是和近世的組織有關係。

理解近世的組織的關鍵，如據他的見解，是在理解這種社會的所得的性質。即是，在這種社會，不是如李加圖所謂生產與所得是一致的，而是現在的所得比現在的生產，常屬不足。他對於這種

所得的獨特見解，有如他自己也承認的，是導出「經濟學新原理」一切特徵的根源。同時是他的恐慌論具有特徵的根本原理。這即是我所以把他的恐慌論分開，稱之為所得不足說的原因。

每年的所得，不足購買每年的生產。但並不是因此即立刻發生由於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的恐慌。反對的，是表示財富的增進，表示資本的蓄積，表示產業的進步。所得是過去生產的結果，故和過去的生產量一致。因此，所得與生產一致的時候，即是過去的生產與現在的生產一致的時候；生產並未表現何種的擴張。反之，在擴張再生產時，即在財富增進與資本蓄積的時候，所得即常比生產不足。

所得從生產分離或所得比生產的不足，在一方面，是伴隨擴張再生產的必然結果，是表示財富的增進或產業的發展之表徵。在他一方面，同時又是發生恐慌的可能條件。因為，使所得比生產少的近世的組織，同時又使這種所得的不足不止於可以貢獻於財富增進的程度，而超過這種限度擴張生產，使所得的不足過大。因此，所得的不足，如止於一定範圍的期間，決不致發生恐慌的。在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現實性，是在有使所得的不足過大的，即使生產的擴張過大的前述種種原因。

因此，近世的組織，在一方面，使所得比生產更少，以保證財富的增進或產業的進步。同時在另一方面，使所得的不足過大，以至不能避免生產過剩與恐慌，破壞財富的增進，阻害產業的進步。於是，他一方面呪咀近世的組織，但他方面尚未否認這種根本原理。所以，在結局就歸著於在近世的組織之上，加以社會的統制的社會政策論。

於是，西斯孟第就成爲由社會政策的改善論者；但他根本不是論政策，又不是建樹改善計劃的設計技師。他始終是理論家，始終沒有超越科學者的範圍。他自己也充分意識到的。他說：

「我對於有望的狀態，不能用些少的話去表現或回到簡單的思考。於是，人人就看成我樹立改善的計劃，和無稽或專制的限制。」⁽²⁾ 因此，如用缺乏精密政策論的理由去責難他，不免過酷。

里士特(O. Gride et O. Rist)教授批評西斯孟第的恐慌論說：「比較他(西斯孟第)努力論證一般的生產過剩恐慌之可能的推論，不能想到還有更混亂的。他的出發點，是在一國每年所得與每年生產的區別。如據他的見解：某年的所得購買次年的生產。因之，如在某年的所得比較前年的生產更大的時候，這種生產的一部，即不能賣去而殘留下來，以至生產者發生破綻……」

「而在他的議論中，即有兩重混亂。國民每年所得的，實際上不外乎是每年生產的。因之，即不致有一方比較他方更少的事。在他一方面，相互交換的，不是不同二年的生產物，而是在各年製造出的種種生產物……」。(3)

覺得此說有兩點是正當的：一、西斯孟第以所得與生產的區別為出發點，從事恐慌的說明一點。二、西斯孟第承認所得比生產不足一點。但是，此說正當的解釋了西斯孟第的所得嗎？或者含有多少的曲解呢？不免發生疑問。第一、把西斯孟第所謂以今年所得購買明年生產物的理論，照着文字解釋，以為是比較以一年為單位的生產及所得的。恐怕是曲解他的真意。所謂昨年、所謂今年、所謂明年，要不過是從說明的便宜上而假設的生產期間。嚴密的說來，不過是表示一次的生產過程。此點可以由他自己也不一定是拘泥於一年期間的事實來證明。他說：

「循環擴張螺旋狀進行的，即在此點。假如以去年生產與消費為一〇，可以想到翌年生產與消費同為一一」。(4)

由此看來，他並不一定是說今年的生產物，是為去年的所得所購買消費。他在他處又說：「每

年所得的全體，是可以與每年生產的全體交換的。」(5)他所要說的，不外是擴張再生產以後的生產量，是比從前的生產量大。如據這種意義解釋，所謂所得比生產小，即不外乎說是從前的生產比以後的生產小。或者里士特教授也承認此點罷。

而由里士特教授主張「國民每年所得的，實際上不外是每年的」恰和西斯孟第排擊的李加圖等的主張完全相同。即以所得即是生產，生產和所得一致的見解。誠然，西斯孟第也以在從生產而生所得，生產是和所得一致。但這種所得的一部，在從支出保留下來，追加於資本而擴張生產時，這種新生產即比購買新生產的所得（和從前生產一致的）更大。生產是決定所得，但其次又是所得決定生產。決定所得的生產與由所得而決定的生產，雖同是生產，但物則各別。擴張前的生產與擴張後的生產，是各別的生产過程。兩者量的方面的不相等，由擴張再生產一語即可明白。

因之，如抽象的概念的觀察生產與所得時，是同一的一致。這是李加圖等的主張。西斯孟第排擊的要點即在此。在西斯孟第，生產與所得，是在時間的繼起關係中去具體的考察。於是，原因即成結果，結果即成原因，事物是「螺旋狀」的進展。在這種發展的狀態中去觀察的，即是西斯孟第

的所得論。如不理解此點，恐怕認爲他的所得有二重三重的混亂。本來，在他的所得論中，尤其是他的說明的方法。或者不免有許多的弱點。但他當從事生產過程的考察時，在時間的繼起樣相中去觀察發展的姿態，確是補古典派諸學者所未及的。而在這種立場去觀察，即以一般的生產過剩的傾向，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舉其一例，就是在與西斯孟第完全無關的現代學者中也可見到。如美國 克拉克 (F. H. Clark) 教授說：

「成爲有效需要而表現出購買力增加的結果，因比生產力的增加，有落後的傾向。其結果即和各個部門的生產過剩相同，有陷於一般的生產過剩之不斷的傾向。」(6)

克拉克教授根據所謂購買力的增加，較之生產力的增加，時間上「有落後的傾向」。以承認一般的生產過剩傾向的主張，和百餘年前西斯孟第的主張有一脈相通的所在，這是難於否認的。只是，他以爲所得與財產的分離止於某程度，是財富增進的條件。在超過某種程度時，卻是財富停滯的原因。那麼，問題是決定這種程度（所得比生產不足的程度）的諸條件，如何去探求呢？而他關於此點的考察，不一定是明白的。他舉出伴隨近世的組織的諸事情（技術的進步，自由競

爭、企業集中、分配的不公平、生產的不均衡等等），主張在這種組織之下，必然是所得不足高至某種程度以上，故生產超過過大，由於一般的生產過剩的恐慌，即成難於避免的命運。而使生產超過過大的諸事情，都是恆久的。因之，生產過剩或恐慌，在西斯孟第又認為是不斷存在的恆久現象。換言之，生產過剩或恐慌，在他是作為一種趨勢的或傾向的變動，即作為不斷的變動去考察。

如已經在他處述過，在時間的經過中觀察經濟現象的動態研究，在亞丹·斯密、李加圖、尤其是馬爾薩斯，都成為重要的研究問題。只是在這些古典派所有的一種共通點，是他們的動態研究，如所謂工資遞增的法則，或利潤遞增的法則，常是限於一般的傾向的探求一點。即如在最近的動態研究，只限於稱為趨勢變動的。但動態研究如只限於趨勢變動，則與靜態研究同樣是抽象的，和現實的運動更無關係。現實的運動，是在這種的傾向之外，更有偶然變動、季節變動、景氣變動等。恐慌或景氣變動的研究，在古典派的動態研究中，實際……

現在，如就西斯孟第看來，他是在動態上觀察生產過程，發見了生產與所得的分離。但他的動態研究，又有如所述，是作一般的傾向或恆永現象的研究，論證生產過剩或恐慌之常久的存在。但

這不待言不是現象的運動。在現實的運動，恐慌不過是在某期間回歸的發生，常久的恐慌，是沒有在於現實的。因此，假如從抽象的一般傾向的動態，更一步接近現實，進到現實運動的動態。那麼，那裏發生的問題，不是生產過剩或恐慌何故常久的存在的問題，而是何故不常久的存在的問題。換言之，是轉化為這些何故回歸的一再發現的問題。但在和古典派諸學者相同，在動態研究尚未進到一般的傾向以上的西斯孟第，這個問題沒有成為問題，可以說是當然的。想到一般承認恐慌，尤其是景氣變動的回歸性，大概是一八三〇年時代或以後的事。因之，這是正當西斯孟第的晚年，比較他的經濟思想的形成，是以後發生的現象，結果他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實為當然的歸結。

- (1) K. Diehl U. P. Mombert: Wirtschaftskrisissen (1923) S. II.
- (2) Simonde de, Si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IIe ed. (1827) Tome II. p. 372.
- (3) C. Gide et C. Rist: Historie des Doctrines Economiques (1926) p. 206-209.
- (4) Simonde de. Simonde: Ibid. Tome I. p. 120.
- (5) Ibid. p. 106.
- (6) F. E. Clark: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1925) p. 25.



收到 呈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九日

三三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34579)

社會科學
小叢書
古典學派的恐慌學說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谷口吉彥

譯述者 陳敦常

主編者 何炳松 劉秉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四五七九上

商代

